

冯建辉 著

ZOUCHUGERENCHONGBAI

一个年代的反思

# 走出个人崇拜

走

出

个

人

拜

一个

年代的

反思



从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与林彪的角色之谜  
怎样看待领袖的私生活  
毛泽东四换接班人的历史困惑  
一个被打倒的人却是最好的继承者  
周恩来身后闪光联想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冯建辉 著

B038  
10  
ZOUCHUGERENCHONGBAI

00123612

一个年代的反思

00123612

# 走出个人崇拜



北航 C0542293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个人崇拜/冯建辉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215-04784-9

I. 走… II. 冯… III. 个人迷信—研究 IV. 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978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4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

定价:16.50 元

## 前 言

人类的蒙昧时代,由于无法理解和无力应付某些自然现象的侵害,在恐惧中希望得到神奇力量的庇护,从而产生了最初的神的信仰与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极少数主宰者手中,于是,人们又把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视为“神”。一位革命导师说:“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

值得深思的是,在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出现与自身使命极不和谐的造神运动。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曾经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且几度泛滥成灾。如苏联 20 世纪 30—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的灾难降临。中国 60—70 年代的个人崇拜狂潮,伴随着十年“文革”悲剧的发生。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在总结“文革”历史教训中,人们从噩梦中醒来,纷纷走出个人崇拜的迷雾,同时也把领袖人物从神坛请到人间。“领袖是人不是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响彻云霄振聋发聩的口号,其作用不亚于五四时代的“民主与科学”。它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整个中华民族,于危难时刻,解放思想,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去迎接和创造未来。

个人崇拜,是高度集权领导体制的历史产物,从政治本质上

说,就是对个人手中权力的崇拜。一个很长时期中,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曾受“权力崇拜”思潮的影响,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在考虑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片面强调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忽略了发展经济和扩大民主生活。在这种认识下,领袖作为政党和政权的代表,自然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这一做法,甚至不及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孟夫子尚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垮台与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必须真真正正地把人民群众当“上帝”,老老实实地做“人民的勤务员”,才能永葆青春。关系颠倒了,就会变成脱离大地的安泰。

无产阶级需要什么样的“领袖形象”呢?不错,领袖是阶级和政党的代表。然而,领袖也是活生生的普通的人。领袖并非天生的,是由普通人逐渐成长为领袖的。即使当了领袖,也还是普通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列宁全集》第18卷,第160页)只注意领袖“政治形象”的一面,把领袖和阶级、政党完全等同起来,忽视两者的差别,结果导致领袖神圣化,使我们在历史上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强调“领袖是人不是神”,并不贬损领袖形象,贬低领袖作用,而是把领袖放在科学的位置上,从而更有利于发挥领袖的正确领导作用,也更有利于调动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特别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我们应该改变把领袖只作为“政治形象”的做法。领袖也是人,研究领袖也需多角度、多层次展示“人”的形象。由于领袖的社会职责决定,许多活动都和政治有着密切关系。领袖的政治活动,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然而又是什么决定领袖政治活动的特点与优劣呢?很长时期,我们只注意“历史根源”、“阶级根源”、“理论根源”方面的分析,却很少注意领袖的个人

因素,如个人的才能,经历与素养,性格特点,道德追求,心理状态,年龄与健康状况,乃至领袖个人生活的小环境,如家庭、爱情、亲情、友情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把本来生动活泼的历史,变为苍白空泛的概念堆砌。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类型的领袖,一种为注重个人权力与权威的“铁腕人物”,一种是更善于运用人格魅力与发扬民主精神的“平民式”领袖。随着世界民主潮流向更广更深度的发展,“铁腕”类型的领袖人物,逐渐成为历史;“平民式”的领袖人物,将更为时代所需要,群众所欢迎。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但丁,就曾以诗人般的热情提出:“虽然从施政方面说,公民的代表和国王都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从最终目的方面来说他们却是人民的公仆。”虽然这里指的“公民”、“人民”主要是有产者,并不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但是这一“人民公仆”的光辉思想,却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巴黎公社明确规定:公社的工作人员是“最热忱的公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人民服务”更是成为自上而下一切干部的行动准则,成为一扫旧政坛污秽之气,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最得人心的口号。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和他领导的政府各级工作人员,身体力行创造的“人民政府形象”和“人民公仆形象”,不仅立下两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也为“领袖即公仆”的美好理想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本书是《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系列研究的第二部,拟围绕上述问题,从人生视角,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人物们,做些新的考察和反思。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篇 “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的观念” ——个人崇拜的历史回眸 .....	(1)
第一章 从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个人崇拜.....	(2)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	(2)
二、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 .....	(5)
三、1958年成都会议提出“两种个人崇拜” .....	(8)
四、1959年庐山会议,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 “绝对权威”.....	(11)
第二章 个人崇拜与林彪的角色之谜 .....	(15)
一、愚昧荒诞的历史画面.....	(15)
二、林彪走红,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	(17)
三、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	(22)
四、试解林彪之谜.....	(26)
第三章 个人崇拜余波未了时 .....	(29)
一、声势浩大的“宣传华国锋”.....	(29)
二、韩丁直言:只有政治地位不稳定的人才需要 这样的宣传.....	(31)
三、在“维护旗帜”名义下宣传了错误的领袖观.....	(34)



四、对“抬轿子”不应该也认真地研究一下吗…………… (38)

## 第二篇 “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

——以世俗眼光看领袖碰到的理论问题 …………… (42)

### 第一章 “领袖是人不是神” …………… (43)

一、毛泽东走下神坛的尴尬…………… (43)

二、家庭,不是培养领袖的摇篮 …………… (49)

三、“领袖是人不是神”——一种科学的领袖观…………… (57)

### 第二章 关于“仆从眼中无英雄”的对话 …………… (64)

一、权威与崇拜…………… (65)

二、伟大与普通…………… (69)

三、政治与道德…………… (74)

### 第三章 怎样看待领袖的私生活 …………… (82)

一、领袖“生活实录”热的启示…………… (82)

二、一代领袖的恋爱与婚姻…………… (88)

三、重提“大节、小节”论 …………… (97)

## 第三篇 鹰有时也会比鸡飞得低

——领袖犯错误的人生思考 …………… (102)

### 第一章 历史的怪圈…………… (103)

一、反右何以出“左” …………… (103)

二、“以‘左’反‘左’”之谜 …………… (106)

三、反“左”英雄重犯“左”倾错误的历史剖析 …………… (111)

### 第二章 权力啊,权力 …………… (118)

一、领袖滞后与权力失去平衡 …………… (118)

二、领袖文人气质与权力失去平衡 …………… (124)

三、领袖平庸与权力失去平衡 …………… (130)

四、领袖无制约与权力失去平衡 …………… (136)

<b>第三章 挫折与思考</b> .....	(142)
一、一个艰难的历史课题:关于中国革命.....	(142)
二、“凝聚力”从何而来:关于中国共产党.....	(148)
三、批判与继承的不够和谐:关于传统文化.....	(153)

## 第四篇 太阳总是有升有落时

——领袖更替与接班人问题 .....	(158)
<b>第一章 毛泽东四换接班人的历史困惑</b> .....	(159)
一、共和国主席由立到废的悲剧 .....	(159)
二、法定接班人叛逃震惊中外 .....	(165)
三、造反司令的“王储”梦 .....	(167)
四、华国锋“抓纲治国”的历史教训 .....	(171)
五、一个被打倒的人却是最好的继承者 .....	(174)
<b>第二章 深邃的思考与遗憾的结论</b> .....	(185)
一、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 .....	(185)
二、毛泽东接班人思想评析 .....	(188)
三、两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 .....	(194)
<b>第三章 他山之石</b> .....	(202)
一、封建社会搞“传宗接代”，却挡不住 “改朝换代” .....	(202)
二、资本主义创造了与封建主义完全不同的首脑 更替制度 .....	(208)
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演变的历史教训 .....	(215)
<b>第四章 邓小平的新思路</b> .....	(225)
一、把命运与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 很危险 .....	(226)
二、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 长期性 .....	(228)

三、提出“四化”标准,培养成千上万的接班人…… (232)

## 第五篇 “领袖即公仆”的崭新雏形

——析周恩来现象 …………… (236)

**第一章 政坛常青树**…………… (237)

一、29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237)

二、领袖频繁更替时期不可替代的人物 …………… (241)

三、从领导者到助手 …………… (245)

四、他创造了两座历史丰碑:人民政府形象与  
人民公仆形象 …………… (254)

五、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问题 …………… (261)

**第二章 他为何未当“第一把手”**…………… (266)

一、“一代完人”的个性分析 …………… (267)

二、周恩来的素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 (272)

三、周恩来的人生追求与传统的领袖观 …………… (281)

**第三章 周恩来身后闪光联想**…………… (287)

一、他完美体现了政治信仰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 (287)

二、他真心实践着“领袖即公仆”的人类  
美好理想 …………… (291)

三、周恩来“是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 …………… (294)

**后记**…………… (299)

# 第一篇 “神的观念永远是 奴隶状况的观念”

——个人崇拜的历史回眸

列宁曾深刻地指出：“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sup>①</sup>然而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却曾数度出现与自身使命极不和谐的造神运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神化党的领袖斯大林,斯大林被称为“人民的父亲”、“全体进步人类的天才灯塔”,宣扬布尔什维克党是“斯大林的党”、“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我们的法律”。在中国50年代末至70年代,同样掀起一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的狂潮。毛泽东思想被称为“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的话被当成“最高指示”,“字字是真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领袖“三忠于”(即永远忠于领袖,永远忠于领袖思想,永远忠于领袖路线)、“四无限”(即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是风靡全党、全国,且绵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导致苏联发生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特别是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久,中国又相继兴起个人崇拜,这段历史给予人们的教训和启示,值得永远铭刻在心。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第一章 从反对个人崇拜到 提倡个人崇拜

###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50年代的苏联,是当时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国。那时流行着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1956年发生了一件令全中国百姓震惊的消息,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在苏联召开的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指出,早在1937年斯大林就提出错误的理论“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在党内,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的重要的事务”。全党全国掀起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热潮,各种报刊书籍“把斯大林写成神,使他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发生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这一秘密报告很快扩散开来,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苏联,一位苏共高级官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年轻的读者

难以理解,对我们这一代苏联人来说,对那些青少年时代在可怕的世界大战和斯大林个人迷信期间度过的人来说,赫鲁晓夫的名字和赫鲁晓夫时代意味着什么。你不妨想像一下,千千万万的人汇成人群,面对被崇拜的雕像,跪倒在地,匍匐在地。可突然出现一个人,他说:‘你们看,这只不过是一个你们自己塑造、你们自己将其扶到高座上的铜偶像而已。’他说毕,就把铁索套到偶像脖子上,用推土机和坦克把它拉下了底座。”接着,这位官员作了如下评论:“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分析和结论是不够的。他谴责了独裁,但未触及专横的权力。他抛弃了个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至于鞭挞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他的霸道性格,这实际上是政治思考的幼儿水平。”<sup>①</sup>

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家,长期以来照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处处按斯大林的意志行事,脱离本国的实际。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本国政府和苏联的控制平时就不满,得知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下子几十万人上街游行,酿成著名的“波匈事件”。1956年6月,波兰华沙的工人和学生首先上街,高呼“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一些学生还提出“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民主,让劳动人民更多的参加管理”等要求。与政府发生冲突,群众死54人,伤200多人,几百人被捕。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连续发生群众游行示威,抗议匈党第一书记兼总理大搞个人崇拜,抄袭苏联的一套做法,经济上造成严重困难,政治上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甚至导致武装骚乱。波匈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总结教训,表示要“保卫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这种事业的实现不该凭借盲目地摹仿外国样板,而应当通过与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相适应的途径”,并着手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某

---

①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第4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

些改革。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巨大冲击。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工人的吸引力也远不如从前了。二战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现在已不足14%”，“许多党支部空无一人，同志们不再过党的生活”。党的领导人及时总结教训表示：“莫斯科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中心，我们将继续走我们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sup>①</sup> 在美国，“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专门报告以后”，美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说：“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sup>②</sup>

在中国，同样引起不小的波动。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要求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纷纷发表评论。如认为“斯大林错误应该从社会制度中去找根源”，“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权力的高度集中是极大的危险”。“斯大林错误的原因和三害的根源是由于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的缘故，而民主只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有的人热衷“大民主”，主张“大民主好，效果好，波匈事件大民主不是改正许多缺点吗”。甚至有个别党员借口“独立思考”，表示：“党内没有批判马列主义的自由，故只好退出党。”<sup>③</sup>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激起千层波浪的这块“石头”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且日渐在毛泽东的心中郁结成一块含义颇为复杂的“赫鲁晓夫情结”。

---

① 【意】托马索·吉利奥：《贝林格》，第47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4月版。

② 【美】佩吉·丹尼斯：《尤金·丹尼斯一生》，第293页，新华出版社1988年3月版。

③ 上述引文均出自《右派论点选辑》（某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1957年9月）。

## 二、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

参加苏共 20 大的中共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等回国以后,于 1956 年 3 月 17 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作了主调发言,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当时毛泽东处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矛盾之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苏共 20 大反对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多次采取措施,反对过分突出领袖个人。如 1949 年 3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了反对突出个人的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禁止歌功颂德,保持艰苦奋斗作风。1950 年 5 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于 5 月 20 日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1953 年 5 月 24 日,毛泽东在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954 年 3 月 17 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重申:“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这里还应该提及张闻天的历史功绩。50 年代张闻天作为中国驻苏大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苏联政治思想动态



的变化,以肯定赞成的态度向中央及时通报了苏联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工作。1954年3月27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目前宣传苏联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功绩,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二是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有所纠正。毛泽东及时批阅,并认为是个“重要文件”。1954年4月,中国驻苏大使馆研究室还整理了《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时传递了苏联纠正过去对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指出其表现是,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毛泽东认为“此件值得一看”,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张闻天和他领导的驻苏大使馆的上述工作,对中央正面了解苏联纠正斯大林个人崇拜,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联系中国的实际做了研究,胡乔木谈到毛泽东时讲:“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上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专门有一部分“领袖对党的作用”,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表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证明,这种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完全被个人崇拜的浪潮淹没了。那么,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呢？

苏共 20 大以后，东欧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各地也发生了些小的乱子，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内部，在对农业合作化是快些好，还是稳妥一些好，以及要不要“反冒进”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这些事影响了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思考或者说是思考重点有了转移。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到苏共 20 大时，口气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同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进一步明确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11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提出：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点明确的看法：一是斯大林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批判斯大林就是搞修正主义；二是东欧出现波匈事件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期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 年 12 月 29 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并对修正主义从内容上作了如下界定：“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对“反对照抄苏联经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口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以“反斯大林”为话题，对党内某些现象提出批评。如 1957 年 1 月 18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指责“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缺乏革命道德”，是“理由一

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来又多次提到,有些人“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甚至激动地说,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

上述情况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万恶之源。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中国会不会也“出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话题。毛泽东的这一“赫鲁晓夫情结”症结在于,过分看重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言辞过激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一批判触及苏联高度集权体制问题的重大意义;只看到赫鲁晓夫是个改革失败者,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过分归罪于赫鲁晓夫个人。

### 三、1958年成都会议提出“两种个人崇拜”

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到维护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一位老同志讲,毛泽东反对崇拜斯大林,但不反对崇拜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1970年11月16日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毛泽东曾说:“总要有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个人崇拜。”但仅此认识不够,我们还要注意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另一段。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这表明,毛泽东不只欣赏个人崇拜,更

重要的是把个人崇拜作为解决矛盾和开展斗争的一种手段。这在毛泽东 1958 年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为全党进一步推行个人崇拜,在理论上开了绿灯。其主要内容是:

1956 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话,使我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伟大理论家的毛泽东,为什么会讲出理论上如此不通的话呢?个人崇拜是一种蒙昧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它把领袖个人神化,强调人民群众对领袖必须绝对忠诚,无条件的服从,有什么“正确”可言呢?对待真理,“崇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也是毛泽东过去一贯的主张,只有认真的学习,努力的实践,并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才是正确的。更不能因为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就否定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不管谁搞独裁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独裁”作为一种制度,早已为历史所否定。我想,只能把这段话作为斗争需要和斗争手段去理解。

在成都会议上听到毛泽东的“两种个人崇拜”观点,许多人立

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不少人表示：“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个别人如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这种浓烈的气氛中，即使是周恩来和薄一波，也不得不一再检讨。周恩来在发言中专门谈了“向毛主席学习”的问题，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也表示：“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许多干部的这一表态，仅仅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来解释是不够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第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俄国共产党，没有能正确解决领袖与政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往往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众监督，以至出现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政党一直遵循的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论述，今天看起来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列宁在这里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这一面，强调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一致性，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党的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站在党之上，领袖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领袖与党、与阶级既有一致的一面，也会有矛盾的一面。”<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共建党思想和模式的影响，再加上革命

---

<sup>①</sup>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和建设中取得种种辉煌的胜利,使得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领袖的宣传也出现了某些不正确的倾向。如在高度评价领袖的作用时,很少科学地说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领袖才能正确的发挥作用;越来越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说成只是个人的贡献,不讲或少讲集体的智慧;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少讲党和人民的作用;把领袖说成绝对正确,不讲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并且不允许对领袖人物进行批评。这种倾向影响我们党在50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当领袖内部出现矛盾时,不能按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原则给予解决,而是采取了进一步突出个人、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办法。

#### 四、1959年庐山会议,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不料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分歧,推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们,也一下子被推到这样一种境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必须选其一。由于毛泽东在全党的巨大威望和无尚权威,绝大多数人自然选择了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一些老革命家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对彭德怀的认识和处理上,也并不认为毛泽东的做法很妥当。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一个领袖的情况下,无条件的维护领袖的“形象”和权威,便成为全党头等重要的大事,即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于是,他们都颇为理性地、自觉地站在维护毛泽东的立场上,

宣扬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的发言,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是“感情问题”(即缺乏或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是“没有领袖观点”,“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的发言,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

上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言论,大体上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当时的认识状况。他们确实是出以公心,从党和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来对待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的。可惜,认识并不正确。它把对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视变为对掌握最高权力个人的无条件维护,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庐山会议上还有些干部,以封建主义的思想来看待无产阶级领袖问题。“朕即国家”,对待领袖要绝对忠诚,无条件服从,认为这就是“党性”。如有的指责彭德怀“有魏延的反骨”,有的表示要做“歌德派”。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操守,完全等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基于这种认识,他指责彭德怀、张闻天:“口口声声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但为什么不满,甚至刺毛泽东同志?”在他看来,拥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使领袖错了也不许“不满”,更不许提意见。

在庐山会议上和庐山会议以后,林彪的表演,对于全党进一步掀起个人崇拜之风起了特殊的作用。林彪在拼命向彭德怀头上泼脏水的同时,别有用心地以最高的调子歌颂毛泽东主席。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怀)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

英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讲的是什么“规律”呢?真正的英雄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毛泽东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别人只能处于惟命是听的地位,谁要是给英雄提意见,谁就是也想当英雄,我们必须打倒他。林彪正是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帝王理论,取代了“无产阶级领袖是个集体”、领袖内部关系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主义。

庐山会议以后,由林彪领导的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1959年11月27日)的学习文件,第四部分专门讲“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要点如下:

(1)“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从此,反对个人崇拜被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无人再敢提及。甚至在60年代至80年代编的词典、辞海、辞源中,都找不到“个人崇拜”这个词汇。

(2)“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认为毛泽东对缺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这完全是造谣诬蔑”。“文件”把党的领导完全说成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不仅反对任何批评,而且歌颂为“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3)“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胡说”。正是在这种“领袖即政党即阶级”的理论名义下,许多给领袖提意见的人,被“名正言顺”地打成“反党分子”。



军委总政治部的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县以上干部阅读”,从而在全党、全国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后来,阴谋家林彪看准风向搞投机,利用他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把个人崇拜从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

近些年,人们就苏联批判个人崇拜之后中国又相继兴起个人崇拜的历史教训,做过多方面研究和总结。我觉得,有一条重要的原因被忽视了,即“权力崇拜”思想的影响,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一切。个人崇拜,是高度集权领导体制的历史产物,从政治本质上说,就是对个人手中权力的崇拜。一个很长时间内,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在考虑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极端重视和千方百计地维护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忽略了发展经济和扩大民主生活,甚至出现批判“唯生产力论”和“运动群众”的荒唐事情。在这种认识下,领袖作为政党和政权的代表,自然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苏联的垮台和我国“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必须真真正正地把人民群众当“上帝”,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中心位置,时时刻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永葆青春。

## 第二章 个人崇拜与林彪的角色之谜

### 一、愚昧荒诞的历史画面

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天天读”、“走捷径”、“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这一时期在林彪领导下的某报,从若干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个人崇拜的生动历史画面:

其一,以闪光的语言鼓吹无条件的绝对忠于领袖。

只有用“忠”字铸成的长城,才是真正的长城,伟大的长城,钢铁的长城,任何敌人攻不破的长城,资产阶级腐蚀不了的长城。(某报1968年3月6日)

学习和工作都要围绕培养一个“忠”字,“忠必信,信必用,用必灵”。(某报1968年3月4日)

要自觉地让“忠”字红透每根神经，“脑子里要印上‘忠’字，心坎上要刻上‘忠’字，口里要宣传‘忠’字，行动上要体现‘忠’字”，“让‘忠’字统帅生活的每一分钟，让‘忠’字指挥我们的一切行动”。（某报 1968 年 3 月 26 日）

其二，以狂热的宗教情绪宣扬领袖的神灵能够保佑一切，读“语录”，能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该报 1968 年 4 月 13 日，就某师卫生科为女社员摘除大肿瘤一事，做了如下报导：

3 月 23 日 7 点 30 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张秋菊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其三，从这家报纸资深编辑对个人崇拜时期办报情况的回顾，可以看出个人崇拜确实达到了愚昧荒诞的程度。

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这真是大笑话，也真是无理之极。谁看报有这样看法呢！虽然明知无理，但没有人敢反对。后来，只好做一个

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纸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报仓库里，可以作那个时代愚蠢的见证。<sup>①</sup>

其四，不仅搞领袖的个人崇拜，而且搞领袖子女的个人崇拜。“文革”初期，领袖的一个子女到某报社工作，她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年青人，在全社大会上讲话说：“我爸爸讲了，我什么也不懂，办好××报全靠叔叔伯伯们。”而这家报社的驻地，却“几乎家家户户都张贴出红对联：‘向××同志学习！向××同志致敬！’随后，还专门开辟一间‘××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连××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都作为重要展品展出，以颂扬××的艰苦朴素作风”<sup>②</sup>。

## 二、林彪走红，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曾几何时，人们把林彪称为“政治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结果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林彪并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受骗”。

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毛泽东重视林彪，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夺取政权年代曾

---

① 姚远方：《天上掉下一个毛姑娘》，《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册，第3页，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版。

② 同上书，第2页。

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本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问题”,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狠批彭德怀,慷慨激昂地表示:“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

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党内的有识之士,曾对林彪的这一套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批评。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后来,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后来又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林彪的主张,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很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7000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

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话你们说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说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

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会后罗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这就是说,对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 三、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

“高举”、“突出”、“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髓”。林彪垮台以后,仅仅宣布它“是假的”,而对口号本身并未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清算。以至其影响,至今在某些单位和一些个人身上也不能说已经绝迹。

关于“高举”:

林彪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倡导下,报纸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后来发展到信封、信纸,乃至洗脸盆、卫生纸包装等商品上都有“语录”,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文革”中,对立的两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对于林彪的这一套“高举”,虽有狂热响应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或至少感到“别扭”。也有少数勇敢的思想先行者,当时就对此提

出尖锐的批评。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陆秀兰,写文章尖锐地指出:“把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封建皇帝了。”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表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提意见者虽然惨遭厄运,他们的思想光辉却永照后人。

每读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内心受到一次震撼。笔者和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一样,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的“9·13”事件发生,才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林彪为什么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且让如我这样的许多人“上当受骗”呢?一个重要教训是,不管什么事都不能盲从,都要问问科学不科学,信仰离开科学,就要变为迷信。

关于“突出”: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领袖”的狂潮。当时曾出笼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其他领袖都是反面教员,整部党史就是毛泽东单枪匹马和其他领袖人物斗争的历史。这部书的虚伪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由林彪骨干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舆论,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的学说,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炮制出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

袖地位——学习关于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领袖是核心”，“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认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决定着我们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党，没有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这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赤裸裸地宣扬“英雄创史”、“领袖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理论，实属罕见。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林彪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林彪垮台五年以后，又掀起过一场“突出华国锋”的新高潮，其形式、规模、气氛都和宣传毛泽东差不多，在理论观点上也几乎是上述“领袖决定一切”的翻版。

接二连三的出现“突出领袖个人”的历史教训，说明不只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在如何科学地认识领袖的作用以及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并未搞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率先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老革命家叶剑英重申列宁的思想“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

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他认为“突出个人”造成的危害是:“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着手解决高度集中体制的问题。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错的”,毛泽东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胡涂的跟,要独立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个人崇拜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林彪提倡的“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个人崇拜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闻风而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我这里想进一步讲讲提倡“紧跟”的林彪,看看他的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什么是“紧跟”?为什么要“紧跟”?这对我们理解他的“紧跟”口号,颇有启迪。

“9·13”事件以后曾出过不少“林彪罪行材料”,其中有林彪和叶群的读书笔记、札记之类的东西。现摘录几段,并稍加评析。

其一,“古策:①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②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林彪把党的领袖

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领袖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许惟命是从。——此为“紧跟”含义之一也。

其二,“党性,遵命性也”,“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这里林彪把党性——共产党员为崇高理想而自觉献身的精神,歪曲为只是对领袖和上级的盲目“遵命”。把民主集中制仅仅归于服从和纪律,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取消了党的民主精神。——此为“紧跟”含义之二也。

其三,“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此话赤裸裸地表明林彪以个人得失为中心,投上所好,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此为“紧跟”含义之三也。

其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这番话暴露了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阴谋家的嘴脸。——此为“紧跟”含义之四也。

林彪的这四种心态:封建主义的君臣心态;取消民主的专制心态;为个人得失不讲原则的投机心态;心怀叵测的阴谋家、两面派心态。充分展示了他所鼓吹的“紧跟”的本质,值得后人深思。

#### 四、试解林彪之谜

林彪生前乃至死去多年,仍然躲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黑白反差之大,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在许多人心目中,林彪已经成为“虚伪”、“阴谋”、“两面派”的化身。其实,林彪并非天生的两面派,甚至并非专事阿谀奉迎的人。和林彪共事几十年的聂荣臻元帅,谈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林彪时说:“我觉得

他比较年轻,世故不多。”曾任毛泽东多年卫士长的李银桥也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和推动个人崇拜的急先锋呢?

邓小平曾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于我们国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在这些地方和单位,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正是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历史产物,其实质是对领袖手中具有的无限权力的崇拜。

林彪念念不忘“权”,对“权”的力量与作用,颂扬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他离开政权与权力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奢谈“权的占有是总的占有,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最终,林彪把对权力的崇拜,归结为对掌握权力的人的崇拜,鼓吹“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袖决定政党、政权的性质”。我们从权力崇拜角度去看林彪,就不会对他一方面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又看出毛泽东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在一定条件下妄图加害毛泽东,当成不可理解的事。他崇拜毛泽东,是崇拜毛泽东手中具有的绝对权力,林彪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也。”他还

说：“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这表明，在林彪看来，谁掌握绝对权力，就应该全心全意崇拜谁，这是“大德、大勇、大智”，乃天经地义。当然，这种个人崇拜的核心是“为己”，如叶群所说：“得一人得天下。”林彪妄图加害毛泽东，还是权力崇拜作祟，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B52 好景不长”，“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于是不顾一切地密谋抢班夺权。我们研究和总结林彪问题的历史教训，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某个人的品质和欲望上，而要对林彪所代表的作为高度集权体制反映的“权力崇拜”思潮，进行认真的批判。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指出“权力是迫使他人或团体做出某种行为的能力”；外国人马克斯·韦伯也指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这说明权力本身有很强的“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再加上权力持有者，会或明或暗地带来许多特殊的利益，以及普通人难以享有的地位、荣誉和精神上的满足。由此，权力又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权力崇拜思潮，正是权力具有的这种诱惑性和腐蚀性的产物。它极力鼓吹权力是一种“占有”，完全不讲“权力是一种社会责任”，把掌权者当成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社会的公仆”；它鼓吹权力万能，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牢牢地把住权力，就可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不知权力的基础在人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它鼓吹“官大表准”、“有权就有真理”，提意见者一律视为“反对真理”、大逆不道，殊不知“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 第三章 个人崇拜余波未了时

### 一、声势浩大的“宣传华国锋”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在忧心忡忡中去世。10月6日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隔离审查。14日,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10月24日,首都北京举行百万军民庆祝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1976年10月7日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正式公布毛泽东给华国锋“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第二天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进一步强调华国锋当领袖是“毛主席生前的安排”,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从此“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此后的几个月内,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华国锋”的狂潮。全国的主要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在重要版面发表了大量的歌颂华国锋的专论、通讯、诗歌。

如《×××报》——

1976年10月29日,发表该报编辑部专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10月31日,头版大标题:《八亿人民纵情欢呼有了可靠掌舵人华主席》。



11月1日,头版大标题:《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我们最信赖最拥护》。三版标题:《华主席是我们无限信赖的领袖》。

11月8日,该报编辑部专论:《华国锋同志为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称华国锋“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远见卓识,英明果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11月11日,头版文章:《华主席掌舵,我们一万个放心》。

11月14日,头版大标题:《像热爱毛主席那样热爱华主席,像保卫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紧跟统帅华主席》。

11月23日,头版文章:《热情赞颂和学习华主席高尚的革命品质》,《华主席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贴心人》。

11月29日,头版标题:《颗颗红心向着英明领袖华主席》,“深入开展赞颂华主席的活动,整个部队出现一派衷心爱戴华主席,坚决保卫华主席的生动局面”。

《××日报》1976年10月28日,发表长篇通讯《颂歌献给华主席——首都八百万人民欢呼我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堆砌大量动听词汇“大赞大颂英明的领袖华主席”,称华是“继续长征的红司令”、“领路人”,“江山永不变色的主心骨”;渲染“华主席和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人们“恭恭敬敬地将华主席的像贴在毛主席像旁边……看一看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像,浑身便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讴歌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华主席的恩情我要记一辈子”,“华主席掌舵挥巨手,扫除‘四害’功不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胜利凯歌传全球”!强调华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咱们放心”,“无限信任”,“世世代代都紧跟”。

《红旗》1976年第12期发表长文《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9日也发表重要文章《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12月2日大标题登新华社

讯：“有了领袖华主席，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12月10日，发表华国锋接见军政大学学员的长篇报导，说学员们“见了华主席”，“感到无比幸福，无比温暖”，“浑身是力量”。此外，不少报刊还以“幸福院全体老人”和儿童唱儿歌等形式，宣传“俺们对华主席一万个放心，一万个满意”，“华主席真英明，为全国人民除四害，铲除四害挖修根，人民江山万代红”。

图书出版也急起直追，很短时间大量歌颂华国锋“丰功伟绩”历史的书籍，涌现于大小书店和全国各个角落。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一篇文章记载：“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索引卡片包括大约300种有关对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书籍和小册子。”作者认为：“这只占全国发行的此类书籍的一小部分。”

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下，全国许多单位纷纷要求华国锋“亲笔题词”，上到“毛主席纪念堂”，下一个学校、一张小报。客观地说，华国锋同志的字并非很有功夫，却被一位省委书记赞为“字字重千钧”。有些地方群众大小集会，像唱《东方红》一样，唱起《焦城的山，焦城的水……》。北京市红星养猪实验场，更是把华国锋视察该场用过的茶杯、水瓶，坐过的椅子等物品，当成文物摆起来，供人们瞻仰。

一时间，仿佛在中国的大地上，又降临了一尊新的神。

## 二、韩丁直言：只有政治地位不稳定的人才需要这样的宣传

在毛泽东之后，又搞起华国锋的个人崇拜。然而华国锋毕竟不是毛泽东，如果说对毛泽东的崇拜具有某种“神圣性”和“神秘性”，而对华国锋的崇拜，则如让一个世俗演员头顶神圣的光环，扮演神的角色。观众一看就知道是演戏，完全失去了“神圣性”和“神秘性”。可以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悲剧，而对华国锋的个人

崇拜则更像演出了一场闹剧,它把个人崇拜的虚幻性暴露无遗——领袖明明也是普通的人,却硬要把他当成神。

从崇拜对象本身看,华国锋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新中国成立以后,做过县、地区、省各级领导职务,1971年到中央工作。应当说具有较多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一定的领导能力。特别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然而,华国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主要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辉煌的业绩和超人的才华,而是因为在毛泽东即将去世和“文革”造成的混乱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接班人问题迫在眉睫。此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与“四人帮”展开激烈斗争,毛泽东既看出“四人帮”不得人心,又对邓小平等不放心,不信任。由于华国锋在“文革”中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路线方针,得到毛的信任,于是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并为他写了“你办事,我放心”。

正如一本研究“文革”以后转折时期的历史著作所讲:“作为党政军三方面最高的领袖,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哪一方面看,华国锋的能力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同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和3000多万党员的大党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相比,显然极不相称。同时,由于他对整个中国的历史、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与研究,粉碎‘四人帮’后,也不可能提出符合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只能继承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方针和政策,紧紧坚持‘两个凡是’。”<sup>①</sup>华国锋上台以后的表现再一次证明,毛泽东之后掀起的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不是因为华国锋本身的光辉,而主要是借助于毛泽东的“圣灵”。这就更加暴露了个人崇拜现象的虚幻性。

从崇拜者群体看,明显不是出于对崇拜对象的虔诚,而是自身功利的考虑,或自身状态的反映。比较一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

---

<sup>①</sup> 《改革开放的历程》(王洪模等著),第4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我们可以看出,对毛泽东,绝大多数崇拜者有个共同基础:饱含感情并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华国锋,则各有不同。一部分“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出于个人利害考虑,既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极力制造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外国人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新的个人崇拜的组织基础做了如下分析:“十大选出来的1/3的中央委员消失了,其中75%是来自基层组织的同情‘左’派的代表。另一类人是潜在的‘左’派,他们是在最近几年里入党的,他们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其名额减少了70%以上。”一位十分卖力的制造和维护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中央领导人,在宣传部门的会议上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可见他并不真心崇拜华国锋,而是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和解释权。

就多数群众状况而言,他们容忍并接受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与其说是对华国锋个人的敬意,不如说是置身于“文革”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刚刚结束,又面临新的选择时刻,而出现的惊魂未定和大惑不解情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所做的分析,我认为是有见地的:“从当时社会思潮看尽管要求纠正‘左’倾错误的呼声日益强烈,但真正对历史有自觉反思意识者还比较少,多数人仍然处在个人崇拜和‘文革’理论的框架中思考问题。宁愿把‘文革’中的灾难看做仅仅是少数人的破坏,也不愿触及它的理论和毛泽东本人的错误。所以,当大规模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潮流涌来时,许多人惶惑不安,在观念上和感情上产生抵触。这种情况说明,拨乱反正的阻力不单单来自上层,也来自社会历史的惰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不少老干部。他们默认或同意如此宣传华国锋,甚至带头高呼“英明领袖”,除了习惯性延续“文革”和个人崇拜的思维模式,诚心维护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外,还出于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考虑,许多老革命家不在工作岗位上,由此寄希望于华国锋。

对于新的个人崇拜所暴露出的虚幻性,一些外国的观察家和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则感觉更为敏锐,反映更为直截了当。1977年7月4日,美国友人韩丁诚恳而直率地向有关部门提出书面意见,他说:

关于向国外宣传华主席,宣传毛主席信任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一句话。在中国这样的宣传已经很有力量了,中国人很好理解,但对外国人宣传,美国人理解不了,甚至产生副作用,他们由于不了解情况,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毛主席要选华主席为接班人?是在什么情况下选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进行选举?人民在选定领导人的大事中有没有参加意见?由此,你们对外宣传华主席为什么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还要寻找别的办法,总不能是毛主席一句话就选定了接班人……

形容词不要用得太多,说得过分也不行。在国外,只有政治地位不稳定的人,才需要在宣传中大加渲染,否则就站不住脚。留有余地使人易接受,要让人们从革命实践中来认识领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有如下评说:“对毛个人崇拜的维护给正在上升的对华国锋本人的个人崇拜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和基础,如果这个名望不足的接班人想在党和人民中建立某种地位的话,这种个人崇拜是非常需要的。”

### 三、在“维护旗帜”名义下宣传了错误的领袖观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反思,今天回过头来总结历史教训,我

觉得当年对华国锋的宣传,不只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和个别提法不妥,而是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名义下,从理论上宣扬了一套系统的错误的领袖观。在如何认识和对待领袖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如何认识和对待领袖和政党的关系问题上,如何认识和对待领袖内部关系问题上,以及如何看待领袖的作用、领袖的权力、领袖形象等问题上,宣传了许多违反科学、违反民主的错误观点。

其一,在反对“四人帮”问题上,不讲以四五运动为标志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不讲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抵制,不讲一批老革命家的重要作用,大事宣传“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不只是夸大领袖的个人作用,而是把领袖当成拯救斯民于苦海的救世主,明显背离了《国际歌》所宣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其二,宣传个别领袖人物决定国家、政党的生死存亡命运。在苏联蜕变问题上提出一个有名的公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使列宁创建的马列主义的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如何具体认识苏联的蜕变问题,当前有各种不同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暂且不论。仅从理论观点上看,恩格斯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sup>①</sup>“叛徒集团上台”说,不正是恩格斯所不赞成的“迷信时代”的观点吗?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其三,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个别领袖身上,鼓吹华国锋同志是“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子孙后代幸福”的“可靠保证”,“有了领袖华主席,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面对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禁心生疑虑: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幸福,完全寄托在一两个领袖身上,如果领袖病了,死了,或者犯了错误,国家和民族岂不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历史经验表明,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发展到“一人系天下安危”的地步,对于国家和民族也是十分危险的。

其四,在领袖与政党、国家关系问题上,片面地强调领袖与政党、国家一致性的方面,不谈有时候也会出现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方面,提出“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的错误口号。把领袖个人完全视为政党和国家的化身,并置领袖于政党和国家之上,这与封建主义鼓吹的“朕即国家”,与法西斯主义鼓吹的“领袖至上”的谬论,又有何区别?回想“文革”中和“文革”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曾把对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视为最高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对领袖稍有“不恭”即可被打成“反革命”,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难道不是和这样的口号有着直接关系吗?《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有针对性地指出:“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

其五,在领袖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宣传人民对领袖要“无限信赖”,“一切听从领袖的指挥”,不讲领袖要忠于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如高呼一切听领袖的指挥“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这样的口号就很不科学。领袖的正确又由谁来“保证”?如果领袖指挥错了呢?况且一个政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有着多种因素,领袖只是因素之一,是重要因素,但不是“根本”因素。即使从领导角度讲,根本性保证也只能是路线和制度,而不是个别

领袖人物。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时曾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sup>①</sup>,“即使君主下命令使一马克今后成为两马克,但是贸易却总是告诉您:这两个新的马克只值从前一个马克”<sup>②</sup>。

其六,突出个人,只讲领袖个人的领导,不讲党的领袖是个集体。《红旗》杂志1976年12期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就是《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所宣传的中心内容:“我们一定要遵照列宁关于‘保卫领袖’的教导,坚决拥护华主席,无限信赖华主席,衷心爱戴华主席,誓死保卫华主席。”其实这种宣传恰恰违背了列宁关于“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的思想。老革命家叶剑英曾指出:“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

其七,为领袖个人选接班人当领袖的不良做法涂上神圣的光环,直接违背了党的民主选举原则。如××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强调“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是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

其八,把“你办事,我放心”作为合格接班人的重要标准,把“两个凡是”作为办事的重要原则,把“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一种形而上学。辩证法的真谛在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完全按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版。

② 同上书,第124页。



老祖宗的旨意办事,只有老祖宗说过的才能说,才能做,没说过的——一律不许说,不许做,世界只能永远停滞不前。发展,不仅需要继承,而且意味着对上一代的部分否定,没有否定也就没有发展。邓小平曾讲:“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①</sup> 这两段话,确实值得每个关心党、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人深思。

#### 四、对“抬轿子”不应该也认真地研究一下吗

在毛泽东之后又搞起新的个人崇拜,首先是坐轿子者华国锋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华国锋作为领袖人物,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把他推向政治舞台的巅峰,同时也赋予他维护和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维护和推行个人崇拜的历史使命。也可以说,“左”倾路线和个人崇拜既让他尝到了“甜头”,同时也把他置于和历史潮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境地,从而成为来去匆匆的过客。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悲剧之后,华国锋的悲剧,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沉思。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个人崇拜看,“坐轿子”者均已先后受到批判。而抬轿子者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却很少成为研究的课题。这方面,胡耀邦曾为我们开了个好头。他于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1981年1月29日下午至30日上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一大段讲了这个问题,并且相当尖锐。他说:

我们党里面有些同志突出宣传个人,是因为他的理论水平不高,盲目性很大;但是,要警惕这么一种情况,也有个别人是党性不纯。为什么有的人坚持突出个人呢?坚持抬轿子呢?抬轿子是为了坐轿子……是为了他的私利,他要在这里面捞一把。我们有的人顽固地要宣传个人,吹喇叭,抬轿子,是为着他自己坐轿子,要宣传自己。我们要击破这个东西,要保持高度警惕,要坚决防止它泛滥,不许搞这一套,不许打着好像光明正大的旗号,什么我是为着党呀,为着阶级呀。其实,那个旗帜背后的那个东西,还是要暴露出来……要认识这个问题,使大家的头脑越来越清醒。讲了多少次话,如果说明年、后年还要坚持突出宣传个人,那我们就要指出,你这个不对,你有什么另外的打算?只有这么搞,才能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我们党的生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抬轿子”情况看,大体有三种:

一种是阴谋家、两面派。他们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此类虽人数极少,但危害极大,如林彪。

另一种为党性不纯、心怀私利者。他们为人处事不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而是投上所好,惟命是听,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紧跟寸步不离,响应喊声最大。其表现最爱讲五种话:一曰官话,只当“录放机”,写文章,作报告,通篇重复文件上的话,没有自己的态度、想法和语言,不研究具体情况,不提出贯彻意见,还美其名为“高度保持一致”;二曰套话,张口总有一套程式,即使讲一个

很小很小的具体问题,前面也要加上一大堆“高举”、“坚持”、“突出”、“紧跟”;三曰俗话,“有某某同志做领导是我们的福分”之类的话常挂嘴边,取悦领导,献媚取宠;四曰废话,本来心不在焉,无动于衷,却也要讲一大堆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话,以展示自己的“热情”;五曰假话,以一当十,弄虚作假,无中生有,指鹿为马,邀功请赏,坑害国家。

还有一种属于盲目服从型,习惯于跟着干,跟着走。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使许多人从小就受到“听话才是好孩子”的教诲与熏陶,习惯于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缺乏独立思考,自主意识,甚至把有独立见解、爱提意见者视为异端。进入干部队伍以后,不少人成为迎合型、适应型干部。一位省委书记很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的官员中,迎合型、适应型的太多,开拓创新型太少”,“整天就琢磨领导的意图,迎合领导的心理,而不是考虑现实的问题和困难,想办法如何去解决。适应型的,是领导说一句,他就办一句,说不出的他就想不到,或不去想,见到问题和坏作风,不是试图去改变它,而是随大流”。这种干部,如果碰上前两类人打着什么堂而皇之的旗帜,搞起个人崇拜,往往容易不假思索,不分是非,随声附合,起而应之。

要消除抬轿子现象,从根本上讲是取消“轿子”——解决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改革干部制度,健全民主制度和监督制度等。党和国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采取若干重大措施,着手逐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展望未来,仍是任重道远。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只有“硬件”不够,“软件”也必须跟上。进一步肃清个人崇拜中形成的某些违反科学、违反民主的思维模式,树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观念,也至关重要:

——在真理观念上,破除“惟书”、“惟上”、“两个凡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树立科学的思想观念。信仰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离开科学,信仰就会变为迷信。

——在党性观念上,破除“盲从”、“紧跟”之类的愚昧精神状态,树立自觉意识。共产党员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而献身,才是根本的党性,应该积极地、自觉地维护党的统一,遵守党的纪律,而不是盲目的“听话”和消极的服从。

——在做人观念上,破除“投门子、找靠山”、“人身依附”、“贾桂思想”,树立民主平等意识,自尊自重,堂堂正正做人。有位学者说得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在做事观念上,破除不顾人民利益,不看实际情况,惟“长官意志”是从,“耍花活”、“练为看”等不正之风。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大师但丁有一句名言:“公民不为他们的代表而存在,百姓也不为他们的国王而存在;相反,代表倒是为公民而存在,国王也是为百姓而存在的。”我们在做事中绝不能把关系颠倒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人民的公仆”与“人民的老爷”的分界线。

## 第二篇 “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

### ——以世俗眼光看领袖碰到的理论问题

“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是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领袖也是人，研究领袖也需多角度、多层次展示“人”的形象。领袖不同于普通人，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他的许多活动都和政治有着密切关系。政治活动，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领袖又是普通的人，也还有许多与政治关系并不密切或非政治的活动，如领袖也有七情六欲，也要衣食住行，也有家庭、爱情、亲情、友情。这些对于“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了解领袖也是很重要的。怎样认识和处理领袖人物的政治与非政治、伟大与普通、崇高与世俗的关系，既不搞一切“政治化”，也不能搞庸俗化，是需要着力解决的课题。

## 第一章 “领袖是人不是神”

### 一、毛泽东走下神坛的尴尬

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走下神坛,一批反映领袖个性、亲情、友情以及家庭生活的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人们感到:领袖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感情上更沟通了。然而他老人家,也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

有的给毛泽东脸上抹满了泪水,把他变成感时伤世、哭哭泣泣的市民。某作家写的《毛泽东看“白蛇传”》,短短一页文字,六次描写毛泽东哭泣,共占了大半页。最后,还让毛泽东出了个大洋相:看到法海把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大声说“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作者还描述说:“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想,作者当时大约并不在场。即使在场,舞台下光线昏暗,也不可能对毛泽东做如此细致深刻的观察。这里,显然过多地体现了作者的想像力。

精于生财之道的小店主们也没有放过毛泽东,他们硬要毛泽东穿上花红柳绿的推销员服装,为店主们招徕顾客。你看:“毛家菜”、“润之酒家”、“润之益智膳”……曾在市井之上一时叫得好响。

更有甚者,为毛泽东穿上江湖术士的八卦仙衣,吟唱开国大典上28响礼炮的奥秘:“毛泽东的28声礼炮,不是自然数28,而是‘二八’之意,‘二’即阴阳二仪,‘八’便是八卦之八。这是传统文化精华之核心。”很明显,这又是一种新的“神化”。

上述种种现象引起我想一个问题：走出神化领袖的误区，怎样理解“领袖是人不是神”呢？所谓“人化”，难道就是在宣传领袖“伟大”一面之外，在领袖身上多加点“人情”、“泪水”等世俗色彩，就行了吗？事实表明，这样的宣传既容易把领袖“俗化”，也容易出现新的“神化”。原因就在于，在某些人看来，“伟大”与“世俗”还是两张皮，领袖被描写为具有“两重人格”，一个伟大的人，另一个世俗的人，两者毫无关系。

看来要正确体现“领袖是人不是神”，仅仅加点“人情”与“泪水”是不行的，必须从方法论上克服长期流行的，对历史人物形而上学和简单化的倾向，从总体上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

### 1. 以“发展观”取代“一贯论”。

“一贯论”把人分为两类，好人一贯好，坏人一贯坏，以凝固不变的观点看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其表现为，歌颂谁，谁从娘肚子生下来就完美无缺，即使有缺点，做过错事，也要“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否则“有损形象”；批判谁，谁就光干坏事不干好事，即使干过一些好事，也不能再提，否则就是“为坏人翻案”。

其实，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或犯严重错误的人，都不是天生的，都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过来，否定旧的东西”<sup>①</sup>。即使是毛泽东，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曾做出过伟大贡献，然而到了晚年，却犯下严重的错误。对张国焘这样的人物，也不能搞形而上学。有的书指责他从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小孩子有几个从小就四体勤快，能识别五谷呢？张国焘参加革命确实掺杂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我看也无须过多的指责，历史上有多少人一参加革命队伍就是“百分之百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呢？问

<sup>①</sup>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题在于,许多人在革命熔炉中认真改造自己,逐渐成为优秀的革命家。而张国焘则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个人欲望、个人野心不断膨胀,终于在个人与组织发生尖锐对立时,走上叛党投敌的反革命道路。

## 2. 以“具体分析”取代“绝对化”。

70年代初,曾出版过多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在党史领域,在全党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斗争史》在处理领袖内部关系问题上,大搞形而上学。领袖之间要么完全一致,要么完全对立。夸大分歧方面,并把它绝对化。其表现为:一是所谓路线斗争无时不在,无所不在,领袖间的任何分歧,包括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方法,统统被视为两条路线;二是所谓两条路线水火不容,领袖集体内出现的任何不同意见,都被看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对立,严重混淆了矛盾性质;三是把“以人划线”推广到历史领域,在毛泽东还没有成为全党正式领袖的时候,就把对毛泽东的态度视为衡量对错、辨别是非的标准,作为衡量历史人物功过的政治标准。

《两条路线斗争史》被否定以后,它所体现的思维模式,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怎样认识“古田会议”前朱德与毛泽东争论的问题,一直成为史学家们关注的热点,并且各种意见争论不休。对于类似古田会议这样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我觉得要求得研究的深入和分歧意见的统一,关键在于思想方法上须取得一致的理解。

首先,对分歧和争论要做具体分析。不要一提到“分歧”,就是一方完全正确,另一方百分之百错误。“争论”、“斗争”就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争论双方有多种情况,有的一方基本正确,但有缺陷;另一方基本不正确,但有合理的方面。有的双方各有合理因素,又各有缺陷。有的属于具体方法,哪种都行,没有原则性是非。有的纯属于个人之间的义气用事,领袖也是人,也有



七情六欲。“争论”“斗争”，有时是一方压倒一方，战胜一方，而更多的情况是，通过争论，斗争，互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发展了正确认识。分歧和争论的出现，总是使双方的意见表达得更加充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其次，不要把关于“政治问题”的分歧和争论，统统视为政治问题。“党的领导”在我国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对于“党的领导”有不同看法和争论，并不是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而是可能存在着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一是要不要党的领导？是拥护还是根本反对？二是如何实施党的领导？如何处理党的集体领导与个人领导的关系？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也很复杂，要分清是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体制问题，或是个人品质问题。三是领导方法上，什么方法好？什么方法不好？属于领导水平、领导经验问题。

对待领袖犯错误也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人们常言，“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存在的，在一些领袖人物头脑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还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是不值得奇怪的。他们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说明他们的世界观从整体上看，或者说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能因为他们有某些错误，而否定主流和整体。对于出现错误的原因，要作具体分析。领袖也是普通的人，不仅有认识原因，有时个性、习惯、偏爱，甚至人事关系，都对事物的看法与处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3. 以“综合分析”取代“路线决定一切”。

在论及路线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时，有些提法不科学。如“文革”中曾出现过风行一时的说法：“路线决定一切。”后来虽然很少提了，但这种说法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有时还可以看到。“路线决定一切”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路线正确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路线不正确有什么都会丢掉；二是路线正确一切正确，路线错了一切皆错。这些提法，明显地带有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毛病。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路线也只能决定

最主要的问题,不能“决定一切”。革命事业发展中的“一切”,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如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性乃至会遭到暂时的失败,就不是路线正确能完全避免的,而是受到敌我力量对比、社会历史大环境等许多因素的制约。就一个具体社会事件而言,大的路线正确也不能保证一切正确。许多具体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经历由不够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也是常有的事。

对于犯错误的领袖推行的错误路线,有些说法也不科学。如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左”、右倾路线,在一个很长时期,我们的解释遵循这样的模式:个别领袖由于阶级出身或世界观问题,一贯具有“左”倾或右倾错误思想,一旦他们掌握了领导权,便在党内强制推行错误主张,于是形成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或右倾路线。这种解释的根本问题在于,把“左”、右倾错误思想看成某些领袖身上所固有的,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出现与形成,是由于这样的领袖掌了权。实际上是把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出现,主要或完全归于某个领袖,不适当地突出了领袖个人的决定作用。

我们讲历史的进步和胜利时,强调摆正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讲历史的挫折与失败时,也要注意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问题。一次错误倾向的出现,无疑个别领袖起了重大作用,甚至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领袖对错误负有重大责任。不看到这一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更要看到,领袖是政党或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的问题不能仅仅归于本身的原因,往往代表了一种倾向。

#### 4. 领袖不只是“政治形象”,也是活生生的人。

1961年,有一天陈毅副总理陪同周恩来总理到电影演员白杨家里,了解知识分子的生活情况。演员们和领导一起有说有笑、无拘无束地谈论电影工作情况。在谈到电影人物表演时,陈毅副总理讲了一番话,不仅在当时使演员们颇开眼界,就是今天读来也发人深思。陈毅说:“你们电影里演的那些领导干部,我一看就有气,

他一出场就把手背在身后,说话装腔作势,总是端个架子。只会板起面孔训人,专整人家的思想,自己就没有思想问题?也没有感情,不通人情!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总像这样还了得,打起仗来谁来掩护你,不打你冷枪才怪呢!”

在领袖人物的宣传方面,确实存在着陈毅所指出的问题。把领袖人物神秘化,一切不同凡人,不食人间烟火;把领袖政治化,不存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把领袖原则化,事事冷冰冰的讲“原则”,根本没有普通人的感情。这种搞法,不仅严重地歪曲了领袖人物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群众中制造了浓厚的个人崇拜的迷雾。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并不因为他是天上什么“星”下凡,或什么“龙种”再现,而是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更远些,观察更深些,思维更敏锐、组织能力更强些。领袖,是某一人群的带头人,自然也是人。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吃五谷杂粮,同样有七情六欲。因此,人类所有的特点,包括优点与弱点,领袖人物身上当然也都会有。马克思在给一位与之发生争吵并动了肝火的朋友写信,坦率地说:“你不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并反躬自问一下,你在这种时刻能够不失掉自制力吗?”“如果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那我随时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sup>①</sup>后来马克思还把“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列为他“最喜欢的格言”<sup>②</sup>。

我们讲从“人”的角度认识领袖,是指出仅仅从阶级的、社会的层次认识领袖是不够的,还要从人的自然本质这个层次上认识,才是完整的认识,才能懂得“领袖是人不是神”的全部含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1页。“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又译“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原话出自戏剧《自我折磨者》第一幕第一场:“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版。

## 二、家庭,不是培养领袖的摇篮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和儿时的生活经历,对一个人性格、品格的形成会打下深深的烙印,对一个人素质的养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生活、生产单位,内部成员的关系不是政治关系,而是血缘关系、亲情关系。因此,不管哪个阶级的家庭,父母或长辈的性格、品德、修养、文化状况,对子女的成长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出身于佃农家庭的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饱含感情地说“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

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回忆起母亲立即深情满怀。他对斯诺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毛泽东还亲写《祭母文》:“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周恩来,家庭“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异常深刻的”,即使是在和国民党紧张的谈判中也没有忘记母亲,他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还对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到两位母亲的具体影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

家庭出身的影晌是深刻的,但不是绝对的,个人的悟性如何,

更为重要。同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的全盘继承了剥削者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孝子贤孙”;有的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自甘堕落,成为“不肖子孙”;有的则从旧家庭一角感受到旧社会的黑暗,勇敢地去寻找真理与光明,成为本阶级的“逆子贰臣”。出现上述巨大差别,固然原因很复杂,但都和个人的悟性有着密切关系。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虽然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目睹了父亲不讲骨肉情义乘兄弟之危买田地的事,不但不赞成父亲的做法,还促使他想了许多问题。直到几十年以后,毛泽东见到堂弟毛泽连时还谈及此事:“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

家庭影响是重要的,但不是孤立的,更不是惟一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离不开整个社会而孤立存在,因此家庭影响从人生之始就有很强的社会性。古代的婴儿绝不会从一降生就感受到电灯之光和民主空气,现代的婴儿在摇篮里也绝少能听到母亲哼“小白菜啊,地里黄啊”之类的歌曲。从儿童进入青少年时期,随着接触社会机会的增多,家庭影响逐步减少,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包括大的历史背景、小的具体环境、亲戚关系、学校、老师、同学、朋友、书籍等。这也正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出身于不同阶级、阶层的青少年,能够共同走上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人生之路的重要原因。只看到家庭影响,忽视社会影响,搞“唯成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仅看到社会影响的共性,而忽视偶然性在人生之路上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主义态度。有时,一次婚姻的失败,或者遇上一个好老师,交上一个好朋友,读了一本好书,这些偶然因素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也不少见。

当前,有些领袖传记的作者和研究者,陷入一个认识的误区。过分夸大家庭的作用,甚至把领袖出身的家庭视为培养领袖的摇

篮。千方百计地从领袖出身的家庭情况、父母情况、乃至祖宗情况和居住环境情况,去寻找领袖的基因和某些必然性。不少领袖人物的传记,从3000年以前的家族起源说起,历数祖辈的风流人物。“续家谱”以及借助种种人杰地灵现象,成为一种时尚。

其一,渲染领袖的家庭出身都是树大根深,源远流长。

考察祖宗八代成为领袖传记的重要部分,续族谱日益成风。有一本陈独秀的传记,考察陈氏家族“八十三世”,证明其“是虞舜的后代,妫遂之子满,为开国君主……封于陈”;某出版社向社会大力推荐的《韶山毛氏族谱》,“十六卷,二十九巨册”,考证“毛氏家族本姓姬,是周文王之子毛伯郑后代”。近年来,“毛泽东家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发表的有关著作和论文,至少不下数十部、篇。

“家谱”、“族谱”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做些专门的研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把它们作为研究领袖的一个重要内容,功夫越大,分量越来越重,几乎达到“传不离谱”的程度,则是很值得商榷的。一位家谱研究者指出:“家谱作为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之一,在家族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主要起着团聚族人而不溃散,维系家族内部的团结;确认家族的世袭血统,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用不入谱、‘除籍’(谱)等手段处罚族众,维护家族势力的统治作用。”<sup>①</sup>今天,借助这样一种封建家族制度的历史现象,来研究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实在没有必要。试问,二十二代或八十三代祖先的作为,对一个孩子究竟能有多大影响呢?况且,领袖在儿童时代是否熟读过他的家谱、族谱,也还是个大大的问号。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无助于对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了解,反而容易制造某些认识上的混乱。如前面所引,考察陈独秀八十三代祖是“开国君主”,毛泽东的多少代祖是“周文王之子”,无非是告诉人们,领袖人

<sup>①</sup> 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文史知识》,1996年第9期。

物都有非凡的家族背景,都是帝王之后!

修“家谱”、“族谱”之风,已由领袖人物的传记走向寻常百姓家。《光明日报》1995年12月21日有篇《农村“修谱”之风不可长》,值得一读:

近年来,在一些农民中由民间集资编纂族谱的现象颇为盛行,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族谱的装潢、印刷也日趋精美,并配有插图和彩照等。它们堂而皇之地走进宗族的每个家庭,并以一种无形的力量统治、压抑着族中的人们。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妨碍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埋伏着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其二,渲染领袖的出生地“风水好”,地灵出人杰。

一本关于毛泽东的小册子,这样描写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出生地“自衡山绵延而来的‘龙脉’,经过韶峰、乌石峰迤邐北去”,有个“神灵”断言此地“早晚必有三条飞龙腾空而起,一黄,一乌,一白,令山河增色,天下震惊”,“到上个世纪末,从这里果然腾出两条飞龙:黄龙是毛泽东,乌龙是彭德怀……至于那条白龙,或许还蛰伏在地下呢”!另一本关于陈独秀的传记则说:陈独秀“生于独秀山,宗门对着独秀山,秀山秀水给了他家好风水”,“安庆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的一管笔,给他镇住了文采,他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乃至具体到一条河、一座山,对人的素质的形成,有没有影响呢?应当说有。山清水秀,绿树红花,养成了南方人的聪明能干而富有灵气;银妆素裹的千里平川和大漠高原,孕育了北方人的豪爽朴实、吃苦耐劳的品质。然而成为领袖的人,既有聪明能干者,也有豪爽朴实者。某一个人能不能当领袖,纯属社会变化中的具体现象,是由社会规律制约和决定的,与自然环

境根本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说自然环境决定一个地方能不能出领袖,那么韶山的“龙脉”已经存在千万年,为什么早没有出,晚没有出,单单到20世纪才出现一个毛泽东成为领袖呢?如果说只有“风水好”的地方才能出领袖,那么常州小城中有个“偏僻的小巷——青果巷”,被传记作家称为“没有阳光的地方”。这里肯定没有什么“风水”的。然而在这个没有阳光的小巷里,却诞生了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领袖人物瞿秋白,又作何解释呢?

这里,我们从理论角度回顾一下历史上有名的“地理环境决定理论”,是有好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理论”产生于18世纪,其创立者是赫赫有名的孟德斯鸠(法国人)、巴克尔(英国人)和拉采尔(德国人)等。他们认为人和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即社会生活的外部条件)的产物,人类的体制和心理状态,人口人种,文化高低,经济兴衰,国家强弱,社会发展,都由自然环境支配,自然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理论的出现,对反对封建社会的神意决定一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曾广泛流行。然而“地理环境决定理论”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它用外部条件解释社会现象,以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陷入形而上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理论为更加科学的认识所取代,即:地理环境是社会经常和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它不具有决定性影响,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都曾宣扬或相信“风水”,高呼“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以自己的出生地“风水好”,有“龙脉”,证明应该当皇帝。这样做对原有的皇权是个挑战,对农民起义的发动具有积极意义。然而,“风水”说毕竟是不科学的、愚昧落后的思想,并且在其发展中充满了迷信色彩,我们今天应该抛弃。

其三,表现领袖的青少年时代,过分理想化、政治化。

儿童和青少年时代,是人了解和学习生活的起点。俗话说,



“不懂事的孩子”，孩子的特点就是不懂事，从不懂事开始学习懂事。孩子所生活的基本环境和主要环境是家庭，而对社会的接触和了解，尚处于表面和片面状态。某些领袖人物尽管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超常的天分，然而他们终归是人，不是神，上述人生阶段的主要环境和主要特点，他们也是无法超越的。翻看我们有些关于领袖的传记和著作却不然，他们离开人生发展的常规和青少年时代的特点，尽力表现领袖人物“自小就不平凡”，以致过分理想化和政治化。

学习，是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重要事情。学习，总要经历从被动到主动，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理性的过程。这些，被近现代的儿童心理和教育学家们称为规律。由于中国传统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上存在明显的缺陷，许多儿童对枯燥无味的内容不感兴趣，对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表示反感，也是合乎情理的事。然而不少领袖传记和研究著作，却对领袖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碰到的这些问题，大加赞美，把本来应该学习走路的孩子，写成一下子就满天飞翔，违反了科学。在他们笔下，几乎所有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学习，就对四书、五经、八股文有深刻的认识，“看不起八股文”，并且表现出强烈的“离经叛道精神”。请问，十岁左右的孩子，这个水平，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和《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 17 岁那年，由于目睹了彭铁匠起义并遭镇压，特别是“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8 岁，“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上述历史材料表明，毛泽东到 17—18 岁，才开始有政治意识，其内容是爱国主义、反对专制、主张民主。

而有的领袖传记和研究著作，则把领袖们描写为从小就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这个“政治意识”的内容，不是爱国主义和民主精

神,而是“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

如:1905年12岁的毛泽东到外村上小学,这所小学有乡土观念,不大乐意录取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答题中做了一首《言志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实事求是地说,这首诗确实表现了儿童时代的毛泽东强烈的个性和非同一般的抱负。然而,有些研究著作却从这首诗中看出,毛泽东“抒发了自己求学以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救国救民”缘何说起,实在不得而知。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外出到高等小学读书,离家时曾录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很赞成《毛泽东年谱》对此录诗的评价:表达了毛泽东“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然而有些传记著作,却把此事拔高为“毛泽东立志求学,投身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甚至认为,“少年毛泽东的心底深处”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阶级对立的政治意识开始产生了”,“从此,他的思想和行动,就同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把“投身革命事业”、“阶级斗争”和20世纪初刚刚读高等小学的毛泽东联在一起,是否有点过分“政治化”了呢?

有些丑化毛泽东的著作,也是把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过分政治化,从而导出错误的结论。如有的把毛泽东后来表现出的强烈革命精神和彻底的革命理论,归结为他儿童时代和父亲有矛盾,是“仇父情结”的发展。台湾某些“学者”则从毛泽东儿童时代和父亲的矛盾,“证明他生性邪恶,注定最后要沦为匪或某种叛逆”。对此,《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有一段话讲得好:“其实,这种冲突是很普通的,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做父亲的常像毛泽东的父亲那样,以高压手段管教子女。而且,毛泽东对待他父亲的态度并不完全一味痛恨,从他对斯诺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从后来得到的其他材料来看就更加清楚。”毛泽东儿时和他父亲的矛盾,纯属于家庭矛盾、亲情矛盾,根本不具有政治矛盾、阶级矛盾的性

质。把两者硬拉在一起,既把家庭政治化了,也把阶级斗争庸俗化了。

我认为,要正确地认识和反映领袖的出身家庭和青少年时代,必须解决以下几个认识问题:

(1)家庭是婴儿的摇篮,不是领袖的摇篮。领袖是政治环境的产物,列宁讲“‘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sup>①</sup>,构成领袖的这些基本素质和才能,只有在社会的政治实践中才能产生出来。而家庭只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它虽然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只是血缘关系的组合体。成员间是血缘关系、亲情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因此,家庭对人的体魄、性格、心理品质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可以培养和造就出好的儿童,却根本无法培养和造就出政治领袖。

(2)领袖的青少年时代不是领袖。英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卡莱尔,在谈及人们认识领袖人物时常常出现的一个错误,是“用他们一生的终点来替换他们一生的过程和出发点”,一些传记和文章用赞美领袖的热情和目光来赞美和叙述领袖的青少年时代时,恰恰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人才学把人的一生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幼儿期——求学期——创造期——成熟期——老年期。青少年时代属于求学期,是学习人生的阶段。青少年时代对人生以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要成为真正的人才,还必须经过“创造期”。领袖也是人才的一种,不可能违背这个发展规律。

(3)研究领袖的生长家庭和青少年时代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为怎样才能培养领袖,而是为怎样培养优秀人才提供历史的经验。古人云“人人皆可以为圣贤”,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领袖。我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5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们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却不一定能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造就出色的领袖。历代封建王朝通过建立“王储”的办法继位的皇帝,绝大多数是平庸者,并不能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领袖。而那些建立宏图大业的真正领袖人物,都是在斗争风雨中经过激烈的竞争,应运而生的。一句话,培养出人才,时事造英雄。了解了这个关系,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视角,来认识和研究领袖的出身家庭和青少年时代。

### 三、“领袖是人不是神”——一种科学的领袖观

年轻人常常把“领袖是人不是神”当成一句时髦的口头禅,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却包含着许多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经历。

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个人崇拜逐渐盛行时,我们曾以虔诚的、带有狂热的情绪,衷心拥护。当时有个朴素的想法,歌颂领袖还能有什么不好,越说好越好。“文革”初期,“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忠字舞”盛行,我从心眼里不感兴趣,甚至反感。看到许多人欢欣鼓舞地去做,内心引起阵阵痛苦,反复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感情有了变化,跟不上形势了?后来听到一位同志因说“毛泽东思想也能一分为二”,被打成反革命,我感到吃惊。“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这是毛主席讲的话呀,既然是普遍规律,自然适用于一切,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有位上级严肃地教育我:要从政治上看问题,理论要服从政治。从此,我再碰到这类感到矛盾不解的事情,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只要政治上对革命事业有利,理论上就不要太书呆子气。

“9·13”事件发生,惊得我几天之内脑子里一片空白,随之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思。最“高举”、“紧跟”的林彪,干出阴谋加害毛泽东主席的勾当,表明鼓吹个人崇拜并不是真正拥护领袖、

热爱领袖,并不是对革命事业有利,而是相反。从大多数群众看,个人崇拜把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引向了邪路;从党内看,个人崇拜在堂而皇之的外衣下,不仅鼓起了阿谀奉承之风,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并且扼杀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动脑子盲目服从,“一切紧跟、照办”,“紧跟就是方向”,“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程度”。如果全体党员都如此,这个政党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事实说明,“只要政治上对革命有利,理论上就不要太书呆子气”,即:只要政治上有利,不管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客观上往往成为实行错误政治的一种托词。无产阶级政党干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事情,怎么可能对革命事业有利呢?

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并非贬低领袖,而是把领袖由“神”的地位,恢复到“人”的地位,从而恢复和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观。

领袖是什么?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看法。

封建主义认为:皇帝是天之子,皇权神授。“君、父一也”,即皇帝就是父亲,人民都是皇帝的儿子。“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父,至尊也”。即皇帝和父亲,在国家和家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国家和家庭的主宰,“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人民一切都要俯首帖耳听命,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皇帝手中。文学家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愤然揭露这种不合理的关系:“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对封建君主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18世纪法国人卢梭提出“人民主权”学说。他首先向君主权力至高无上、个人独裁发出挑战,指出,治理国家是极复杂而繁重的工作,要把国家治理好很难,“君主制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致命缺点”,是“由惟一一个人治理,要把它治理好就越发难了”。卢梭认为:“执政者

不能是别的,而仅仅是主权者任用的官吏。他们的任何权力,只能以主权者的托付为依据,如果愿意,主权者可以限制这些人的权力,改变这些人的权力,甚至将他们的权力全部收回。”后来,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又为“领袖”下过多种定义。如有的说:“领袖使追随者去做领袖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资产阶级的领袖观与封建君主观比较,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的巨大进步。然而资产阶级领袖观有个重大的缺陷,是它自身无法逾越的。这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决定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看法极其片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英国 19 世纪的思想家卡莱尔认为“照我看来,世界历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完成的历史,实质上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劳作的伟大人物的历史……他们是全体人民群众本来就力求实现,渴望达到的一切东西的创造者”,“臣民无王一事无成,而无臣民的君主却可以做点事情”。德国思想家尼采甚至轻蔑地说:“人类不过是供实验用的材料,是一大堆多余的废品,是一片瓦砾场。”即使是我们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对待群众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偏见,他说:“照我看来,这四万万人都像是阿斗。”看来,不管资产阶级怎样讲民主,事实上还是把领袖摆到居群众之上的救世主位置。

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及它的领袖观。马克思指出:“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神圣化……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sup>①</sup> 恩格斯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观,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sup>②</sup> 这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80 页,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2 月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238 页注,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8 月版。

话表达了两个观点:①领袖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②领袖不是神,而是人。是比一般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的人。后来有一个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否定权威、否定领袖之风盛行。列宁着重强调了领袖的作用,并阐发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他讲过一段有名的话:“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 他指出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一致性,并指出领袖是一个“集团”。

为什么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曾出现过严重的个人崇拜呢?有人把这一现象的出现完全归于封建主义,甚至指责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是封建专制者。这一看法不仅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偏见。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应该对这一历史现象做具体分析:

1. 历史上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产业无产阶级很少,绝大多数是个体小农经济的农民。处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农民,不仅生产方式落后,而且生活在一个一个彼此孤立分散的状态,马克思曾把这种状态形容为“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②。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广大农民成功地进行了民族民主革命,农民成为革命的

---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198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主力军,最主要的同盟者。在这种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使个人崇拜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2. 由于俄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发生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毫无民主的国家。弱小的革命势力要想战胜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必须有高度统一集中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又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和封锁,使得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形式,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加强。如在各种组织、民众团体乃至经济管理中,不加区分地实行“军事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强调“党管一切”;在党的领导中,处处强调“书记挂帅”,等等。即使在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以后,这种状况仍然被延续下来。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制,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容易形成惟命是从、猫鼠关系,甚至人身依附关系。由此可见,高度集中的体制是产生个人崇拜的重要组织原因。

3. 个别领导人的精神状态,也是形成个人崇拜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俄国革命在列宁领导的时期,并没有出现个人崇拜,而是到斯大林当权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没有形成个人崇拜潮流,而是到60年代以后才愈演愈烈的。斯大林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巨大的荣誉面前骄傲起来,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斯大林一直有意要给他个人制造一贯正确的光环”,“以至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写苏联共产党的历史”<sup>①</sup>。同样,在新中国成立初

---

<sup>①</sup> 【苏】H. H. 马斯洛夫:《苏联(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期的一系列成绩面前，“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sup>①</sup>，由不赞成个人崇拜到欣赏个人崇拜，并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有不正确的和“正确的”两种个人崇拜。林彪、康生等人正是利用了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说法，掀起神化毛泽东的热潮。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神化领袖的迷雾，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sup>②</sup>后来，中央陆续发表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以及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叶剑英的《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胡耀邦的《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等文件，从理论上对神化领袖的种种表现提出批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系统地阐发了如何科学地认识和对待领袖问题：

1. “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sup>③</sup>。

2. 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

---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③ 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2月24日），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9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sup>①</sup>。“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领导,更不等于反党。”<sup>②</sup>

3.“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更不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sup>③</sup>。

4.“少宣传个人”。“突出个人”“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的遗毒”<sup>④</sup>，“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sup>⑤</sup>，“人总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没有完人,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人”,“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sup>⑥</sup>。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②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④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80年7月30日),见《中共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0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⑤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1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⑥ 胡耀邦:《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980年11月23日),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9—56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 第二章 关于“仆从眼中 无英雄”的对话

170年以前,黑格尔老人曾就“仆从与英雄”的问题,发表过一段慷慨激愤的议论:

“仆从眼中无英雄”是一句有名的谚语,我曾加上一句——歌德在十年后又重复地说过——“但是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仆从给英雄脱去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等等。历史的人物在历史的文学中,由这般懂得心理学的仆从伺候着,就显得平淡无奇了;他们被这些仆从拉下来,拉到和这些精通人情的仆从的同一道德水准上——甚至还在那水准之下几度。<sup>①</sup>

黑格尔是英雄的崇拜者,他对那些贬损英雄、丑化英雄的言论极为反感,他的话确实表现出明显的偏激。因此多少年来一直成为有争议的话题。赞成者认为,伟人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灵魂”,仆从不过是“多余的废品”和“瓦砾”,仆从根本不可能理解英雄;反对者则说,历史是由奴隶创造的,奴隶才是真正的英雄,伟人不过是“公仆”;还有人主张,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英雄和仆从,统统是“凡人”。随着世界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人

---

<sup>①</sup>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1页。

们不甘于理论殿堂上,就“仆从与英雄”的问题坐而论道了,把这场讨论扩展到怎样认识领袖人物的许多具体方面。

## 一、权威与崇拜

甲:前些年有过一篇名为《巨人时代的结束》的文章,提出一个新的观点:20世纪前半世纪是“巨人的时代”,“即将进入90年代……普通人、小人物越来越多地走向了历史的前台。他们是自我的主宰,还要做社会的主宰,他们要实现自我”。你的看法如何?

乙:这篇文章我读过。把历史分为“巨人时代”和非巨人时代,或者称之为“带着‘人人皆为主宰’的纯情”时代,我认为是不正确的。首先,把本世纪前半叶描写为“半个多世纪中,在这个世界中几乎听不到普通人的声音,看不到普通人的身影,人间的‘神’主宰了这个世界”,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如果没有千百万普通百姓的觉悟和积极参加,光凭一个或几个“神的主宰”,中国革命能够形成如此宏伟的规模,并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吗?其次,认为发展商品经济,从此不需要“历史巨人”,只需要“人人皆为主宰”,人人“实现自我”。这种看法,是对商品经济的误解,也是商品经济的消极反映。作者所要否定的“历史巨人”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等人,难道不是都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吗?

甲:看来反对个人崇拜,主张“领袖是人不是神”,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否认领袖的作用和价值。

乙:“权威”是什么?“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这些话对有些人说来感到很不好听,然而事实如此。“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

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sup>①</sup>,但是,什么社会都需要权威,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取消权威。恩格斯曾针对有些人认为工业现代化社会不再需要权威的说法,指出,“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工业本身。”<sup>②</sup>

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乙:不止。有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不认为“权威”是坏东西,而是社会所必需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卡莱尔就曾指出:那种认为“自由和平等,不再需要任何权威”的想法,和“这么多镀假金的硬币在市场上流通,所以人们普遍相信,真金不再存在”一样,是幼稚的。他还说“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是多么必要的;没有这个权威,革命就不能兴旺或持续下去”,“人们之间的行动没有比统治与服从的行为更道德。在不应服从时断然服从,在应该服从时拒绝服从,都是可悲的”<sup>③</sup>。当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虽然对权威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都一致肯定需要权威。他们说“在现代社会中,不以权威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是绝不会稳固下来的”<sup>④</sup>,“在一个更加民主的时代,权威也绝不会颠倒过来”<sup>⑤</sup>。

---

①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 同上书,第2页。

③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第322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

④ 【英】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第1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⑤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第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

甲：那么，承认权威与个人崇拜两者究竟有何区别呢？

乙：英国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卡莱尔，在其名著《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对崇拜和个人崇拜做过详细的考察。他认为，崇拜是蒙昧时代的产物，“崇拜是超验的惊奇，是没有任何限制或标准的惊奇。这就是崇拜。对这些远古的人来说，他们看到在他们之外存在的万物，都是神一般的東西或神的标志”。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作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出现，人们也由对自然和神的崇拜转向对人的崇拜，如《圣经》所说：“这真正的神灵显现就是人！”个人崇拜，实质是人们对统治者，或“对伟大而智慧的人的敬畏和屈服”，所以卡莱尔说：“把伟人当神，这是一个粗俗的大错误。”他乐观地指出：“最古老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历史上，将不会再有哪一个人能伟大到被他的同类视为神的地步。”

卡莱尔正确地指出了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表现和实质。然而他对未来的预言，却被后来的许多历史事实否定了。个人崇拜之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长期时隐时现，难以根除，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有如下因素起作用：

一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还有许多未能认识的领域，在急剧而又复杂的自然与社会变动中，难于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容易使人们，把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与希望，寄托于一两个经过神化的领袖人物身上。

二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尚属远非人类理想的社会。体制上的弊病，如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机制；民族文化素质不高，民主意识欠缺；实际存在的的不平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容易出现对权力拥有者的“敬畏和屈服”。

三是从人类心理上看，历史巨人或有杰出才能的人物所闪现的耀眼光芒，一下子把人们认识上的迷途照得很远很远，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满足。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认识上的盲区，把“一下子”展现的认识之途上的“很远很远”，误当做认识上的尽头——终极

真理的实现,从而产生盲目的个人崇拜。

甲:这样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个人崇拜问题,大大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希望您进一步具体讲讲,科学的权威观与个人崇拜两者的区别。

乙:承认权威和个人崇拜是两码事。人们要想顺利地从事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各行其是,“人人都做自我的主宰”是不行的。为了取得最佳社会效果,人们还必须在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上,自觉地服从“别人的意志”。这个“别人的意志”,就是权威。个人崇拜是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承认权威则是现代生产关系所必需的;个人崇拜是把整个社会的命运交给一两个人手中,绝大多数人盲目跟从。承认权威则是为了使每个人对社会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作用,自觉地进行个人与社会的协调。

具体地说,科学的权威观与个人崇拜有以下三点区别:

第一,科学的权威观具有民主性。他所强调的权威,是集体意志的代表;他所强调的服从,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离开这个根本前提,片面地强调领袖个人的权威,强调对领袖个人意志的服从,则是个人崇拜。

第二,科学的权威观具有相对性。即权威本身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它受法律制约,接受群众监督。而个人崇拜则鼓吹“绝对权威”,即人们对权威要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文革”中林彪一伙“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时,毛泽东曾指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权威都是相对的”。

第三,科学的权威观强调理性。要求人们提高认识,理性的服从。而个人崇拜则鼓吹蒙昧主义,强调“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 二、伟大与普通

甲：黑格尔在“仆从与英雄”的议论中，还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现象，即：英雄“被这些仆从拉下来，拉到和这些精通人情的仆从的同一道德水准上——甚至还在那个水准之下几度”。我认为，我们在认识和评价领袖人物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倾向，值得注意。

乙：我和你有同感。“领袖是人不是神”，并不是否定领袖的伟大，认定领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更不是千方百计去“挖”各种材料，“从他的各方面来证明他是一个小人物”！这样做，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贬低领袖人物，糟蹋领袖人物。

“领袖是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个伟大的人。普列汉诺夫在讲到“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时指出：①“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能够及时而敏感地发现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正确地预见到社会发展的趋向，是伟大变革的启蒙者；②“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因此比一般人具有更执著的追求和更伟大的献身精神，是社会进步的带头人；③具有杰出的才能，有能力担负历史赋予的使命，“所谓伟大人物，也就是最能帮助解决这种任务的人物”①。

领袖人物的深刻思想、伟大精神和杰出才能，以及由此而对社会、历史进步所做出的贡献，都是一般人所做不到，或根本无法做到的。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所说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

---

① 【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八部分。



斗。”<sup>①</sup> 承认并尊重领袖人物的伟大作用和贡献,是对历史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那种否定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鼓吹人人“要实现自我”,“是自我的主宰”的“理论”,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小市民心理的一种反映,也就是黑格尔所指出的:“仆从眼中无英雄。”

甲:可是,我们有时又说“领袖也是普通的人”,这不是矛盾吗?“伟大与普通”在一个人身上是怎样体现的呢?

乙:这是一个很富于哲理性的问题,有些人用“人的复杂性”或“两重人格”来解释伟大与普通的关系,如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英雄身上也有灰尘,反面人物身上也有良知”等等。我觉得这些说法把人搞得太抽象化了,太玄了,令人不可琢磨。人,不管是伟大的领袖人物,还是普普通通的人,都是生长在和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因此,还是应该从社会的角度,从实践的角度,给予说明。

甲:请你谈谈具体看法。

乙:我对“伟大与普通”的关系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解。

(1)伟大来自普通。伟大的人物不是在娘肚子里就伟大的,生下来都是普通的婴儿。伟大人物的造就,一方面是通过学习、磨炼,主观方面具备了优秀的素质。另一方面还得有“机遇”,即社会能够及时提供一个增长和发挥其才能的舞台。所谓“时事造英雄”,就是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能提供什么样的舞台,是把普通人或优秀人才造就成为伟大人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使“一些戏子、排字匠、剃头匠、染匠、律师、小贩和剑术教师”,成为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即使是拿破仑这样的天才人物,“如果法国旧制度再延续七十五年之久,拿破仑也许终身也不过是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个不大著名的波拿巴将军或上校”<sup>①</sup>。

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领袖人物,也是如此。周恩来曾指出,毛泽东并不是“天生的圣人”,而“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周恩来又指出“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迷信过,也曾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过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正因为如此,“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sup>②</sup>。

(2)伟大之中有普通。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伟大人物必定在一切方面都是伟大的,其实不然。鲁迅先生曾讲:“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毫无根据的,然而,其不冤哉!”<sup>③</sup>这段话,深刻地体现了“伟大之中有普通”的思想。伟大,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杰出,堪为师表。在某些方面之外,仍然是普通的人。如果对伟人的一切方面都大加歌颂,反而弄巧成拙,变成对伟人的亵渎。

领袖人物,一般说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出杰出的才能,有些领袖人物还具备多方面的深厚素养。在这些领域,他们是超乎常人的伟大人物。而在这些领域之外,他们仍然是普普通通的人。如在演戏方面显然比不上梅兰芳,甚至连一个普通演员也不如。

① 【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七部分。

②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③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第415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在日常生活方面,领袖人物与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同样适用于领袖人物,领袖有时也免不了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烦恼。对于领袖人物所讲的话,也应做这样的分析。领袖人物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准和深刻的理论修养,因此他们的意见具有很强的真理性。然而领袖人物所讲的话也并不是“字字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于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是在缺乏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或者是某些场合的即兴讲话,其意见就不一定都当“圣旨”。“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sup>①</sup>也就是说伟大人物讲的话并不一定都伟大,有时也会讲些普通的话,甚至蠢话,不要盲目崇拜。

(3)伟大的基础是普通。有一回法国的著名统帅拿破仑率大军过阿尔卑斯山,他骄傲地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显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鲁迅先生对此事做了如下评论:“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限,要归入疯子一类了。”<sup>②</sup>拿破仑之所以讲如此的疯话,就在于他不懂得:“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领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背后有无数的普通民众,没有“普通”做基础,“伟大”一分钟也存在不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伟大与普通是同等重要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和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拿破仑相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第一位执政党领袖列宁,虽然为革命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始终自觉地把自已当做群众中的一员,总是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中。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不许人们挂他的照片,不许为他祝寿,不许发行印有他的头像的邮票,不愿听恭维的话,甚至不许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sup>①</sup> 鲁迅:《名人与名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60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sup>②</sup>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为他鼓掌。列宁始终认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sup>①</sup>

(4)伟大可以转化为普通。历史的潮流，时代的需要，把一些具备相应才华的人物推向历史的峰巅，焕发出耀眼的光辉，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成为伟大的领袖人物。然而，“‘伟大’一语是个相对的概念”<sup>②</sup>。伟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和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样，是在不断变化之中。

斯大林曾讲过无产阶级有过三类伟大领袖人物：“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没有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sup>③</sup>。

现在看来，即使是斯大林讲的第三类领袖人物，也不能过分理想化，过分神圣化。这类领袖是非常伟大的历史人物，是高空翱翔的雄鹰。然而雄鹰有时候也会有比鸡飞得低的时候，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缺陷。一个伟人，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正确解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② 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八部分。

③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8—27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版。

决一定时期提出的历史任务,就是非常伟大的了。不要忘记领袖毕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可能永远站在潮流的峰巅,解决历史提出的所有任务。我们对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都应该怀着崇敬的心情,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同时,对他们“比鸡飞得低的时候”,给予充分的理解和科学的认识。

### 三、政治与道德

甲: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前些年还有一种倾向,过多地从道德角度谈论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你对此有何看法?

乙:领袖人物都是和政治紧紧联在一起的,因此,这种倾向的实质是以道德标准来评价政治,我认为是不科学的。

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主要是指阶级内部、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阶级、民族、国家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政治关系是最主要的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列宁语),政治,关系到各阶级、各民族、各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每个阶级、民族、国家都有自己衡量政治的标准。这样说来,政治上是不是没有真理性标准可言了呢?不是。我认为衡量政治上的是非,其根本标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那就是对绝大多数人是否有利;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对历史的进步是否有利。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方式,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历史上存在着三种道德观:一是封建主义的道德观,要求每个人都要遵守“忠、孝、节、义”,忠君者为大善,不忠者为大恶;二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观,鼓吹“个人中心和自我依赖”,符合者为善,不符合者为恶;三是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主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个人与集体的协调与一致,作为行为规范。此外,各

个阶级之间也还有一些共同的“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如文明礼貌、尊老爱幼、遵守公共秩序、诚实、谦逊等等。上述三种道德观加上一些共同的行为规范，统统是评价社会上个人行为的标准。一些领袖人物固然也有个人行为，但主要的、大量的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的政治行为。用个人行为规范去评价领袖，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出现很大的片面性。

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伟大代表人物拿破仑，有的从道德角度指责他是：“自私的专制君主，人民的压迫者，自由的摧残者，使人类流尽鲜血的暴君。”有的则在拿破仑死后继续制造“拿破仑神话”，鼓吹“皇帝集中了全部完美的道德品质，如果死者确实有一个缺点的话，那就是对于人们有着过多的善良和无限的宽宏大量”。恩格斯不赞成这种完全从道德角度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他列举了拿破仑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重大措施，如拿破仑颁布的三部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等等。即使他派遣军队袭击德国的时候“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sup>①</sup>。恩格斯从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角度，对拿破仑做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他的“暴虐”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不是从个人道德角度，而是从人类社会斗争的历史角度。

---

<sup>①</sup>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8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以道德标准评价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还容易失之于“简单化”。在处理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中,不管哪个阶级的道德观,都提倡文明礼貌、尊老爱幼、遵守公共秩序等,能够这样做的是“善”,破坏这些准则的是“恶”。上述道德准则只是反映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浅层表现,而涉及人们根本利益的经济关系,以及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政治关系,才是人们社会关系的最深刻之所在。以反映人与人之间浅层关系的道德标准去评价反映人与人之间最深刻关系的政治现象,必然容易简单化。在道德领域,人们通常都是抑“恶”扬“善”的。而在政治领域,人们对“善”与“恶”的认识和态度,则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有位杜林先生,他把不平等、专制、剥削、战争、暴力统统视为“恶”,谴责暴力是产生社会上一切“恶”的根源。恩格斯不赞成杜林的看法,他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sup>①</sup> 他针对杜林认为“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指出:“关于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sup>②</sup>

历史上还有一位大哲学家费尔巴哈,怀着虔诚的心情,言善不言恶,认为恶“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另一位大

---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

② 同上书,第294页。

哲学家黑格尔则与此相反,他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恩格斯赞成黑格尔的意见,并对他的意见做了如下发挥:“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神圣事物的褻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个—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sup>①</sup>

甲:你讲得这些意见太重要了。前些年,国内有些学者在评价历史人物当中,打着“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旗号,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切革命斗争,认为从谭嗣同、孙中山到陈独秀、毛泽东,把中国“搞糟了”。许多人列举中国近—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对这种谬论进行了驳斥。你今天讲的恩格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杜林关于“暴力”、“恶”的历史作用的争论,对人们从理论角度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的革命问题,肯定会有新的启示。

乙:存在这些模糊认识,就大多数人来讲,是和他们对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政治现象,缺乏深刻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旧中国比,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光明代替了黑暗,团结代替了分裂,“同志”和“为人民服务”两句深入人心的口头禅,成为新中国政治的象征。“文化大革命”以来,—下子许多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强有力地冲击了人们善良而纯朴的心灵:许多备受尊敬的老革命家,—个早晨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叛徒”、“走资派”;许多红极—时的“革命派”,原来是货真价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



实的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一贯“高举”、“紧跟”的林彪，居然策划“571工程”，未能得逞，仓皇叛逃；为中国革命做出过伟大贡献，被视为“一贯正确”，甚至被带上神圣光环的领袖人物，事实证明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接着又是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这些惊心动魄的政治现象，使许多人眼花缭乱，一下子很难理解，认识上处于混乱状态。历史的经验表明，人们对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虽然有着深切的感受，然而要真正达到理性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沉淀过程。前些年，有些人喜欢从道德角度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某些历史人物，喜欢从“良心”角度总结经验教训，正是这一沉淀过程的反映。

甲：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呢？

乙：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从全局讲，已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科学的分析和基本的总结。从个人认识角度讲，我想提出一个基本思路：领袖是人，不是神。扩大一些说，共产党也是由现存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组成的，不是由神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由人来干的，不是由神来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由人在摸索中实现的，不是由神安排好了的。这里讲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无产阶级分子和共产党员。这一人群，按其历史地位讲是和先进的大机器、近代工业连在一起的。就其精神追求而言，是和美好的共产主义连在一起的。然而这一人群毕竟也是生长在现实社会中的人，荷花可以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生长于现实社会的人和政党，一点不受社会的“世俗”和“污秽”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种影响和由此产生的问题，以及向哪里引导。也就是说，看一个政党是否有希望，衡量一种政治是否有活力，“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显著的标志之一”<sup>①</sup>。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7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甲：按你所说，用道德标准评价政治是不科学的，这种评价难道一点合理因素也没有吗？换句话说，政治是无道德可言的吗？

乙：“政治上无道德可言”，或者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近些年来一些西方政客们把这些话当成共产党的“哲学”大加攻击。其实，这些话的首创者和鼓吹者，恰恰是西方政治家的先辈们。

古老的耶稣会就有一句格言：“只要动机良好，可以不择手段。”<sup>①</sup>到15世纪，被称为“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发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之一马基雅维里，在其名著《君主论》一书中，公开提出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说“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该遵守信义”。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则说：“一个在政治上按原则行事的人就如同嘴里横着木杆穿过树林的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拿破仑也有一句名言：“在政治上是没有良心而只有头脑的。”直到当代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他一方面咒骂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另一方面在评价资产阶级领袖人物时，却换了腔调说：“狡诈、自负、伪装——在其他场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对于领袖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他需要狡诈以便把利益冲突的各个集团捏合成不断变化的联盟，这种联盟是进行统治所要求的。”

对于马基雅维里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发泄高尚的义愤”，而是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它的真实价值，在于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

---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版。

了”<sup>①</sup>。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促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观和国家观上摆脱了封建道德和神学的束缚,具有积极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政治、道德与本阶级经济利益的关系,直言不讳地指出,是否符合本阶级和国家的利益是衡量一切政治和道德的根本标准,而不是反过来用“道德”标准来评价本阶级和国家的利益。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也显露了新生资产阶级的残酷性,一切为了本阶级的经济利益。金钱的闪光,彻底揭穿了人间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也正是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后来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与马基雅维里理论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上也有相近的看法,那就是公开承认道德关系是一定经济关系的反映,道德是为一定的经济关系服务的。列宁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sup>②</sup>毛泽东也大声疾呼:“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sup>③</sup>马克思主义与马基雅维里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后者是为少数资产者的利益;前者把追求人类的解放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而后者是把“金钱”视为道德的最高标准,“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sup>④</sup>。

无产阶级在具体活动中也摒弃了马基雅维里不讲信义的主张,而是信守诺言,说话算数,搞大动作,不搞小动作,对俘虏实行人道主义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比较鉴别中看清楚谁是谁非,谁真心谁假意,从而有力地支持或同情我们的革命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

②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④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选集》第4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

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十年革命活动,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事情上,做得是好的,被人民誉为“仁义之师”,并且获得国内外人士的好评。不必讳言,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过“左”的做法,犯过“左”的错误。如1957年整风运动中,错把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违背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诺言。“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人的评价,忽然天上,忽然地下,令人惶惶然不可琢磨。特别是一些粗暴的做法,更是违背了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这一历史教训是应该永远汲取的。

## 第三章 怎样看待领袖的私生活

私生活,是指除政治和工作领域之外,属于个人性质的生活内容。如家庭、恋爱、婚姻、亲情、友情、师生情、同学情,以及个人爱好、衣食住行等。长期以来,按照我国历史形成的习惯,领袖人物的私生活是很少在公开传播媒体中提及的。后来在造神运动中,领袖人物的私生活又被笼罩上层层神秘的色彩,以致在领袖们走下神坛之时,人们一方面以激动的心情和领袖们紧紧地握手,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强光下形成的视角习惯,一下子在家庭里看到与普通人没有两样的领袖,反而产生种种的惊讶与不解。

### 一、领袖“生活实录”热的启示

据有关人士估计,1989—1992年5月,全国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书籍、杂志不下400种,累计售量为1.4亿册,占同一时间内全国图书售量的23.5%。中共领袖传记书籍发行量为2700万册,其中与毛泽东有关的占65%。现列举若干发行量大的书籍情况如下:

《毛泽东书信选集》首版发行500000册;

《领袖泪》首版印刷三次发行260000册;

《毛泽东》首版发行250000册;

《红墙内外》首版发行150000册;

《毛泽东的孩子们》首版发行120000册;

-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首版发行 100000 册；  
《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首版发行 100000 册；  
《毛泽东逸闻录》首版发行 100000 册；  
《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首版发行 100000 册；  
《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首版发行 80000 册；  
《生活中的毛泽东》首版发行 65000 册；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首版发行 70000 册；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首版发行 50000 册；  
《走近毛泽东》首版发行 55000 册；  
《毛泽东家世》首版发行 50000 册；  
《1915—1976 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首版发行 50000 册；  
《1946—1976 毛泽东生活实录》首版发行 30320 册；  
《卫士长谈毛泽东》首版发行 30000 册；  
《晚年毛泽东》两次印刷发行 70000 册<sup>①</sup>。

从我国近些年来的图书发行情况看，一般只能发行几千册，许多书只有二三千册，最高的也很难超过万册。而有关毛泽东的书籍，其种类之多，发行量之大，都远远超过其他。此外，还有众多的反映领袖生活的电影、电视、戏剧陆续出台。这样一种领袖“生活实录”热的出现，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渴望从多方面了解和认识领袖的巨大热情。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笼罩在毛泽东身上的神圣光环一点点消失，作为一个社会的、生活中的普通人是什么样子的？增加了热爱毛泽东人们的好奇心，想法了解毛泽东的生活和家庭，想法知道他的爱好、习惯和个性，千呼万唤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从红墙里回到人民中间。”<sup>②</sup>

① 上述资料引自庄传伟、李红喜：《“寻找毛泽东”热纪实》，长春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版。

② 同上书，第 303 页。

领袖“生活实录”产生的社会效果，远远超出“生活”圈子。如果说几年以前有些人面对种种领袖生活实录，曾提出“有必要这样吗”？现在，实践已经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工人们热情地说“主席太棒了，馋了只想吃一碗红烧肉，‘主席装’也是补补缝缝，和我们的生活多么相似”，“主席‘土’，土得好！”

一位年轻军官反映：“把领袖人物从神坛接到人间，我们反而更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可亲可敬。”

中年知识分子说：“主席到底有魄力，最大的性格特征是挑战！”

老干部从更深的层次上谈感想：“（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曾为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所遭受的苦难流过眼泪，人民吃不上肉他也不吃，人民浮肿，他也浮肿。我读着这些感人肺腑的事迹也不由得几次掉下了眼泪。他的思想和模范行为影响着中国的一代人或几代人。因此，我们对他所犯错误的立场、感情和态度，也应该是同志式的、朋友式的，而不能是其他。”<sup>①</sup>

理论工作者在思考：“老百姓们津津乐道的是：毛泽东最大的享受就是吃碗红烧肉。而在这种议论的背后，则隐藏着这样一个问号：为什么有些干部在享受程度上远远超过了毛泽东？”

我们把上述种种反映综合起来就会发现，人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有关领袖人物的重大问题——领袖的人格力量。如果说政治和工作舞台是对人的意志与智慧的考验，那么在生活领域则可以毫无遮掩地看出一个人的人格。近些年来出现的领袖“生活实录”热，正是领袖人格力量的一次生动展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留下了及其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瞿秋白选集》、《张闻天文集》……同时，还为我们留

<sup>①</sup> 《光明日报》1989年12月1日：《读一点“毛泽东”》（石玉山）。

下另一笔生动而感人的精神财富——通过他们一生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所展示的多彩的人格力量。只有把“言”与“人”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领袖形象。

人格力量——是我们认识领袖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从起步之日始,伴随着敌对阶级之间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时而还有来自敌对势力对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人身攻击。建党初期,党的领袖陈独秀曾被诬为“陈毒兽”,造谣他成立什么“讨父团”,连自己的爸爸都不承认了。陈独秀对此置之一笑,风趣地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后来,尽管陈独秀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他的才华与人格,却赢得了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的敬重。在陈独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以后,连政治上很不赞成陈独秀的著名律师章士钊也起而为陈辩护。面对好心的律师尽量为他开脱“罪责”的辩护词,陈独秀却坚定地说:“章之意见,是他从法律上说的,与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陈独秀大义凛然的人格受到舆论的称赞:“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纪录。”

建党时期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李大钊,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从容就义,视死如归,为革命事业过早地献出他 38 岁的生命。在他牺牲不久,1934 年杏岩书屋出版的《近代二十家评价》赞扬李大钊:“先生一生,勤朴清直,艰苦卓绝,洁身远名,不营时誉”,“对友无论党之异同,均和易平直,表里如一。临事不苟,临财不得,是可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者。”后来的历史学者又对李大钊的人格做了如下描述:“李大钊的道德高尚、品性纯洁……无论是他的亲属,他的师生,他的朋友,乃至他的敌人,或是爱他(大多数),或是恨他(极少数),但对他没有不佩服的。他的政敌,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不能攻击他的人格。他的论敌,可以攻击他的信仰,攻击他的言论、文章,但从不敢攻击他的私德,甚至还不得不虚



与委蛇,和他保持一定的个人联系。”<sup>①</sup>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领袖人物,其传记从人生的一个侧面展示了他的崇高品格:“瞿秋白的两次爱情生活,都没有给他带来亲生子女。然而他不是那种只有狭隘的亲子血缘之爱的人;共产党人博大的襟怀,使他充满了对一切孩子的热爱。对于他所爱之至深的人的女儿,他视同己出,也爱之至深,远远超过了血缘之爱。他在杨之华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从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的女儿;独伊也从来没有感到爸爸不是自己的亲爸爸。”<sup>②</sup> 正是这样一位对家人、对子女乃至一切孩子深沉至爱的人,在敌人监狱中,当敌人假意关心瞿秋白,要他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的利益,而劝他投降时,瞿秋白却回答:“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sup>③</sup> 正因为瞿秋白有着这样高尚的人格,所以能够在敌人枪口面前,从容就义,血洒长汀!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人的品格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那么,在和平年代则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讲:“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相反地,它总是要以或多或少地自我牺牲为前提。”<sup>④</sup> 新中国

① 李新:《研究李大钊,学习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版。

② 陈铁健:《瞿秋白传》,第3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③ 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第5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7月版。

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身居显位,手握重权,却从不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是严于律己,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地奉献着一切。他们在个人生活中展示的高洁品格,知者无不动容:

——50年代,毛泽东的家乡得知他当了国家主席,亲友们纷纷来京看望,并且请求解决各种问题。毛泽东一方面热情地欢迎他们,并拿出个人积蓄尽可能给予帮助。另一方面却从不徇私情,不为亲友谋私利,不许亲友搞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石城乡党政组织写信指出:“我的亲戚唐家和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率先派儿子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毛岸英血洒战场,献出年轻的生命。老年丧子的毛泽东,不能不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久久的沉默着,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然而,当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表示,毛岸英的牺牲他有责任,请求处分时,毛泽东却说:“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后来,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要求把岸英的遗骨运回国,毛泽东表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从那时起,毛泽东把毛岸英的妻子当成自己的亲女儿,时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每次通信总是称她为“亲爱的思齐儿”,并一再动员和帮助她重新组织了家庭。

——至于毛泽东个人生活情况,近些年已广为人知。“从1953年年底到1962年年底,主席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香皂。手染了墨汁或是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膏’、‘霜’、‘油脂’一类的护肤品,

甚至没用过牙膏。他只用廉价的牙粉。牙刷用秃了才换新的。”<sup>①</sup>他吃饭十分简单,改善生活的标准是“来碗红烧肉吧”。而到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全国老百姓一样,很长时间连肉也不吃了。许多人对毛泽东身为国家主席,生活如此清苦,十分不解,江青甚至埋怨他“土”。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若干回答,值得我们回味——“习惯了,还是这种补了补丁的睡衣好穿”;“全国粮食现在还紧张,大家都在吃杂粮,我怎么能不吃呢?”“当长不是为了图舒适,图享受。要动脑子,担担子。”这些回答表明,毛泽东在生活上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并且把这种认识化为长期的生活习惯。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在历史上也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全党同志始终没有丧失过信心,全国群众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给予高度的信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袖们,还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真心为大家办事,从不谋私利。为人民的利益,在战争环境中,可以毫不犹豫地赴汤蹈火;在和平日子里,身居高位却从不以权谋私。正是这种高尚的人格力量感动了“上帝”,感动了全国人民,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抗日战争时期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思说得好:“毛先生,您的人格感召力将胜过您的思想,因为思想是要不断前进、发展的,总有一天会落后的,而人格魅力将是永恒的。”

## 二、一代领袖的恋爱与婚姻

领袖的恋爱婚姻生活,有着强烈的历史色彩和政治色彩。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人物,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的悲欢离合、是非曲直,需要把握两个特点:一是他们的恋爱婚姻观,大体上

<sup>①</sup> 《李银桥访谈录》,《北京日报》1991年12月21日。

是五四运动前后形成的；二是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史，是和他们的革命生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封建主义，参加者大部分是青年人。青年人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抑与束缚感受最直接、最深切。因此，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成为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他们大声疾呼：“要改革社会，非先改革家庭不可，欲改革家庭，非先改革婚制不可”，“家庭！家庭！真是杀尽中国的牢狱！”<sup>①</sup>

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进行挑战和批判的先驱是陈独秀。早在1904年5月—7月，他就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恶俗篇》，对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和结婚形式上的种种陈规陋习，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他大胆地提出：“恋爱自由”；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男女相悦，自己作主”；不合情、不合理的婚姻，“可以禀官退婚，各人另择嫁娶”，“平常合股做生意的，脾气不同，还必定要拆伙，何况是夫妇大事”<sup>②</sup>，这样，对“人类的幸福”、“国家的安宁”都有好处；在选择配偶条件上，针对封建主义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提出“相貌、才能、性情、德性”四项标准。

陈独秀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因为他本人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反叛者。1897年，18岁的陈独秀由家里包办，与一位“将门之女”高晓岚结婚，陈对此包办婚姻深恶痛绝。再加上婚后发现夫妻俩在许多方面都格格不入，陈是个秀才，高目不识丁，陈思想新潮，高恪守封建之道，“他俩的思想差距远不止一个世纪”。因此，夫妻俩感情十分不融洽，乃至发展到很少讲话，并时而引发争吵。后来，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与

① 《罗学瓚给毛泽东信》(1920年7月14日)，《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7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

陈独秀结识。高君曼是北京女子师范学生,思想上追求新潮,识多见广,洒脱文雅,正是陈独秀所提倡的新女性形象。陈、高(君曼)两人一见如故,谈话投机,于是接触越来越多,并渐渐产生了爱情。这件事,被认为伤风败俗,离经叛道,受到两个家族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陈独秀不顾一切,于1910年宣布和高君曼正式结婚。

然而,陈独秀的第二次婚姻虽是自由恋爱,也未能持久,十几年以后又告解体。人们谈及陈独秀这次婚姻失败,往往讲到三条:一是陈独秀的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使高君曼整日提心吊胆,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二是在对待陈独秀前妻孩子的做法上,两个人有分歧;三是据说陈独秀生活不检点,时有风流韵事。我认为,陈与高由合到分,从根本上讲,是和五四时期新的恋爱和婚姻观,有着密切关系。

五四时期形成的新的恋爱和婚姻观,有着强烈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旧制度提出挑战,自然要触及封建社会受君权、神权、族权、夫权四重压迫的妇女问题,妇女解放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一口号,提出女子参政,女性中心,教育平等,经济独立,脱离家庭,还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要人格,要自由,不做玩物,等等。青年学生还排了许多新的话剧,如《孔雀东南飞》、《不如归》、《娜拉》,到各地上演。这些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成问题的事情,当时却是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乃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如妇女剪发这样一件小事,都是当时旧制度所不允许的,四川军阀刘存厚手下的警察厅就公然贴出布告:禁止剪发。1920年5月出版的《威克烈》杂志第19期,曾刊登《我剪发的经过》一文,现摘录如下:

第二天,我母亲已经把舅父请来了,把这件事同他商量。他是满清一个举人,当然照着举人的道理,先就大骂我一阵,然后同我母亲一路到我房里,质问我。他问的话,我记不清

了,不过本诸孔孟之道罢了。我也不让他,一一地把他驳了。后来他道理穷了,只好站起来发作道:又不是我的女儿,我管你做什么?说了一抽身走了。我母亲又骂我一会子,最终还说:无论如何不准……

我回家,我母亲见我剪了发,果然大哭大闹,并且辞别神主,要去自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许多青年人“抗婚”、“拒婚”,要求“公开社交”、“自由恋爱”,成为向封建主义的一种挑战和反抗。如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青年领袖人物的郭隆贞,对从小被包办的婚姻极为不满。出嫁那天,她不穿嫁衣而仍穿着学生装上花轿,坐花轿一路卷起轿帘。到了男家,下轿不用人扶,大大方方走下来,向新郎和来宾发表演讲,痛说封建婚姻葬送青年幸福,宣传自由婚姻的好处。然后理直气壮地离开男家,坐船到天津上学去了。另两位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蔡和森和向警予,干脆废弃婚姻形式,两人坐在一起,面前摆一本《资本论》,照了一张相做纪念,然后就在一起生活了,自誉为“向蔡同盟”。此事得到青年毛泽东的极力赞赏,他说:“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

五四时期形成的新的恋爱和婚姻观,是以“个性解放”为中心思想。陈独秀说:“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青年毛泽东也认为:“吾人的欲望有多种……各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前者所以维持‘现在’,后者所以开发‘将来’。”“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所谓性的欲望,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青年毛泽东正是从“生理上、心理上找出根据,证明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正是在这

样的认识基础上，“恋爱自由”、“恋爱神圣”、“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等等，成为五四时期青年人普遍接受的行动口号。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更为激烈，甚至认为“二人相配之事，纯为二人之自由”，“必不容第三人干涉”，“合则订交，不合即割席”，“自当随时离异”，“男女交媾属生理问题，于道德无关系”。

在当时，李大钊对恋爱婚姻问题持更为慎重的态度，认识上也高于一般人。他于1921年12月19日所作的《理想的家庭》讲演，指出“中国近年来男女名为自由结婚，其实离此程度尚远”，“自由婚姻之意义，非婚权不操于父母之手之谓也”。李大钊认为，“自由”不是目的，婚姻自由的目的是要建立“理想的家庭”——民主、平等、科学、教育并有审美生活的家庭。李大钊对离婚问题的认识，比一般人也较为全面。他一方面指出：“一夫一妻之制，古来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属难得！”另一方面认为，如果实在没有爱情，“皆应彻底离婚”，“以实现爱与结婚一致”。李大钊本人在婚姻实践中，则更着重于民主、平等的新型家庭的建设。他虽然也是自幼包办的婚姻，夫人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小脚妇女，而且比他大六岁，但李大钊没有提出离婚，他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夫人，体贴夫人，感情日笃。每次有客人来，总是先帮助妻子换衣服，扣扣子，细心地拉平衣服上的皱褶，然后一起出来与客人见面。

“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恩格斯听说他的朋友卡尔·考茨基和妻子闹离婚时，写信批评考茨基说：“关于卡尔，您说，没有爱情，没有激情，他的本性就会死亡。如果这种本性表现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么他自己应该承认，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本性或者应当加以抑制，或者就使他和别人都陷在无止境的悲剧冲突之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从道德角度又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列宁则明确表示不赞成“要求恋爱自由”的提法，他认为这个提法不确

切,“自由”是指什么?列宁一连提出10个问题:“在爱情上摆脱物质(钱财的)要求?”“摆脱宗教偏见?”“摆脱父母之命 etc?”“摆脱‘社会’的偏见?”“摆脱法律、法院和警察的束缚?”“摆脱爱情上的严肃态度?”“摆脱生育子女的义务?”“通奸的自由?”

因此,我们认识老一代领袖人物的恋爱和婚姻观,既要看到它的民主性、革命性,又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历史性。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长期革命生涯中,绝大多数领袖人物在婚恋问题上,逐渐脱离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婚恋观。同时,也有些人在个人婚恋生活上,或多或少地还残存着五四时代婚恋观的痕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里,我想谈谈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问题。毛、江结合由于一开始就有争议,后来又由于江青在“文革”中成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首领,毛、江的婚姻,前些年成为重要话题。有的认为是“江青钻了空子”,一时蒙住了毛泽东,后来又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包袱;有的认为“江青钻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江青“实际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条暗道机关”;有的甚至认为和江青结婚是毛泽东的悲剧,否则“文革”中也不会有“四人帮”了;还有一种意见,把毛、江结合归于“功利型”,“是政治婚姻,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年岁相差那么大是无法成夫妻的”……上述种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都着眼于政治角度看待这一婚姻。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人物,他的婚姻自然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然而婚姻毕竟不是政治领域的事,而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事,因此,分析婚姻的问题,即使是领袖人物的婚姻问题,也还是要首先把它看成是两个人的婚姻,其次才是政治色彩。完全从政治角度或主要从政治角度来观察和认识领袖的婚姻,从思路上是不可取的。

我认为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不能说是“政治婚姻”,和当时的许多干部一样,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婚姻。抗日战争爆发,成千上万的男女知识青年由大城市,由全国各地奔向延安。后来,有一批



女知识青年和边区的“老干部”(其实绝大多数也是青年)结了婚。作为婚姻一方的女知识青年们,怀着满腔热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为年青的“老干部”们的传奇经历所倾倒,并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一种革命新人的气质,从而产生爱慕之情。年青的“老干部”们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许多人没有条件考虑结婚问题,有的虽然结过婚,也是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死活不知。到延安以后,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增添了不曾有过的城市生活气氛和活跃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者的婚姻,成为延安时期的富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现象。而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正是这一历史现象中的一例。

不错,毛泽东和江青也有他们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江青时年24岁,是上海较有名气的电影演员,本人的经历较一般年青人曲折复杂,来延安前已经是共产党员。到延安以后,江青追逐毛泽东,应该说也是属于“美人爱英雄”一类,充其量也只能是江青想满足某些虚荣心。嫁给毛泽东,在延安这个地方,可以显得更神气些。此外,不好说有什么更大的政治目的。因为毛泽东虽然事实上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但整个共产党在当时力量并不强大,而且处于非法地位。难道江青此时已预见到共产党很快能得天下,毛泽东能够成为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领袖人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至于毛泽东娶江青,也不能说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而是更多的喜欢江青的美貌、风度和才华。毛、江婚姻的问题恰恰出在从“政治上”考虑不够,因而引起许多干部,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对这门婚事的反对态度。据张闻天夫人刘英讲,当时有许多干部打电报、写信给中央,表达这一想法。“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

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对于毛、江婚事,当时在延安的知识青年们是怎样看的呢?为此我曾请教过“老延安”杨枫同志,她说:“江青在马列学院和我一个班,同宿舍。江青经常去听主席讲哲学,经常往主席那里跑,在马列学院时结婚的……当时大家认为婚姻问题,个人应有自由。虽然觉得江青和主席在政治上差距太大,但江青在国统区是进步的电影明星,和主席结婚也还可以。”

毛、江结婚以后,党中央是否为此有过“约法三章”呢?现在看来,虽然尚未找到文字根据,但事实上应该说是有的。1938年秋从共产国际回延安,后来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人秘书的师哲,在其回忆录《峰与谷》中有如下记载:“中央机关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桩婚事有意见,私下里议论纷纷。惟有朱德总司令永远是稳重沉着的,遇事总能想出办法。对此事,他出了个主意——一定要结婚也可以,但给江青规定约法三章,其大意是:一、不能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二、不能以党的名义出头露面进行活动;三、不能干预党和国家的事务。此约法三章在干部中迅速传开,意见为之平息,似乎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师哲这段话的可信性,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印证。延安时期先后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老革命家莫文骅同志,曾和笔者讲到这一情况。他说:“主席和江青结婚那天请一些人吃饭,我也去了。露天摆了四桌,没凳子,大家站着吃。房子里还有一桌,我没进去看,不知有哪些人……当时许多人对主席和江青结婚有意见,并把这些意见报给了中央。中央决定,不让江青参加(主席的)政治活动,不要公开露面。有一次延安的军事干部开会,主席和江青一起来了,并且和大家照了相,但事后没有公开报导。”

“约法三章”的出现,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领导人的政治活动要和家庭活动区分开来;家庭成员不

得参与和干涉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在抗日战争以前,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没有建立小家庭,即使结婚的夫妇也不常在一起,或者夫妇双方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在生活居住条件艰难的情况下,常常在一些领导人家里开会、办公,或从事政治活动,大家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到延安以后,许多干部纷纷结婚,建立了家庭。而领导干部的夫人,许多是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青年女性,一般说,他们的经历和水平,不适宜一下子参加党的高层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约法三章”,不仅是针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对许多高级干部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历史的经验教训还表明,“约法三章”不仅在延安时代具有针对性,在共产党进入大城市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后,它的重要意义更为显著。

前几年,看到一位作家根据台湾公布的材料,提出“约法三章”的新说法,即:“第一,毛、贺关系在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位作家认为此材料“条理清楚,逻辑严密”、“比较可信”。然而了解党的历史情况的人都会感到,这三条既不符合当时党中央领导的认识状况,也不符合延安时期的历史情况。第一条实际上是为贺子珍和江青谁是“正统夫人”而争,把党中央的正确考虑歪曲为封建正统思想作祟;第二条的实际意思是说党中央正式同意毛泽东可以有两个妻子,这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事实是毛、江结婚以后,毛与贺子珍不再有婚姻关系。第三条则连一般的党内生活常识也没有了,为什么20年内禁止江青担任任何党内职务,20年以后就可以?中共有不“参加政治生活”的党员吗?难道当时就已经预知江青会成为“四人帮”?

### 三、重提“大节、小节”论

中国有个传统,评论人,特别是评论名人,往往注重大节而不拘小节。曾子说,辅佐小皇帝,担负国家重任,这些属于大节,“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就是君子。《战国策·齐策六》有语“晓小节者,不能行大威”;《后汉书·冯衍传》云“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淮南子·说林训》又云:“小变不足以妨大节。”古人的这些看法到了林彪手里,集中地形成成为名噪一时的“大节、小节”论。1966年8月10日,林彪针对群众对一些高级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反映强烈,做了《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指示》:

拥护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是中好中坏,小好小坏。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是也注意小节,主要注意大节。有的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大好,但是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佬,他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这两个偏才中应用哪一种人?要提拔第一种人,而对第二种人则要大批罢官。

林彪的“大节、小节”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9·13”事件之后,虽然不再公开宣传,但这一理论的影响,在实际生活中还不能说已经肃清。因此从理论角度研究一下“大节、小节”论,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首先,“大节、小节”论用是否拥护某一个领袖,作为区分“大好”与“大坏”的头号标准,就是不正确的。在“文革”中,这一头号

标准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并且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1967年1月13日下发的《公安六条》规定:“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发(1977)”6号文件,转发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正是依据这一文件,在“文革”结束一年以后的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赣州一女青年因为对领袖提出批评,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毛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中及“文革”以后一段时间内,血的历史教训表明,这条区分“大好”与“大坏”的标准,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领袖是人不是神,即使是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智者千虑也会有一失,也会有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时候。把对领袖个人的态度作为区分“大好”与“大坏”的标准,就等于说,在领袖犯错误的时候,如“文革”中那样,也只能是“紧跟”、“照办”,不得有任何不赞成或批评,否则就是“头号的大坏”。这样做,在现实生活中取消了对领袖批评与监督的任何可能性,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并且极容易混淆敌我,造成冤假错案。

“大节、小节”论把“突出政治”也列为“大节”的最主要内容,实际上是把现实生活中的“一时一事”,作为衡量干部好坏的最主要标准。也就是“文革”中常说的,在现实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站对了队,一切皆对,站错了队,一切皆错。这种一俊遮百丑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我们党长期实行的看干部不仅要看一时一事,还要看全部工作、全部历史的科学原则。把“一时一事”与“全部工作”、“全部历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必然助长投机心理,并为投机者大开方便之门。在“文革”中,长期不干工作,小病大养的林彪,由于在现实“政治”中表现出色,投对了机,一

下子成为大红大紫的接班人；而刘少奇、邓小平等站在第一线，积极工作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由于“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被罢官。这样黑白颠倒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我们之所以不能把现实政治中的一时一事，作为衡量干部好坏的最主要标准，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神仙，不能保证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有许多事情是正确的，也有许多事情基本正确，但有不完善的地方，还有一些事情是不正确的。不管上述哪一种情况，都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发展正确方面，修改不正确方面。而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也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有的认识快些，有的认识慢些，有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都是正常的。离开事物的发展过程，离开人们的认识过程，离开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全部表现，孤立地把对某一件事情的态度，作为衡量干部好、坏的最主要的标准，必然导致片面性。

“大节、小节”论把“政治”列为“大节”，“政治”以外的东西统统称为“小节”，其中包括“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人缘”，乃至“偷鸡摸狗”，等等。这种划分，实际上就是，凡拥护我，拥护我现在干的事情的人，不管他个人品质有多不好，不管是不是“偷鸡摸狗”，都是“头号的大好”。否则，就是“头号的大坏”。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表现吗？无产阶级政治的最终目的，包括两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内容：一是以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二是培养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一代新人。把政治与精神文明、人的道德品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样的政治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或者是错误的政治。一个不讲精神文明、道德品质很不好的人，是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从事无产阶级政治的。这样的人，或者是言行不一者，或者是政治上的两面派，如“文革”中的林彪、“四人帮”一类。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应该“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搞好党风”，并且“以模范

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sup>①</sup>。

“大节、小节”论在干部问题上,实际形成对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双重标准。领导干部要处理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大事,只要政治上不出问题,就被视为“大节”好。而“政治”以外的方面,因为是“小节”,就可以放松要求,即使出了问题也很难得到及时的、严肃的处理。一般干部从事的都是具体工作,很少有机会亲自处理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大事。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小节”方面的事情受到特别的重视。出了问题,也能够得到及时的、严肃的处理。这种对待干部的双重标准,在一个时期内,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由于一些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他们对下级的教育很难有说服力,必然缺乏权威性;而有些一般干部,本来还能严格要求自己,一旦升为领导干部以后,也自视为标准变了,“小节”方面放松了要求,甚至放纵不羁,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党正以很大的决心克服和纠正不正之风。此时,重新认识“大节、小节”论的问题,和它在党的建设上造成的危害,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方法论上看,“大节、小节”论是否有一定的价值呢?应当说,面对人和人的复杂表现,大节、小节的说法,在古代不失为一种评价人的方法。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有着本质的不同。两点论所讲的两点(大事与小事,一般与特殊,客观与主观)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而“大节、小节”论中的两个方面毫无联系,偷鸡摸狗者也可以“政治好”。两点论的主要方面,不是指一时一事的表面现象,而是带有本质性的东西,如民主革命时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9月28日)。

期土地改革中,积极分子和勇敢分子是有区别的;而“大节、小节”论则把一时一事的现象,如表面上的拥护与否,作为评价人的主要标准。因此,即使从方法论角度看,“大节、小节”论也不是科学的,不宜于以此为模式来评价历史人物。



## 第三篇 鹰有时也会比鸡飞得低

### ——领袖犯错误的人生思考

读《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走麦城,总是让人牵肠挂肚。对一世英雄所犯的错误,寄予同情,感到惋惜。掩卷沉思,浮想联翩。而读某些领袖人物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涉及领袖犯错误和演出人生悲剧一幕时,却很难在读者心灵上引起震撼和共鸣。原因何在?我觉着和这些书只注重从政治、经济、历史、组织、理论等宏观方面阐述,很少从人生角度加以具体剖析,过分理性化、政治化有关。

领袖也是人,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特殊角色的人。本篇拟从历史舞台上这一特殊人生的角度,对领袖犯错误时的心理状态,领袖犯错误与个人素质、权力状况、党的状况以及与革命事业发展的关系等,做些探讨。或许可以让研究领袖犯错误这样一件沉重而严肃的事,不至于成为只是遥远的历史或须昂首仰视的风云,而是贴近每个人人生之路的具有启示性的话题。

## 第一章 历史的怪圈

有位圣哲说:历史的“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领袖人物在批判和纠正某些历史的错误以后,有时也会转个圈儿仿佛又回到原来的位置,重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更加严重的错误。翻开我们党的历史,在无数英雄竞创辉煌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历史怪圈。

### 一、反右何以出“左”

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党的领袖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国民党叛变革命,共产党措手不及。在白色恐怖中,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党员从大革命时期的近6万人,很快下降到1万人,工会会员从280万减少到3万,农民协会915万会员,大部被打散。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1931年7月上海春耕书店出版的《中国大革命史》,对这次血的教训做了如下记载:

蒋介石在各方面布置相当得手之后,于是四月十二日的屠杀出演了!……当日(十二日)全沪工人闻耗大愤,纷纷奔集闸北开群众大会,并整队往司令部请愿。……请愿群众正前进至宝山路时,大队军队即迎面开枪。后因群众愈聚愈多,更用机关枪向徒手群众扫射。一时尸横满街,堆积如山,适大

雨如注,满街道竟成血河,死伤数目无从统计。据目击者言,事后系用操场汽车搬出葬埋,所装竟有七八车之多。<sup>①</sup>

在此危难时刻,党的新任领袖瞿秋白,率先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理论,主持召开“八七”会议,号召全党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为革命事业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变,做出很大贡献。然而,瞿秋白却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不久,即犯了“左”倾错误。在一部分群众为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影响下,搞了盲动主义。有些不具备条件的地区,要求他们发动起义,结果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起义中,有些地方搞盲目烧杀,并提出一些错误口号,如“厉行红色恐怖”、“不用一切钞票”等。反映在理论方针上主要有:“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

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中何以出现瞿秋白“左”倾错误呢?

1. 现实生活中一种倾向突出时,容易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工农运动刚刚兴起,共产党缺乏领导经验,因此在实际斗争中存在着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左”的和右的种种问题。如中共在确定和实行“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正确方针中,也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识,有的根本反对国共合作,有的则在合作中忽视斗争。工人运动的开展,一方面有力地支持了国民革命斗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些违反政策的事,如“没收分配工厂、店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一些民族企业停业,造成物价上涨,货物缺乏,群众反感。农民运动在蓬勃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如乱揪乱斗。作为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是在批评错误行为时加以正确引导,而是对发动农民运动进行责难和压制。

<sup>①</sup>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22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5月版。

到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发展成为主要问题,引起全党的不满,受到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包括领袖人物,不仅忽视了“左”的问题的存在,甚至还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左”的东西是正确的。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

2. 面对陈独秀错误造成的惨痛后果,刺激了人们的反右意识,弱化了防“左”意识。当时党的领袖瞿秋白回顾这段历史时承认:“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当时的另一位领导人李维汉回忆说:“我自己就有一种‘左’的情绪,一则因为对白色恐怖极端仇恨,二则因为曾执行过陈独秀路线,怕再犯右倾错误。那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刘少奇,总结历史教训时也指出:“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的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的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为是最革命的行为,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

3. 以“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思想理论受到瞿秋白等人严厉批判。这一批判纠正了陈独秀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错误,对实现我国革命历史从第一次大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变,对党的民主革命理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然而,这一批判从理论角度看是以“社会革命论”或“不断革命论”来否定“二次革命论”。所谓“社会革命论”,即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断革命论”,主张用“社会主义的见解和手段”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发展下去,“很可能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瞿秋白等人

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联系的同时,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取消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要办社会主义时期的事,从而导致新的“左”倾错误的出现。

## 二、“以‘左’反‘左’”之谜

1928年6—7月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不断革命”观点,肯定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六大”以后,中国革命又有了新的起色。到1930年6月,红军发展到13个军,约10万人,全国十几个省的300多个县份,建立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17个省委,党员人数达12万。天津《大公报》1930年5月21日载文惊呼:“长江一带之共党问题,近月以来,日增严重……江西则八十余县中,有六十余县曾沦陷……一年之前,不过鄂赣、湘鄂赣、湘赣之各交界地域,略受扰害,今则合数省计之,其曾受匪共侵袭者,共不下百余县,且更有蔓延之势焉。”

党的“六大”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而实权一度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掌握。李立三面对大发展的形势,头脑发热。鼓吹“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走到最大的恐慌”,“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马上到来,要求全党进行“最后决战”。在这一冒险主义指导下,强令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在中心城市组织总暴动。结果,遭受惨重失败。如红二军团攻打武汉市,全军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3000人,丢了洪湖根据地,退往鄂西山地。而武汉市内只有200个党员,150个工会会员,国民党驻军有相当于10个师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搞城市总暴动,其结果亦可想而知。

1930年9月24日,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

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此时,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以反“立三路线”的先锋自居,并很快成为党的新领导人。王明认为李立三不是“左”,而是右,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在“反右倾”和“反调和主义”的口号下,王明推行了一套“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的左倾路线。

“更坚决”:王明嫌李立三“左”得不够,还应该更“左”些。如在对形势的估计上,李立三把对革命有利的某些形势变化,夸大为“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王明则认为“总危机”还不够,而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在革命对象问题上,李立三虽然也“左”,但没有明确把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王明则认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因此,他批评“李立三同志从右方面取消革命”。

“更有理论”:李立三的“左”倾,是以当时流行于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的某些观点为依据的,他本人并没有系统地提出什么理论。而王明则不同,他于1930年11月写出10万多字的《两条路线斗争》,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王明的“左”倾错误理论,被称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

“气焰更盛”:王明比李立三,态度更不可一世,手段与方法更恶劣。王明向各根据地派出一批“钦差大臣”,强令推行“左”倾路线。规定派驻各地的中央代表,“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凡不同意或反对他的错误做法的人,一律给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撤职查办。

“形态更完备”:王明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以及策略各方面,形成一条系统的“左”倾错误路线。①政治上搞城市中心主义。王明在批评李立三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口号之后,很快又提

出新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张,配之以一套“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②军事上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艰难的游击战争条件下搞不适当的“正规化”,在我军弱小而又武器装备十分简陋缺乏,敌人强大而又装备精良的条件下,强行和敌人打“正规战”。③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大量提拔和重用王明一派的干部,用各种办法排斥和打击异己。④策略上搞“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实行关门主义。把共产党以外的党派统统称之为“反革命派别”,鼓吹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⑤思想上搞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的指标“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一切照搬照抄,完全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王明有一句著名的话:要“百分之百”的忠实于共产国际,要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王明“以‘左’反‘左’”,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错误的指导思想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左”倾政策使得党的形象在一部分群众中受到损害,关门主义的策略使得我们失掉了某些可能成为朋友的政治、军事力量,把革命事业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开展了第5次反围剿战争。由于“左”倾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高喊5次反围剿是“阶级决战”,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防御、分兵把口、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等错误的战略战术,虽然给敌人很大杀伤,自己也伤亡很大,使得工农红军不得不被迫撤出各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这次失败,丧失了90%的革命根据地,红军由30万锐减到3万,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100%,党和革命事业被送上绝境。

王明面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却偏偏说是“右倾”,并且趑来“左表右里”,即“形左实右”的说法,在党内堂而皇之地大搞起批判“李立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随心所欲、指鹿为马的荒谬逻辑,和风车作战的荒唐做法,使得多年以后,人们还在

为搞清楚究竟“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而苦费心思。

我以为要了解王明以“左”反“左”之谜，必须首先弄清王明用以衡量“‘左’、右”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衡量是非对错曾经出现过四种标准：

1. 以中央领导人的话为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陈独秀，他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是很高，再加上革命刚刚起步，缺乏经验，本应该谦虚谨慎，可他却主观主义十足，家长制作风严重，处处以“老头子”、“中国的列宁”自居。“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化身，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

2. 以马列的书本为标准。中国革命碰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在马列的书本里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如果处处坚持从“本本”出发，就会成为教条主义。党的早期领袖中，不少人多多少少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毛病。即使像瞿秋白这样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能最终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虽然对实行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在实际问题上有所认识，但在理论上始终未能冲破“城市中心”论的框框，犯了“左”的错误。

3. 以个人的经验为标准。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而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往往容易如此。如李立三，他自认为有经验，只看到时局某些变化的表面现象，把树木当森林，并且只相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其他人——包括中央其他领导人、农村根据地的领导人，乃至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意见统统都是“绝对错误的”。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一意孤行，结果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的同代人、老共产党员李维汉曾说：“立三忽视理论学习，不重视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又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只是满足于一般的经验，把它当做普遍真理到处套用……经验主义是他的一个致命伤。”

4. 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为标准。最突出的代表是



王明,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并以此衡量一切。苏联和共产国际在20—30年代,正是“左”倾思想理论泛滥,出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加紧推动各国革命斗争,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右倾。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指出:“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同年7月3日—19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10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再一次指出,“右倾的危险现在是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要求“加紧反右倾的斗争”。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右倾乃是主要危险。”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责李立三“是用虚伪的‘左’派空谈,来掩盖机会主义的消极心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正是王明“以‘左’反‘左’”的来源。

王明完全不顾中国党内的实际情况,如此卖力气地“以‘左’反‘左’”,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共产国际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不信任,选中王明取而代之。米夫称“绍禹(王明)同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领袖之一”,王明自己也说“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王明回国以后,便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摆出一副“惟我独革”的极“左”面孔,批判李立三是“右倾机会主义”,批判瞿秋白、周恩来是“调和路线”,批判毛泽东是“农民的落后意识”。中国传统衡量是非的标准是“过犹不及”,“过”是“左”,“不及”是右。王明绝不会承认有人比他“过”,只能是“不及”,于是,在王明那里便只有右而不会有“左”了。

王明“以‘左’反‘左’”,甚至搬出“左表右里”这样自相矛盾的说法,还有一个原因是,只有给反对者扣上右的帽子,才能在政治上把对方打倒,从而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干部公开说过,为了王明等人能上台,“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

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在中国党内长期流行着“怕右不怕‘左’”的观念,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对“左”的错误往往轻描淡写,而对右的错误则处理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只有把李立三的“左”说成右,把瞿秋白、周恩来三中全会的基本正确做法说成“调和主义”,才能有足够的“理由”把李立三以及一切反对者或不赞成者,排除出去,使自己能够独霸独行于全党。

### 三、反“左”英雄重犯“左”倾错误的历史剖析

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与党内“左”倾错误坚决斗争,并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而到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却重蹈“左”倾覆辙,其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

1. 1957年以后毛泽东屡犯“左”倾错误,在思维方式上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左”倾错误的旗帜和英雄的英雄的毛泽东,“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毛泽东却于“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屡犯“左”倾错误。1957年“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sup>①</sup>,1959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到1966年,又发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sup>①</sup>。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新的条件下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历史上历次“左”倾错误，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 (1) 急于求成。

民主革命时期犯“左”倾错误的领袖们一个重要问题是，总想在一个早晨就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他们反对毛泽东关于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艰苦性的正确认识，把它讥笑为“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胜利”。他们总是在条件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攻打中心城市，鼓吹无条件的“进攻路线”、“阶级总决战”、“两条道路决战”。甚至在民主革命时期超越阶段，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任务，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企图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很快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实现共产主义。1955年11月，毛泽东即设想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1957年11月提出“15年后，我们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接着掀起1958年“大跃进”。此时，毛泽东又多次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北戴河会议曾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在这种气氛下有的县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他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仍不甘心，又企图用加紧阶级斗争的办法，尽早实现他理想的共产主义。

### (2) 追求纯而又纯。

1935年12月，毛泽东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指出“左”倾错误的思维方式是“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如果同蔡廷锴握

---

<sup>①</sup>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然而二十几年以后,毛泽东本人也搞起这种“纯而又纯”的形而上学逻辑。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尽管他也做过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和发表过若干创见,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的公有制,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于此不符者,皆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列入“割断”之列,早在1955年他就曾明确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在经济体制上,毛泽东的基本主张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并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看成一回事,只有统一经营才姓“社”,个体经营则姓“资”,如“三自一包”等,皆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

### (3) 斗争高于一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时指出:“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不幸的是,毛泽东到了晚年也陷入了同样的错误。曾在毛泽东身边前后工作过16年,后来成为毛泽东研究专家的逢先知认为:“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方法确实出现了极端化,不大讲统一,过分强调斗争,强调斗争是绝对的,以至于说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类的话。”<sup>①</sup>毛泽东晚年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反复批评“无冲突论”、“消极平衡论”、“三和一少”等。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推向“横扫一切”、“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

### (4) 夸大主观能动作用。

---

<sup>①</sup> 《说不尽的毛泽东》(下),第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

民主革命时期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一个重要问题是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在他们眼中,敌人的状况总是“十分动摇”、“恐慌万状”、“加速崩溃”乃至“总崩溃”,革命者只要想“大干”,一个“总暴动”即可获得成功。毛泽东的晚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对贫穷落后“一穷二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特殊困难估计严重不足,反而认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并企图通过搞阶级斗争和“灭资兴无”的办法,不断提高人的政治觉悟和完善道德水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如老革命家、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所指出:“如此过分夸大政治对经济、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用形而上学偷换辩证法,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犯唯意志论错误。”

## 2. 从一个新视角看,毛泽东由反“左”英雄重蹈“左”倾覆辙的经验与教训。

人们对毛泽东犯“左”倾错误,从政治历史角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我想从人生角度提出问题,即曾经是反对“左”倾错误的旗帜和英雄,并对“左”倾错误做过系统深入研究的毛泽东,为什么会重蹈覆辙,而且犯了更加严重的“左”倾错误呢?这个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将会对后来者的人生之路更具有启示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一些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的领导人处于相同的历史条件。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差不大;刚刚起步革命,都缺乏经验;面临同样艰难的工作环境,都希望早日取得胜利。为什么在众多的领袖人物相继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时,毛泽东却能坚持正确方向和正确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了解国情。中国的国情,最重要的是农民占人口的90%,小农经济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出身于城市,主要活动于城市,对农村缺乏深刻的

解,对农民不熟悉,因此考虑问题容易脱离中国的实际。而毛泽东出身于农村,生长于农村,并且善于搞调查研究,对农村有着深刻的体验和了解,对农村中的各种人都十分熟悉,因此考虑问题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其二,他比别人更敏感;并及时实行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变。大革命失败以后,条件的变化使全党取得共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然而党和革命事业的重点需要从城市转向农村,否则难以生存和发展。对此,许多领导人难以认识或迟迟才认识。毛泽东则基于对国情的正确了解和对形势变化的正确分析,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带头实现了向井冈山进军的伟大转变。此后,毛泽东一直活动于农村根据地和农民游击战争第一线,对于形势的变化和上级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处于十分敏感的地位。

其三,他比别人更能感受到群众的脉搏。毛泽东群众观点强,作风深入,在整个民主革命年代,他和许多干部群众有着广泛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能够随时倾听干部和群众的心声。如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所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其四,他学习理论注重联系实际,思维始终处于十分活跃状态。而在这一点上,其他许多领袖人物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差距。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理论思维十分活跃,但受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限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后来的领导人李立三、王明等,受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束缚,在流行于20—3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倾思潮中,惟命是听,亦步亦趋,跟着犯了“左”倾错误。而毛泽东理论思维十分活跃,并不断地从实践中吸取新的生命力,使得他能够在教条主义泛滥的情况下,独树一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在领导

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和吸取集体智慧,创立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基本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对照毛泽东本人的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我们再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之所以重蹈“左”倾覆辙,是和他的精神状态,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身的某些强项转化为弱项等,不能不有着直接关系。

(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自身的某些强项转化为弱项。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主体从农村进驻城市,毛泽东对城市远不如对农村熟悉,他讨厌商品经济,等价交换,曾多次流露对城市生活的不满,表达对农村游击战争生活的恋恋不舍之情。面对革命任务的巨大变化,由搞阶级斗争转变为搞经济建设,毛泽东也远不如搞阶级斗争那样得心应手。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曾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这样,就很难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很容易做出一些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来。

(2)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毛泽东由一贯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转为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出现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本人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社会地位变了,由“造反者”变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最高权力者;二是胜利与成功的喜悦,使他在全国、全党三呼“万岁”声中“逐渐骄傲起来”;三是逐渐步入老年,他1893年生,到1953年已满60周岁,在当时的中国已算老年。上述变化,对于每一个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其精神状态也不能不带来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和“把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sup>①</sup>。以战争年代搞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和对经典作家某些观点的不适当搬用(如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来解决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问题,必然要犯“左”的错误。

(3)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在理论方面存在的某些疏漏,使毛泽东本人放松了可能犯“左”倾错误的警惕。我们党分析“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问题,一个影响颇深的说法是:“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政治倾向和生活方式的表现,“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sup>②</sup>。这一分析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是,把“左”倾或右倾错误的产生通通归于小资产阶级,是外来的,似乎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不会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这种“外来论”,显然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战士,曾犯过“左”倾或右倾错误),也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后,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别人也这样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领袖,当然不会犯“左”倾(或右倾)错误,从而导致许多人(包括领袖人物自己)失去对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的警惕性。

---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 第二章 权力啊,权力

有位学者说“领袖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我看很有道理。被推上领袖岗位者并不是神,也是生活于现实社会的普通人。尽管他们有出众的才能,作为人,其素质也是千差万别,不断发展变化的。领袖的个人素质与所赋予他的权力是否相适应,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领袖犯错误,特别是犯重大的错误,总是和领袖个人与赋予他的权力失去平衡有着极大的关系。

### 一、领袖滞后与权力失去平衡

历史如长江大河,后浪推前浪。被涌上浪尖的弄潮儿不会永远在浪尖上,有时也会沉入峰谷。革命事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斗争形式。因此,各个时期对领袖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领袖人物在历史潮流中应运而生,有的随潮流而发展,有的则逐渐滞后,这也是常有的事。处于滞后的领袖人物,依然掌管大权,领导和指挥革命事业,则很容易犯大错误。对于个人也往往是个悲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就属于这一类型。

有一个时期,因为陈独秀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把他描写成一个唯唯诺诺毫无生气的懦夫。其实,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从青年时代即立志为救国救民献身,痛呼:“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陈独秀的一生曾先

后五次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始终宁死不屈。第一次是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二次革命”,于1913年8月被地方军阀抓获,发出布告要枪毙他。陈独秀在生死面前大义凛然地说:“要枪毙,就快点吧!”后为当地知名人士全力营救,幸免一死。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入狱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面对黑暗势力,他表示:为了民主与科学,“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认为“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入狱三个月后,反动当局迫于全国掀起营救陈独秀运动的强大压力,终于将陈释放。

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后,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又两次被上海租界地警察逮捕入狱。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同志“不要说出真情,可把一切推到我身上”。陈独秀入狱后,党大力营救,并发动少年中国学会等10个社会团体发表《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书》,呼吁“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救护陈独秀,就是“救护垂危的改造运动”,就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我们要牺牲一切来救护他”!在各界抗议浪潮声中,租界当局不得不罚款放人。

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是在1932年10月,此时他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由于大革命失败以后坚持不认错,后来又参加并组织托派活动,1929年11月被中共开除出党。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罪,将陈独秀关押入狱五年之久,直到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才释放。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起诉,陈独秀大义凛然地据理以驳,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行为。1933年5月1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刊登的《陈独秀案开审记》,对第一次开审做了如下报导:

检察官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

陈独秀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只能

将个人情形报告。”

检察官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陈独秀答：“（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法庭上，著名大律师章士钊自愿为陈独秀辩护，指出：“被告……完全不站在共产主义之立场上，而系爱国心切，甚至可谓爱护国民党心切之故。”陈独秀不赞同章氏的“辩护”，立即表示“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他在自撰的《辩诉状》中，进一步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陈独秀这种宁肯坐牢杀头，也不肯附和别人曲解自己政治立场的精神，受到舆论界的敬仰，称赞他“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

像陈独秀这样一位决心献身革命事业的叱咤风云的人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并一连五届担任党的总书记，应当说是历史的一种合理选择。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教育了整整一代革命者。他领导了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被毛泽东称为“总司令”。他是最早走入工厂从事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之一，当时的工人称他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sup>①</sup>。他亲自组织建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已被党的参加者称为“我们的领袖”。

作为党的领袖，陈独秀在建党以后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领导全党进一步完成从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转

<sup>①</sup> “通信”《劳动界》第五册，1920年9月12日版。

变。中国共产党是在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基础上,于1921年7月成立的。然而,从学术团体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转变不是一个早晨就完成了的,它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共产国际负责人拉狄克即于1922年1月提出,中共应该进一步“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的问题。后来,陈独秀又多次提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口号。1926年7月,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指出:“说到我们党的状况,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的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建党初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sup>①</sup>,从而使中国历史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②1921年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组织和领导了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工人斗争,并于1922年形成工人运动的高潮。③在浙江省萧山县等地成立了一批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抗税减租斗争。④与国民党建立以“党内合作”形式的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

陈独秀所面临的革命事业,其内容、形式和规模都比建党前或建党初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革命性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理论上、实践上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无产阶级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可是在中

---

① 《中共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国,共产党首先需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上如何认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的关系? 实践上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关系? 其次,斗争形式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以报刊宣传为主要形式的思想启蒙运动。建党以后则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形式。斗争形式的转变,大大增强了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第三,斗争规模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前,共产主义者们基本是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圈中活动。建党以后,几年之内即掀起有千百万工人、农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实践中,党的领袖陈独秀在理论素养上,政治经验上和实际领导能力上,逐渐表现出与他所承担的领袖职务不相适应。如处理两个革命的关系,理论上陷入片面性,坚持“二次革命”论;处理国共两党关系,联合时看不见斗争的存在,由幼稚而右倾;对待农民运动,有点“叶公好龙”,指责多于引导;对北伐战争的看法,观察判断失误。就这样,逐渐发展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刚刚走出“研究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身上不能不有着那个时代的印痕——“个性解放”的影响。再加上启蒙时代少数人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而大多数人尚处于不觉悟、无组织状态的历史条件,大大加强了陈独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从而形成他的“特立独行”气质。这一气质,对于启蒙时期的领袖来说是闪光的色彩,使他不惧孤立,力排众议,敢于为天下先。而对于一个领导复杂政治斗争的政党领袖,“特立独行”则容易成为失之偏颇、甚至一意孤行的人生陷阱。

建党初期,党内有一批思想理论上十分活跃的领导干部,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他们在中国革命理论和战略、策略方面,提出过许多好的见解。然而作为主要领袖的陈独秀,并没有在和这批活跃分子的思想碰撞中,吸取营养,集中集体智慧,而是固执地充当对立面。在实际经验方面,建党以后各地工农运动

中,曾创造出不少好的经验,站在第一线的干部们也曾向中央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和意见,这本来可以成为陈独秀弥补个人经验不足的绝好机会,然而他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在犯了右倾错误以后,既不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也不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观察、再认识,而是采取“内省”的办法“闭门思过”。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使陈独秀逐渐远离组织,远离群众,远离革命斗争的旋涡。到了晚年,虽然如他在《赠刘海粟联》中所说“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重新走向“研究室”,在贫困交加中结束了一生,成为“一代怪杰”的悲剧人物。

由于陈独秀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又一度参加过托陈反对派,在一个很长时间,被认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资产阶级人物”。虽然早已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都是围绕陈独秀个人评价展开的。我认为它并不只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陈独秀“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个资产阶级人物,那么没有必要全党花费力气总结陈独秀的历史经验教训,或者只是学习如何识别和排除“异己者”就可以了。然而历史却表明,这样做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避免错误,甚至还可能犯更大的错误。

提起“马克思主义者”,在人们心目中往往是一个尽善尽美、真理化身的形象,这实在也是一种个人迷信。马克思主义者是人不是神,衡量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也不能过分理想化。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尽管由于他刚刚走出“研究室”,带着明显的启蒙者的气质,但他能够和李大钊等人一起,在中国第一次高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能够不怕坐牢杀头,无私无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就这些主要方面而言,应当说建党时期的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

独秀后来的人生悲剧表明,世界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中,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努力学习赶上时代,就可能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的悲剧人生,为广大共产党人提供的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所在。

## 二、领袖文人气质与权力失去平衡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结成革命联盟,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统一战线,肩负起领导“国民革命”的重担。新的斗争形式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必须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国情,正确处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必须正确估量全国各派政治力量,科学地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作用,特别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实践中必须尽快地学会革命斗争艺术,处理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引导革命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面对这一新的斗争形式和任务,从“研究室”走出来的第一任党的领袖陈独秀,领导能力、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均有缺陷,难以胜任,以致犯了大错误。

此时,一批年青的新鲜血液涌现出来。他们是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留法、德勤工俭学回国的干部,如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等;一部分是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过几年的干部,如瞿秋白、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还有一部分是在国内工农斗争第一线成长起来的干部,如毛泽东、邓中夏等。留法、德勤工俭学者,一面在大工厂参加劳动,一面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情况进行考察,也积极参加了一些实际斗争。经过2—4年的学习和锻炼,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不仅掌握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学

习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和资产阶级政党状况,也有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深切了解。这些恰恰是第一次大革命中急需,而当时党内许多干部,包括党的领袖陈独秀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赴苏俄学习和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有条件直接观察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实际情况,结合苏共的实际经验学习革命理论,并且与广大苏共党员和群众一起,经历了十月革命初期艰苦生活的磨炼,参加了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战斗。血与火的考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迅速地成熟起来。回国以后,很快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国内坚持工农斗争第一线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勇于实践,注重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起来,不仅在工作上做出出色成绩,而且在若干革命理论问题上显露出真知灼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中的佼佼者瞿秋白,在革命危难时刻,继陈独秀之后被大家推举为党的第二任领袖。就瞿秋白个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正如老革命家,也是第二任领袖班子主要成员之一的李维汉所说:“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过抵制。他在党的五大时,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在当时,这是有系统地驳斥投降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由于瞿秋白同志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消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sup>①</sup>

领袖不仅是一种“权力形式”,而且是活生生的人,每个领袖都

---

<sup>①</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7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特征。领袖的个性特征往往在“权力形式”的运作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有人说马克思是“英雄人格”,恩格斯是“辩证人格”,毛泽东是“奋斗人格”,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瞿秋白是“学者人格”,在他身上浸透着浓郁的文人气质。瞿秋白的许多同代人,都对此有强烈的感受。如建党时期的老共产党员、伟大的作家茅盾说:“我和他相识多年……感到他是诗人气质极为浓厚的人。”从建党至30年代曾是中共重要领导人、后来叛变革命的张国焘也说:“瞿秋白是一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

作为富有文人气质的领袖,瞿秋白在我们党内树立了许多好的风气,最突出的是:①思想活跃,肯于在理论上下工夫。他“是我们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sup>①</sup>。②作风民主,平等待人。他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在工作中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尊重不同意见,讨论一致后,做出决定”。“所以,当时的领导班子心是齐的,关系是团结融洽的,以后改正错误时,大家的意见也完全一致。”<sup>②</sup>③在处理党内关系问题上,“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不揽功诿过,不搞歪风邪气”<sup>③</sup>。他在胜利和得势时不以“一贯正确”自居,如他所作的六大政治报告中,谈到陈独秀右倾错误时,公开表示:“我自己也是有错误,但是我可以说是不同意见的。”他在失势以后看到李立三犯错误,能够坦诚地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在被敌人逮捕面临牺牲时,他一方面从容就义,

① 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85年6月18日)。

② 李维汉:《怀念秋白》,《北京日报》1980年7月14日。

③ 同上。

另一方面坚持让全党了解“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甚至愤慨地说：“我绝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然而，文人气质中的自负、清高以及多愁善感等，对于身居政党领袖要位的瞿秋白，则明显地存在着不协调。表现于行使领袖权力，力不从心，有时难以胜任。表现于自身常常为矛盾、困惑、苦闷所困扰。

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与腾挪跌宕的政治斗争，一个富有书生气的人，往往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由于清高和对世俗的距离感，在需要入木三分的观察时，有时却如“雾里看花”；为了更好的生存，在需要忍耐和韬晦的时候，却表现出不应有的冲动；为了争取胜利，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往往缺少应有的气魄。这种状况，对于一个政治家，特别是对于一个掌握革命事业的决策、指导大权的领袖来说，必然容易陷入失误之中。我很赞成《瞿秋白传》中如下一段分析：“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遇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当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都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能不是他终生引以为憾的事。”<sup>①</sup> 瞿秋白本人在总结人生之路严格“自我解剖”时，也表示：“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

瞿秋白在敌人监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向我们展示了他的

---

<sup>①</sup> 陈铁键：《瞿秋白传》，第291—2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处于矛盾、困惑、苦闷的内心世界。因为有了“多余的话”，这位早已英勇牺牲于敌人屠刀下的革命先烈，在“文革”中被诬蔑为“大叛徒”。“平反”以后，人们对《多余的话》仍然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暴露”。有的则回避感情世界的内容，强调它在特殊条件下的“微言大义”，是揭露王明路线的“重要遗言”。为了较为准确地认识瞿秋白的文人气质，我们在这里对《多余的话》做些具体剖析。

《多余的话》分六个部分。

“历史的误会”：瞿秋白回顾了参加革命的经历，认为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对文学艺术感兴趣，结果却搞了政治；自己本来“实在没有兴趣和才能负担这个领导工作”，结果却当了党的领袖。“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在这个部分坦诚地展示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其一，担任领袖期间，如“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实在不能胜任”的感觉；其二，无产阶级宇宙观、人生观与“潜伏的绅士意识”的矛盾；其三，四中全会以后屡屡挨王明“左”倾路线整时的痛苦心情，他激愤地说：“中央怎样说，我就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

“我和马克思主义”：瞿秋白回顾了自己追求、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一方面表示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无从改变”；另一方面也感到现实中有些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去衡量“想不通”，甚至“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面对“左”倾路线下错误的党内过火斗争，瞿秋白心情沉痛地说：“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都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行为‘打倒’对

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

“文人”:瞿秋白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文人”性格与现实的不协调。如,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自己总有些“婆婆妈妈的”书生气,甚至“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在内部,虽然“我也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总是想“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对于现实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告别”:面临死亡,瞿秋白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仍然充满憧憬和希望,“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面临死亡,瞿秋白坚持坦诚的让全党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即使为此有人说我“以叛徒而冒充烈士”,自己也心地坦然;面临死亡,他表示:“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

瞿秋白被捕以后,一方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定不移,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另一方面,此时此刻的他,由于在党内斗争中屡受不公正待遇,屡遭“无情打击”,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委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所写的《多余的话》,在严肃的回顾和总结自己的人生时,也坦诚地展示了自己感情世界的矛盾、苦闷,以及由种种“想不通”而彷徨、激愤的心态。有一种说法,把这些感情世界的东西和共产党员的党性对立起来,称之为“没有和传统观念决裂”、“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暴露”,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大体说来,就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政治理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有人类高尚美好的品德;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在这个总的要求下,每个共产党员可以表现出多种多样的个性色彩。因为共产党员并不是“绝对理念”的化身,而是生活于现

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英雄人格”，“辩证人格”，“奋斗人格”，“学者人格”，每种个性都有所强，又有所弱，它们和共产党员的党性并不互相排斥，或势不两立。因为共产党员也有丰富的感情世界，也有七情六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有的英勇刚烈，有的寡言悲壮，有的柔情满怀，这些都不愧是英雄。天有阴晴风雨，水有潮涨潮落，人的情绪自然也有起伏变化，胜利时激昂，失败时悲愤，挫折时困惑，这些也都是正常的。不能认为共产党员只许有“纯而又纯”的理念，不能有柔情满怀；只许情绪高涨，不能有任何悲观失望；只许永远坚定，不能有任何的矛盾、彷徨；只许有“阶级意识”，不能有任何“传统观念”。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长期以来，由于某些形而上学作怪，对于历史人物的个性、性格、内心世界的研究分析，存在着两种倾向。或者视为禁区，完全回避，历史人物成为苍白的政治理念的化身；或者趋尚时髦，凭主观想像为历史人物加“暗色”、“复杂性”，借以鼓吹某种理论。我想，实事求是的研究《多余的话》，对我们正确解决历史人物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会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得到某些启示。

### 三、领袖平庸与权力失去平衡

和陈独秀、瞿秋白不同，王明属于另一类型领袖。陈独秀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犯错误，瞿秋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王明则是“平凡而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人生与权力的巨大反差，使他演出了一场并不令人感动的人生悲剧。

人们常常把王明犯错误乃至他一生的悲剧，归于“野心勃勃”的领袖欲。似乎王明从青年时代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一心想当领袖。为此，想方设法地巴结上司，处心积虑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一步一步地爬上领袖地位，然后更加为所欲为。每次看到这样的解释，我总想起18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卡莱尔的一段

话：“研究克伦威尔的历史学家想像，当他还在耕种剑桥郡的沼泽地时，他就决心做英国的护国公。对此他已经勾画了他的一生，一个全剧的方案；然后他一步步地以各种狡猾的欺骗的戏法般地实现这一方案。”卡莱尔从理论角度批评了这一说法：“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多大程度上能预见自己的生活？我们前面的捷径是完全昏暗不清的，是一束松散的可能性、可理解性、可行性，看起来模糊的希望。这个克伦威尔并没有按这种只是对一幕幕戏剧表演才需要的深不可测的狡猾性方案来安排他的生活！根本不是这样。”<sup>①</sup>我想，我们对王明的这种解释，同样也是夸大了“野心勃勃的领袖欲”，对人的一生所起的作用。

“领袖欲”，一般说来并不是坏事。如果一个人谋求权力，是要借助权力干一番事业，为人类的解放做出更大的贡献，自己也可以在历史上留下更好的名声，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是卡莱尔说得对：“确定雄心是不是坏的，你要观察两种东西：不止觊觎地位，还有这个人对这地位的合适性：这是问题所在。”<sup>②</sup>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考察王明作为领袖犯错误的问题所在。

如果说其他领袖犯错误，是自身的某些缺陷导致的，那么王明则是总体素质不行，却掌握了他不该掌握的权力。曾是中央早期领导人的张国焘谈到王明时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见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sup>③</sup>另一个党的早期干部王凡西（后来成为托派重要人物）也对王明做过类似的评价，他说：“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

① 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第358—359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

② 同上书，第364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版。

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sup>①</sup>王明本人在延安时期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时,讲了如下三条:一、“心中无数,对经济问题向无研究。发号施令,是靠教条”,“哲学未学,不懂方法论”;二、“知识缺乏,党的锻炼很差,工作经验也差,我不懂中国历史”;三、“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我既骄又躁,盛气凌人”。这个检讨尽管是迫于形势和压力做的,总算是王明讲了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

我们把王明和其他领袖从素质上做个比较,问题会更加一目了然。

理论素养对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向和活动方式。”<sup>②</sup>考察一下我们党的理论运动发展情况,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毛泽东等,都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尽管由于主观客观种种原因,有的成功,有的失误,有的贡献大,有的贡献小,但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大厦添了砖,加了瓦。即使是信奉“城市中心”理论的李立三,在运用这一理论时也还是一定程度地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说“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在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却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他指出:上海搞暴动“并不能马上使全国反动势力都完全死亡”<sup>③</sup>。

王明则完全不同,他学习理论的目的,似乎不在于如何搞好中国的革命事业,而是带有更多的个人出风头的色彩。综观他的理

<sup>①</sup>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89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版。

<sup>②</sup>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sup>③</sup>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

论著作与理论活动,极少有以革命理论指导研究中国实际的课题和成果,而是处处以“批判者”自居,批判陈独秀,批判瞿秋白,批判李立三,批判毛泽东,对王明来说,批判就是一切。王明的这种恶劣作风,对中国革命理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颠倒真理标准,以书本检验一切;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窒息了理论发展的生机;把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理论上的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被无限上纲为政治问题,并被扣上“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右派反对派”等大帽子,扼杀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思考能力。

从实践经验与领导能力来看,王明在历届领袖里也是最差的。建党时期的领袖陈独秀,尽管有浓厚的启蒙色彩,但他在建党以前已经有了十几年参加民主革命的经历,五四运动前后又亲自到工厂做工人运动,并几次经历了敌人监狱的考验。在他任领袖的初期,党的组织迅速扩大,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瞿秋白是实际经验较少的一位领袖,但他在成为党的领袖之前,已经有七年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他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受了血与火的严酷考验和锻炼。他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有组织地领导了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至于毛泽东的实践经验与领导能力,其出类拔萃,早已广为人知,这里不再赘述。

王明则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秋即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4月回国参加上海党的机关工作,1931年1月担任党的领袖。据有的资料统计,从1925年到1931年1月,王明在国内只呆了9个月,到1935年1月“左”倾错误结束时,10年间也只有3年时间在国內。在此期间,国内的任何一次重大的革命活动,王明没有组织领导过,甚至根本没参加过。即使是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样一个决定王明成为党的领袖的重大活动,也是由共产国际的领导干部主持召开的,王明



并不是这一历史活动的主角。

列宁讲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对于一个如中国共产党这样大的政党的领袖，如果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没有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较多了解，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较深造诣，不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是很难胜任的。纵观民主革命时期的几任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造诣。而毛泽东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sup>①</sup>

和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比较，王明在文化素养方面，也是相形见绌得多。我举个例子，陈、瞿、毛都喜欢写诗，王明也写过许多诗。把他们的诗放在一起比较，会明显地感觉到，陈独秀的诗富于豪气，如“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瞿秋白的诗富于灵气，如“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毛泽东的诗词更是“大气磅礴”、“有吞吐宇宙气象”，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相比之下，王明的诗则缺少这种震撼人心的浩然大气，也缺乏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的蕴含。除个别诗较好外，多数显得那么浅薄、苍白，甚至流于喊口号。如：“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上海工人真英勇，武装起义告成功”，“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等等。我们不是说领袖必须是诗人，或诗写得好才能当领袖，而是对同样喜欢写诗的领袖人物，把他们的诗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文化素养高下深浅

<sup>①</sup>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

之不同。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正确行使权力,要有两个基础:“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领袖的品格,是能否胜任领袖职务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我们党的历届领袖的大多数人,尽管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人格上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面对敌人的监狱、屠刀、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无所畏惧,谈笑风生,沉着应战。不仅指挥得当,而且给广大党员干部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二是宽广豁达的胸怀。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28年内,由几十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到取得整个国家政权,一个重要原因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党的领袖们始终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谋求绝大多数人的解放为己任,发动和吸收各种各样的人投身革命大家庭,并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三是表里如一的正派作风。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严重,但他从不搞阴谋诡计。鲁迅谈到他的为人时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有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sup>①</sup> 党的另一位领袖瞿秋白则更“是一个正派人”。即使是晚年的毛泽东,他的失误在于,把有些同志错误地当成了敌人,导致他采取错误的手段对待了这些同志。

用以上三个方面衡量王明,则条条相距甚远。1930年11月,王明在上海被敌人逮捕入过狱,他不是沉着应付,而是有些惊慌失措,怨天尤人。出狱后立即给共产国际米夫写信,“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到了脑后”。王明心胸狭窄,作风不正派,是党的历史上有名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多数同学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

<sup>①</sup>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6),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藉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sup>①</sup>。后来,竟发展到无中生有,制造“江浙同乡会”、“工人反对派”等罪名,陷害一大批革命同志,更是令人发指。王明在党内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大搞宗派主义,也不尽源于“政治分歧”,而是怀有明显的个人目的,那就是王明自己在延安时期自我检查时所说的:“我的确想当大王。”

像王明这样一个完全不具备领袖素质的人,能够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有着光荣斗争历史而又人才济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王明具体错误的分析批判上,而应该着重考虑,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一个平庸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它为我们领袖及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上,提供了什么历史教益。

#### 四、领袖无制约与权力失去平衡

一个很长时期,我读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对他们所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等,总不以为然。自信斯大林的话“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正确,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战士,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讲的“规律”,对无产阶级自然不适用,不起作用。

没想到这样的认识太简单化了,太理想化了。在沉重的历史教训面前,不能不引起新的思考。把权力说成绝对坏的东西,立论于人性恶,理论上是否科学值得商榷。但对权力采取拜物教的态度,无保留地歌颂,无限制地崇拜,则肯定要出问题,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人带来地位、利益、尊严、荣

<sup>①</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版。

誉、满足,以及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条件与机会;另一方面手握权力者,也容易产生错觉,过高地估计个人的智慧,过大地估计个人的力量,以及过分的自信心和虚荣心,高人一等的位尊感,从而拉大了与人民群众和社会现实的距离,陷入一种盲目性与危险性。毛泽东在会见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时曾说过,任何身居高位的人几乎都潜藏着个人的悲剧,我想是很有道理的。

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样出类拔萃的领袖,这样睿智通达者,晚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他个人,也使整个国家演出了一场悲剧,重要原因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于领袖个人,全党失去制约领袖的能力,从而使权力失去平衡。对此,邓小平作过如下深刻的分析“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任何一个领袖包括非常高明的领袖,理论上或形势判断上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正常的,有些甚至是难以避免的。如果领袖与领袖、领袖与群众处于民主平等地位,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互相切磋,是可以集中集体智慧,尽量减少错误的。如果不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即使领袖个人做出重大的错误决定,全党也可以有效地行使制约权,使这一错误决定无法变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建立对领袖行使有效制约的制度,是领袖能否正常行使权力的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沿袭了战争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又照搬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党政各级缺乏制衡和调节的机制。主要问题是:

(1)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领导。正如邓小平所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

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多数办实际事情的人没有决定权,少数有决定权的人又负担过重,忙于应付,这样必然容易出问题,犯错误,由于这一切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党委决定”的口号下进行的,因此出了错误,广大干部难于表示反对,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

(2)“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战争年代中央曾作出过一个决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按照胡乔木的解释是,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毛泽东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最后决定之权”扩大到对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后来发展到,毛泽东个人可以任意推翻中央的决定。如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到1957年10月,毛泽东即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后即按这一看法改变了八大决议,并写进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直到“文化大革命”,领袖可以把党的整个组织抛到一边,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全国发号施令。

(3)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某些干部事实上成为高居党组织之上的“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

部,特别是领袖人物,掌握着各级干部的荣辱升迁命运,即使发现领导人的某些错误,又有多少人能够“不怕丢官,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敢于直言己见呢?即使有“不怕”者,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庐山会议上敢于直言,其结果不仅对领袖的错误没有起到制约作用,自己反而在强大的权势面前,丢官受辱,被打成“异类”。在这种情况下,也容易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甚至备受重用。如林彪讲过:“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正是因为林彪精于此道,使他迅速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最可靠的接班人”。

(4)以权代法,“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sup>①</sup>。法律,是有关部门依据国家的根本利益制定的,并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人必须遵守的规矩、章程。领导人不依法行事,全凭个人一句话,可以这样办,也可以那样办,这种有很大随意性的做法,很容易出问题,甚至是很危险的。如1957年划“右派分子”,既没有经过司法机关,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全凭领导人一句话。又如“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牛鬼蛇神”,不仅没有法律条文根据,甚至不是科学的政治术语。结果,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辜遭难。以权代法,以领导人的话做“法”,实质上是置领导人于法律之上,使领导人的言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如毛泽东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在法律与个人意志有冲突时,竟然“砸烂公检法”。

理论宣传上的错误导向,也为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对领袖失去制约的体制的推行,起到广造舆论,推波助澜的作用:

(1)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同一个领袖班子中,把某一个领袖和其他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领袖人物对立起来,只有一个人正确,其他人统统是错误的,即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把毛泽东思想说成一个人智慧的产物,如果讲讲其他人的功劳和贡献,则被视为“分庭抗礼”或“贬低毛泽东”。二是割断历史的发展,从陈独秀到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上共有六任领袖,反映了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然而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宣讲中,似乎建党以来历史上只有一位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如风行一时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不仅把整个党的历史写成毛泽东个人活动的历史,甚至把党史写成毛泽东个人与党内所有领袖人物斗争的历史。

(2)把一切成就归于个人,不讲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是“路线决定一切”,实际上就是领袖决定一切。即所谓:“我们党半个世纪以来的十次路线斗争经验证明,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受挫折,就失败;跟着毛主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前进,就胜利。”这种说法:一、违背了党的历史实际。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于20年代初。30年代以前,党的历史并不是只有失败没有胜利;30年代以后,也并不是只有胜利没有失误。二、颠倒了路线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是在全党英勇奋斗的革命实践基础上,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才逐渐形成的。正确路线形成以后,当然又对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历史唯物论认为:路线的产生,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为基础;路线的发展,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推动;路线的正确与否,同样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来检验。路线决定一切,领袖决定一切,违背了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原理。

(3)神化领袖,把领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领袖也是凡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最有影响者莫过于三个人的三句话:一是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二是1958年至1959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三是1966年年初,林彪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致造成这样一种强烈的气氛,对于领袖只能歌功颂德,不能讲缺点和失误,更不许批评。讲领袖的缺点、失误长期被视为禁忌,批评领袖则被视为政治问题。而这一切,又都是在“维护领袖形象”的理由下进行的。

无产阶级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确实是值得结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进行研究的。列宁有一段话很深刻:“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德国工人党甚至曾纠正像倍倍尔这样伟大的领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sup>①</sup>鲁迅讲到伟人时也说过:“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通,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sup>②</sup>这两段话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领袖是人,不是神。维系无产阶级团结,靠的是真理的力量,而不是什么神灵;领袖的号召力,来自领袖忠于人民,处处以身作则,实施正确的领导,而不是靠宣传“人民忠于领袖”就能实现的。

理论认识问题很重要,没有思想上的民主、平等、科学,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对领袖实行制约的机制。即使有,也会如同虚设,不可能有效地运作起来。试想大家都把领袖奉若神明,全能的上帝,真理的化身,有谁会想去“制约”领袖,又有谁敢去“制约”领袖呢?

---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② 鲁迅:《战士和苍蝇》,《鲁迅全集》(3),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 第三章 挫折与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领袖们曾犯过不少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使事业遭受巨大损失,党处于危机中,革命濒临崩溃边缘。然而每一次又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历经曲折又继续前进。这是偶然,是天助,是神灵,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历史学家们曾给予了多种答案,如“存在一条正确路线”,“有某一位领袖的正确领导”,或者归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历史规律的必然”等等。这些说法,都从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然而又都或多或少带有简单化、片面性的历史印迹。在共产主义运动面临风云巨变,敌对势力宣布“共产主义的死亡将是人类留给20世纪的一大遗产”的今天,我们实事求是的重新审视某些历史经验,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加以思考,将不无现实意义。

### 一、一个艰难的历史课题:关于中国革命

究竟应该怎样改造中国社会?20世纪初,人们曾经提出或实行过多种方案。如:康有为主张“立宪政治”,“君民共治”,“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在实践中,只经过短短的百日维新,即宣告失败,一些志士并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树立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辛亥革命由于领导者自身的弱点和没有能广泛发动民众,在

强大的反动势力进攻中,革命势单力薄,终于失败。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建立“新村”,把旧人变为新人,从而改造社会。教育救国论者认为“教育万能”,改造社会需从儿童教育入手。科学救国论者认为“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相对的万能”。还有的提出用“工人储金”办法,达到消灭阶级剥削。或鼓吹改造社会先要改造人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挖地洞”。上述方案,有的纯属空谈,有些虽有成效,但无力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

到了20年代初,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提出中国也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劳农革命。这一主张立即受到各种旧派人物的反对,于是从1920年—1921年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

(1)“论到中国,劳动阶级除了交通阜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没有”,“至于农民,要晓得中国向来地主与佃农多是平分收入,甚至于佃农得六成,地主得四成,所以农民对于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因此,中国既无剥削,也无压迫,不需要革命;

(2)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即外国入侵),因此,“在开发实业的大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工厂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即中国的问题,只有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才能解决;

(3)“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sup>①</sup>,“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sup>②</sup>,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劳农革命,是“逾越阶段”。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受到早期共产党人的反驳。陈独秀、李达等人纷纷撰写文章,表达了如下看法:

① 以上言论引自张东荪:《现在与未来》,1920年12月15日。

②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转引自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1)列举工农大众受压迫剥削的事实,指出:“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人的生活得不着,到底仍然免不了社会革命。”

(2)靠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顾增进物质文明……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现存的政治势力,设若不根本推倒,无论你用好大的力,在那一方面活动,他不是站在你前面阻拦,就是跟在你后面去破坏”,所以“我们要结合无产阶级底全体,用革命的手段,来夺取政权,以为改造底第一步”。

(3)“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并且提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中国应该学习俄国,实行“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sup>①</sup>。

早期的共产党人在这场争论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初步分析中国社会,指出有剥削,有压迫,就会有革命;社会问题只着眼于生产,不从经济制度上解决,无济于世;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我们不应该重走欧美国家的老路,而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做了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早期的共产党人在这场争论中,也暴露出一些弱点。他们在坚持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同时,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反映了当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肤浅的。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哪里开始时,曾说:“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

<sup>①</sup> 以上引自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920年12月1日。

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即无产阶级革命应具备如下四个条件:①工业较发达;②无产阶级占多数;③社会整体文化水平较高;④社会制度民主成分较多。以这四个条件衡量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相去甚远。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极端专制的制度下,毫无民主可言;工业落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极小;四亿人口中农民占 90% 以上,无产阶级只有几百万;社会人口多数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决定,在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照抄照搬,必须要有创造精神。同时,也决定着中国革命必然具有特殊的艰难性、复杂性、曲折性。

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始终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民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解决革命任务、革命形式、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始终把争取民主作为中心内容。正如毛泽东所说:“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sup>①</sup> 即使面对强敌日本入侵,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民主自由问题。他说“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群众身上压着三座大山,如何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争取民主平等,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争取民主”的旗帜,把广大群众,特别是几亿农民发动起来,投入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当家作主人”,成为最能鼓舞人心的口号。我们党在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率先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政权。在最偏僻落后的农村,破天荒第一次实行普选制度,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467—1468 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4 月版。

不识字的农民用“投豆子”的办法选举他们最满意的人。一时间，这些地区成为人们美好理想的寄托，希望之所在。抗日战争中曾到过延安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其《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一书中，对这一历史情况做了如下报导：

和我交谈过的工人好像对他们的工作报酬很满意。几位曾在不同的雇主手下干过好多年的老工人，对今天的工作条件特别高兴。他们的工作时间缩短了，被当做人看待。他们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俱乐部，在管理事务中有了自己的发言权……边区的生活像全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活一样艰苦，但是在他心满意足的话语中我听到了希望之声，也听到了十足的信心。<sup>①</sup>

福尔曼还在书中记载了一位农民的如下谈话：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们老百姓吃不饱。今天，尽管我们的田地就在战争的前线，我们吃的要比过去多得多。不止这些，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没有自由；今天，我们为自己选出来的、我们自己的政府而自豪，我们有权商讨自己的问题。<sup>②</sup>

到延安访问以前一直和共产党意见相左并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梁漱溟，抗日时期访问延安以后留下深刻印象：“中国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亦有领导，但从来没有像中共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的。”<sup>③</sup> 1945年7月，以国民参议员身份访问过延安的国民党政府

① 《北行漫记》，第85—86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4月版。

② 同上书，第215页。

③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127页，湖南出版社1988年4月版。

官员兼学者傅斯年,也惊叹道:“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sup>①</sup>

如果说民主革命中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是在每个革命时期都十分注意解决民主问题,那么夺取政权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走的一些弯路,栽的一些筋斗,也恰恰栽在忽视和没有正确解决民主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而且是权利,是制度,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制度和体制方面,还是很不完美的,如何进一步实行政治民主化,并且把民主扩大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使之制度化、法律化,是个十分值得重视并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民主不只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针对我国存在着封建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解决民主问题上,还要着重划清现代民主理论与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的界限,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们要的是“民做主”,而不是“做民主”。民主的要义在于人权平等,人格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把民主当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如

<sup>①</sup> 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载《世纪评论》1947年2月15日。

“为民作主”、“爱民如子”、“谦恭纳谏”等等,从本质上说,仍然属于“皇恩浩荡”的表现形式。

## 二、“凝聚力”从何而来:关于中国共产党

在有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瓦解垮台的触目惊心的教训以后,重新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问题,并认真总结有关的历史经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人说凝聚力来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也有人说因为共产党正确,还有人说由于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上述各种说法虽然都有道理,但又都过于理性化、理想化,与事实不能完全对号,因此不能解决认识问题。如:同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苏联和东欧的党失掉民心垮台了,而中国共产党却没有;说中国共产党一贯正确,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党曾多次犯错误,甚至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民主集中制的贯彻也不尽如人意,有时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实实在在、曲曲折折的历史中,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逐渐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形成了自己的凝聚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则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对此做出杰出的贡献。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此后,他又多次讲到“民族形式”问题,并把这一思想贯穿到革命战争、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文化建设、作风养成,以及对未来国家政权的设想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并以此武装了一代革命者的头脑,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书本上的纯理论,而是与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经历

和千千万万党员的个人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活的东西。如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中国的广大群众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直到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大挫折，而中国共产党以及绝大多数党员，没有抱着马克思主义的课本陷入困惑与迷茫之中，而是以理智和冷静对待风云变幻，满怀信心地到实践中去探索新的出路，这不能不说是几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在起作用，是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

凝聚力的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光说不练，而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历尽艰难，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奋斗了几十年。“七大时有一个统计：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在战场上牺牲的有七十六万多人，其中有三十二万多人是共产党员，几乎占了一半。另一个不完全统计：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至少有一百万以上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任何政党所不曾有过的。也正是这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千千万万群众的心，使他们对共产党人尤为信任、佩服。

党的领袖人物，尽管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为真理、为人民，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都在全党留下深刻影响。如陈独秀多次被敌人逮捕，威武不屈。瞿秋白在敌人刑场上“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英特纳雄奈尔”，英勇就义。李立三一生出生入死，曾被党组织开过三次追悼会。他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党的八大上却诚恳检讨自己，代表们“听这个发言，眼里流出了热泪”。毛泽东晚年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纵观他的一生，是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不只他本人，也包括他的家人。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出六条生命，晚年仍然支持儿子毛岸英走上抗美援朝



前线。岸英牺牲后,有人建议把他的遗体运回国,毛泽东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正是这样一种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风范,深深打动了党心、民心。女工出身的党员张金保,曾被王明开除党籍,1933年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被释放出狱,她历尽艰难,千里步行到延安。毛泽东问她:“王明怎么打也没有把你打走呀!”这位没有文化,又不懂多少理论的女工回答:“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自己飞。”这个形象而朴实的回答,不正是党的凝聚力的表现吗?

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总是给人以希望,值得信赖,这是凝聚力的又一个来源。党之所以能够自我纠正错误,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进组织,在各个时期都集中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时代精英。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尽管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有些论述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过时,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至今还不见有哪一种世界观比它更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受到层出不穷的“新理论”的批判和挑战,但还很难说有哪一种理论,比它更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共产党内尽管也有某些成员和局部出问题,甚至出过严重的问题,但这些在党内始终处于不被允许,不合法规和受批判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历史上,虽然有个别领袖或某些局部可能陷入错误,但党的主体不会长久地陷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可克服的错误之中。

其二,民主集中制在起作用。民主是指:党内一律平等;党内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必须经过选举产生。集中是指: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从党的历史看,在处理民主与

集中的关系上,也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有时民主集中制本身遭受到破坏,但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始终存在。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状态,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没有谁敢公然宣布取消,因此,党的组织一经恢复,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有机整体。美国学者朱潜对中国共产党讲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核心推动力是党,党在过去30年间提供了高度的政治凝聚力……那种阵发性的动乱,只在人事和政策上引起变化,党的结构和基本职能未变。”<sup>①</sup>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内民主生活总的看还是比较好的,但由于非法地位和战争环境,始终更强调集中统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从在野到执政的变化,党的领导人权力大了,骄傲情绪增长了,1956年以后,重大事情往往一个人说了算,民主生活受到很大削弱,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缺乏民主空气,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伤害,对一个政党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原苏共老干部奥尼科夫谈到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原因时曾指出:“扼杀了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使他们习惯于事事等待上级指示,接不到指示就无所适从。”<sup>②</sup>这样,领导层一变动,全党立即瓦解,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其三,中共广大党员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基层党组织广泛分布于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第一线,根植于群众之中。他们熟悉群众生活,了解群众情绪,知道群众要求。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实践效果,反映最直接,最敏感,最强烈。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每次领袖犯错误,总有不同的声音,总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意见存在。

---

① 【美】朱潜:《论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载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年1月。

② 刘洪潮、王德凤、杨鹤祺主编:《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第151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9月版。

即使是1958年“大跃进”中,党的领袖人物和一大批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时,也还有尖锐的强烈的反对意见。直接上书毛泽东主席的彭德怀,早为众人熟知,还有大大小小许多不为人知的“彭德怀”,也纷纷发出忧国忧民之音。如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1959年7月编印的《思想动态》第30期,反映省委党校有近半数学员(都是党的基层干部)认为,人民公社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的复活”。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6月2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45期,介绍天津部分党员干部的看法,认为“大跃进”“劳民伤财,很不合算,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弄得全面紧张”。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7月9日编印的《简报》,反映该厅所属干部认为,人民公社“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不太适应”,“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1959年6月24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第124号反映,少数营团干部和连排干部“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协作区的副局级干部李云仲,于1959年6月9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信,深切地表达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担忧心情,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不同意见:一、他尖锐地指出:“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我是观察、思考了半年多才敢这样说的”;二、他批评了“只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的“左”倾口号,问道:“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三、他认为出现“左”倾问题“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缺乏经验。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很严重”,而主观主义滋长,又是和“未能够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有关。即使是4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读这些意见,也会为他的深刻性、正确性赞叹不已。如果当时党的民主生活正常的话,如果彭德怀、李云仲以及许许多多基层干部的正确意见能够发挥作用

的话,党和党的领袖人物的有些错误是可以得到扼制的,不至于在“左”倾路上愈走愈远,愈陷愈深。

党的历史教训表明,广大党员生活于群众之中,基层支部根植于生产建设第一线,要使这一优势和积极因素正常发挥作用,必须有健康的民主生活和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正如党的十二大报告所说:“历史的严重曲折告诉我们,党内生活是否正常,首先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他说:党内一度“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所以“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 三、批判与继承的不够和谐:关于传统文化

我们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常常忽视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或者仅仅归结为“封建主义思想”、“小农意识”影响。其实,传统文化是国情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取向,不仅记载于有文字的历史书籍上,而且广泛地根植于民间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社会舆论中。它不仅对民族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代的人们,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是信仰革命还是趋于保守,是领袖人物还是一般平民,都发生着重要影响。马克思讲得非常深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征途上,正确与失误,胜利与挫折,都和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认识和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步入近代历史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封建制度的专制腐败,整个社会处于堕落动荡之中。中国急需励志图强,变革求生。此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如“天地君亲师”的“长幼有序”思想,“忠孝节义”的道德准则,“一成而万世不易”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观念,以及平和、折衷的处事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落后、闭关自守的思想舆论保护层。五四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及进步人士,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批判一切旧传统,为在中国实现变革与革命大造了舆论。后来,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五四运动的传统,进一步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把外来的“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并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一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正确路线指引下,发展壮大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执政党。

然而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始终有两个问题没能处理好,以致造成革命事业的若干失误与挫折,甚至在20世纪60—70年代,演出了一场“横扫一切”传统,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悲剧。历史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角度,进行一番反思。

**1. 从理性上宣布“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和事实上极难摆脱传统文化影响,这一矛盾始终困扰着党的许多领袖人物。**

如陈独秀是提倡“民主”、“科学”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敢斗士,

---

<sup>①</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版。

然而他本人却难于摆脱封建主义影响,表现严重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且经受过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严酷考验,然而总是与“士大夫气质”难舍难割。毛泽东也是如此,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征程中,表现出宏伟的气魄,无畏的精神,无私的品格。另一方面,又在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政治主张中,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打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家李锐指出:“中国传统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老革命家周惠从另一个角度谈道:“他做好事的心太大,与他的出身经历,与他所受文化的局限相距甚远,他所继承的悠悠千年的古文化远离商品经济规律,远离工业文明,所以他的‘创举’比列宁、斯大林更富于幻想和浪漫色彩,结果办好事的心越大,陷入悲剧也就越深。”

这一矛盾的形成,主要是革命者低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以为只要下决心宣布与之决裂,或者从理论上加以批判,即可大功告成。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不仅社会效果不佳,批判者本身也并未从中得到“净化”。这是因为,传统文化是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历史沉淀形成的,有其巨大的惰性。还因为某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以找到借以存在的土壤。如在不合理的体制下,领导干部终身制,有权决定下级干部的升迁命运,就会有人身依附的等级观念。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全民普及教育差,有些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得不到科学的回答,就容易有迷信复活。看来,即使是传统文化中已经过时的东西,也只有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中,才能逐步消失,着急是没用的。批判一下也需要,有助于人们分清是

非,但想仅靠“批判”达到“彻底决裂”,非犯“左”倾错误不可。

2. 对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分析,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从而使  
我们犯了许多错误。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等人批判封建主义,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缺陷,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他说:“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无调和两全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后来,毛泽东纠正了五四运动的这个缺陷,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1960年12月毛泽东接见两个外国代表团时进一步谈道:“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有时也存在着矛盾性;理性认识与实际对待,有时也会存在着差距。这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据有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指出,毛泽东具体分析传统文化,有时又认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和人民大众的文化,两者之间处于完全对立、互相斗争的状态。在实际对待时,则往往把载之于书本的“高雅文化”归于否定的一类,而对流行于民间的“俗文化”则大加肯定。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一简单化看法和做法,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成为毛泽东感到困惑又难于解决的问题。导致他把“作为雅文化的载体的知识分子(指中国历代的“士”阶层)便也被理所当然地划入地主阶级的阵营。精英文化及其代

表者就这样被置于应该抛弃和被批判的地位”<sup>①</sup>。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解决文化问题,甚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横扫四旧”,砸烂一切传统文化。

---

<sup>①</sup> 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第38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 第四篇 太阳总是有升有落时

### ——领袖更替与接班人问题

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的过程。真正的灿烂辉煌期,不过二十几年。领袖、伟人也莫能外,即使被人们视为太阳,太阳也还是有升有落。因此,领袖更替,从人生角度讲,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前六任领袖的更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进行的,是革命实践与政治斗争的产物。那时候,尚缺乏甚至没有领袖更替的自觉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环境相对稳定了,领袖人物也相对稳定了。如何树立领袖更替意识,自觉地正确地进行领袖更替,如何有计划地培养、教育下一代人,则成为革命事业能否后继有人,领袖集团能否避免老化,始终保持朝气和生命力,正确领导全党继续前进的战略任务。

为解决这一战略性历史任务,毛泽东曾就接班人问题提出过若干思想和理论,并且在实践中有过四换接班人的曲折历史。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把两者割裂开来,分别给予评价。其实,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想理论是和四换接班人的历史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把两者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对错得失,从更深层次上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 第一章 毛泽东四换接班人的历史困惑

## 一、共和国主席由立到废的悲剧

### 1. “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担负的责任更为重大，公务更加繁忙，而一部分领导人相继进入老年，身体、精力都不如以前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毛泽东提出要多设几道“防风林”。特别是看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引起的动荡，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9月，决定采取若干组织措施：扩大中央政治局，由13人增至20人左右；增加副主席数额；增设处理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并设总书记。刘少奇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副主席，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毛泽东表示：“我是准备好了，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此后两年多内，毛泽东又多次提出“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民主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对此表示异意，他们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在他们的信上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就这样，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60年5月,英国退休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他很想了解中国领袖的继承人是谁,并把此作为访华之行的一个战略观察内容。毛泽东从陪同人员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1956年开八大,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第二天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到年纪时,毛泽东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适时地提出:“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sup>①</sup>毛泽东以这种形式,正式向世界公布了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 2. 毛泽东陷入与风车作战中。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了以下三点看法:①三年困难时期“不是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②造成困难的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③“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过10年后再来总结,可能就看得更清楚”。刘少奇的这

<sup>①</sup> 毛泽东谈话引自熊向晖著:《历史的注脚》,第24—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

些看法,和毛泽东的估计及当时在党内流行的“讲话不离三、六、九”的说法(三面红旗,六亿人民出发,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显然不尽相同。毛泽东虽未当面反驳,却憋了一口气。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又一次发生分歧,再加上毛泽东的某些误解,使他对刘少奇失去信任。这次会议之前,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工作汇报会,出于好意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非要参加会不可。会上讨论“四清”问题,毛泽东提出运动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刘的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满。第二天,毛泽东参加会议拿出两本书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指邓)不让我来开会,一个(指刘)不让我讲话。会议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刘少奇、邓小平很尴尬。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做了检讨,几位老同志也批判刘少奇不该插话,对主席不尊重。毛泽东则认为,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实事求是地说,刘少奇当时虽然和毛泽东的看法有差异,但并没有明确地反对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并且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只是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作出防止“左”倾偏差的规定,如对广大基层干部要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对犯错误干部以教育为主,处分为辅等。即使在“走资派”上

有不同意见,刘少奇后来也还是同意了毛泽东的看法。如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夫人王光美谈话就提道,“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在公社、区、县和地委有根子”。同年7月2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讲“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 3. 在刘少奇悲剧的背后。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为什么和实际情况有如此之大的偏差,以至于下决心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呢?我以为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仅着眼于哪一个方面,都不足以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过不少有益的探索,然而有两个认识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一个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个是把改变生产关系放在比发展生产力更为重要的地位,两者的关系是“抓革命,促生产”,“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sup>①</sup>。这种片面的理论认识与后来愈演愈烈的错误的党内斗争实践,互相促进,恶性循环,使毛泽东陷人与风车作战中不能自拔。

1949年年初,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问黄:“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纠正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題。”1957年反右斗争,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崩得更紧。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所造成的损失提出批评,毛泽东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另一位副总理邓子恢,由于在农业合作

<sup>①</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化的速度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并且赞成“包产到户”等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被毛泽东斥为站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代表资本主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则进一步指出:“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的、倒退的、反动的做法。”进入60年代,在和苏共领导人论战中,毛泽东又把“修正主义”的概念引入国内。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会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时说:“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他把开展“四清”运动,视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战略措施,刘少奇在“四清”上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并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毛泽东的“左”倾认识合乎逻辑的结论。

毛泽东在“左”倾错误中越陷越深,和全党的状况有着密切关系。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用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悲剧的发生。《决议》中列举的五个条件,最核心的一条是民主集中制。由于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和破坏,使得毛泽东失去了和党的领袖群体、广大干部及群众进行思想交流的正常条件,无法吸取群体智慧,导致个人思维失去活力;由于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和破坏,缺乏互相切磋、互相争论、互相制约,使得毛泽东凭主观意志办事的作风愈演愈烈;由于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和破坏,毛泽东了解情况的正常渠道阻断了,才使得坏人有空子可钻。

对于党的领袖接班人、共和国主席这样涉及全党、全国的重大

问题,不经一定的法律程序,不经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凭个人意志说打倒就打倒,说定罪就定罪,其后果不仅祸及刘少奇个人,而且祸及全党、全国,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这里我想引用一位西方学者于70年代对“打倒刘少奇”的看法,这些看法并不一定十分正确,却值得我们深思:

刘少奇的一生可以视为,他力图将秩序与革命结合起来,将平等与经济效益以及技术专家们的作用结合起来。在比四分之一世纪还要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一直是作为党内和政权机构内的一个建设和稳定的力量在起作用”,“刘少奇的一生与四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与缔造当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对刘少奇看法的重大变化必然带来对中共党史的重新评价……

打倒刘少奇“在组织制度上的意义在于: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必须毫无疑问地执行毛的指示,甚至毛有些模模糊糊的感觉也得照办……即使他力图问心无愧地照毛的意愿办事,只要出了任何差错,他也要负责。在过去的年代里,领导层中存在着互相信任的时候,毛的助手(特别是刘少奇)对执行政策的方式和采取的组织形式都有着广泛选择的余地,而如今什么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了<sup>①</sup>。

谈及刘少奇的悲剧,人们常常着眼于刘少奇个人、家庭及一大批干部的命运,而《刘少奇》一书作者所表达的两点看法,则深入一步:政治上打击了党内健康的和正确的成分,进一步为“左”倾错误的发展开了绿灯;组织制度上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完全凭领袖的个人意志办事,扼杀了全党干部,包括领袖群体的积极性。这样,全

<sup>①</sup> 【美】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1页,华夏出版社1974年版。

党必然要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文革”十年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印证了这一看法并非谬误。

## 二、法定接班人叛逃震惊中外

“文化大革命”中罢黜刘少奇以后,林彪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并且写进了党的“九大”党章:“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事隔两年多,1971年9月13日却发生了一桩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一贯高举”、“最忠诚”、“最坚定”的法定“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却因策划谋害毛泽东败露,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9·13”事件,在国内外引起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国外,一些以“中国通”自居的学者,对这一事件大惑不解,他们撰写的有关书籍,竟然用了“毛主义者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反对毛主义者”的标题。国内,许多被个人崇拜搅昏头脑的人们,在震惊之余开始怀疑:领袖真是神吗?“文革”为什么越“革”事儿越多?毛泽东本人也遭到有生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他面对林彪的叛逃,无可奈何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一个月以后,似乎他的心绪还未能平静下来,曾对一个干部说,也像是自言自语:“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9·13”事件以后,人们从影视和新闻照片上看到的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许多。

在揭发、批判林彪中,党中央于1971年9月18日发布《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年10月14日印发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随后又公布了两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材料。以大量的事实表明林彪一伙确实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



派。然而这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把这段历史说成林彪耍两面派、毛泽东和全党受骗上当的历史,只能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历史已经过了几十年,今天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从接班人角度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应当着重考虑:毛泽东何以如此信任和重视林彪?如何认识林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行为表现?林彪欲加害毛泽东、抢班夺权,教训是什么?

我在本书第一篇中,曾详细记述和分析了毛泽东重视林彪、欣赏林彪、和林彪一步一步走红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如此信任和重视林彪,并不仅仅是受骗上当。主要是林彪所搞的一套,迎合和贯彻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主张。林彪的政治行为,也不能仅仅看做是“演戏”,有些戏不是想“演”就能“出戏”的。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特别是在军队工作的人们都还记得,那时听到林彪的“讲话”和“指示”,往往有所赞词,认为林彪领会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深,贯彻得力,而且有创造性。林彪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也并非一贯两面派,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初,林彪还是敢于向毛泽东直陈看法,甚至提出不同意见的。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以后,林彪出于个人得失考虑,以消极阴暗的心理看待党内斗争,并且积极研究古代官场上的人为人处世之道及纵横捭阖的谋略,“从中学了一套人情世故,专门用来对付人”,认为“这就是懂政治”。他说:“‘立场’又可以叫‘利’场,这个‘利’字可厉害啦!是成败的关键”,“一个人没有真本事不行,但再有本事,不懂这一点,就非垮台不可。”林彪正是在这些利己主义和官场学的指导下,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及个人私欲的不断膨胀,由迎合、吹捧,发展为政治上的两面派,“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林彪由“亲密战友”到欲谋害毛泽东未遂而叛逃,从接班人角度看,提供了什么历史教训呢?记得“9·13”事件以后,人们曾苦费心思地讨论过,如何才能识别“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结果不了了

之。因为仅仅从“骗”与“受骗”角度,并没有抓住林彪问题的实质。林彪的由兴到“衰”,作为一种政治现象,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的问题。至少有两点值得深入一步总结:一是把党和国家的未来完全寄托于某一个人身上,是十分危险的;二是由个人选择接班人的做法不可取,易主观、片面。这些问题,本书下一章还将从理论角度做专门探讨。

### 三、造反司令的“王储”梦

#### 1. 毛泽东称赞王洪文:“系工、农、兵为一身。”

在酝酿召开“十大”的过程中,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困扰毛泽东的大事。在他看来,一大批老干部不行了,连自己最信任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出了问题,究竟谁来接班好呢?此时,康生向毛泽东推荐了王洪文,他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不错,王洪文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人。几天以后,毛泽东向张春桥进一步了解王洪文,问:“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就这样,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调来京,毛泽东在接见这个37岁的年轻人时,详细了解他各方面情况,并像主考官考学生一样问了他许多问题,要王洪文一个一个谈他的见解。毛泽东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为一身”,希望他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下决心亲自培养这个年轻人做接班人。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接见外宾,王洪文总是以“王储”身份陪同。

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文革”中造反起家,1966年12月底,与几个同伙直接组织策划了“康平路武斗事件”,纠集十几万人参加武斗,群众伤残九十多人,王洪文从此成为上海的造反派“司令”,并在党的“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这样一个以“造反”、“武斗”为能事的人,到北京要他静下心来读书学习,觉得十分不自在。面对一大书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头

痛不已。于是,要求回上海。毛泽东听到反映,笑着说:“怎么能回上海呢?”“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1973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与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让王洪文作按惯例只有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才能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果然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于5名副主席中居第二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之前。周恩来治病期间,王洪文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 2. 王洪文说:“货币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发生作用了。”

朝为布衣郎,暮登天子堂。王洪文由基层干部一步登天,成为堂堂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各方面都显得极不适应。“一些消息灵通的中年干部,公开对王洪文明显缺乏常委的能力表示失望”<sup>①</sup>,老干部则认为王洪文“根底极差,品性很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sup>②</sup>甚至连“四人帮”中的姚文元,也在私下里说王洪文:不学无术,懒惰,虚荣心太重,像花花公子,中看不中用。别看水平不行,由于暴发户心理作祟,王洪文权欲、贪欲都在短时间极度膨胀。他对“王储”梦很不满足,恨不能一下子全面接班。一次,他在上海的“小兄弟”中发牢骚:什么要我主持中央工作,还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我有什么权,党、政、军大权都不在我手里!<sup>③</sup> 在生活上,王洪文则成为十足的权贵和败家子。据1976年11月14日《文汇报》载:“去年在上海一百多天,王洪文吃喝玩乐用去二万三千多元(按:当时绝大多数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元—40元)。他动用了十七辆小汽车,要七十多个人服侍。”1976年11

① 《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英国克莱尔·霍林沃斯著)第23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44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③ 摘自《解放日报》1976年11月4日。

月10日《南方日报》载：“王洪文一个人就霸了八部小汽车，去外地给他坐‘三叉戟’飞机还嫌不舒服，要坐‘波音707’。”王洪文得意忘形，甚至以哲人的口气说：“货币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发生作用了。”<sup>①</sup>

更为重要的是，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到北京以后，很快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他本人在反党乱军、妄图建立帮派武装方面，犯下累累罪行。王洪文一方面到军队“点火”，千方百计想搞乱军队，污蔑“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表示对总参“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另一方面王洪文以“城市民兵创始人”自居，妄图控制上海民兵，建立所谓“第二武装”，他多次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个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按江青、张春桥的授意，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抵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和邓小平。他别有用心地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立即察觉到王洪文有宗派气味，告诉他：“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12月23日王洪文再次去长沙，毛泽东明确告诫他，“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对于这个新选的接班人王洪文，毛泽东又一次很失望，感到他确实不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准备进一步重用复出的邓小平。

### 3. “立嗣”的办法失败了。

毛泽东亲自培养王洪文做接班人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新的历史教训呢？想当初有人说：“如果他（王洪文）本人争点气，好好学习的话，说不定也还是可以的。”对王洪文的这一说法的不正确性，早已为历史证明，勿须再论。然而这一说法却引发我们深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7年6月3日：《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人一层考虑问题：为了保持接班人的“纯洁性”和“可靠性”，从青年工人、农民、基层干部中挑选中意者，预立为领袖接班人，直接带班、培养、训练，这种办法是否值得肯定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总还是有借鉴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王朝，为了防范和消除皇位继承上引起祸乱，保证江山永不易主，也曾采用公开预立接班人的制度。老皇帝从诸幼子中选一中意者，立为太子，专门教育和培养，以备日后接班。隋唐两代甚至设立“东宫建制”，即仿照朝廷结构，专为候补皇帝的太子建置一个微型“朝廷”，以便于培养候补皇帝的从政能力，树立他的政治势力。实践的结果，效果并不理想，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四改立嗣。这是因为：其一，人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从小就准确地预测到他的未来。幼时风光者，也可能长大了相形见绌；幼时不显眼者，日后也可能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其二，尽管宣传“皇权神授”，但皇位总还是诸皇子角逐争夺的焦点，太子只在宫廷演习，不能在宦位战场上建功立业，无法在皇族中树立威望以服众人。其三，被预立为太子者，从小地位特殊，极易骄奢淫逸。其四，现任皇帝与候补皇帝之间，时间长了不可避免的发生矛盾，于是出现“分庭抗礼”、“抢班夺权”，或太子被废黜等种种政治现象。虽然历代王朝也都很注意道德教育，但在权力与地位面前，“三纲五常”之类的伦理，其约束力是很有限的，后来的王朝不得不改变这种公开预立接班人的做法，清代雍正皇帝另行秘密建立皇储制度，即皇帝生前不宣布接班人是谁，其意图以文字形式藏于密处，死后公布遗诏。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无产阶级的政权则为全国人民所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封建王朝在解决接班人具体形式上的成败得失，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总还是一面值得借鉴的镜子。1975年，邓小平曾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说：“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干部要顺着台

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业务、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sup>①</sup>我想,这也正是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期间,亲自提拔、培养接班人王洪文失败教训的一个历史总结。

#### 四、华国锋“抓纲治国”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一度启用邓小平,很快又否定了邓小平。这是因为毛泽东感到,邓小平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并不热心,且多有否定之举。而“四人帮”一伙,则更使毛泽东感到失望和生气,他们野心勃勃,搞宗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晚年将至,“文革”搞了十年不仅没有眉目反而越来越事越多,再加上虽然三换接班人,却没有一个满意放心,有的还抢班夺权,欲谋害自己。这些使英明一世的毛泽东,到晚年深深地陷入忧心忡忡、矛盾困惑之中。下面一段话,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心境: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总是想后事。中国有句成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们赶到那个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后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毛泽东正是在忧心忡忡中最后选择华国锋,做为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1921年生,1938年入伍,做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1972年调北京,任公安部长,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2月3日,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一方面解除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另一方面提出,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设党的第一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让华国锋接他的班。华国锋和王洪文不同,是“三八”式老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也得到升迁,却是由省委书记到公安部长到副总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本人忠厚老实,作风正派,对党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很听话,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毛泽东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厚重少文”,“办事不蠢”。并且为华国锋亲笔写了三条指示“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是对“四人帮”的限制和否定,对日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也是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维护文化大革命”。事实表明,华国锋确实是积极的扮演了这样一个历史角色。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

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政治上坚持“抓纲治国”,即坚持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路线;组织上排斥一大批老干部,长时间依靠一个小班底发号施令;思想上违背实事求是精神,坚持认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是处处按“两个凡是”行事。连华国锋本人的行为举止,也处处效法毛泽东,如身穿和毛泽东一样的灰色中山装,头上留起和毛泽东一样的背头。在公众场合,走路、手势和神态都亦步亦趋仿照毛泽东。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晚年陷入历史悲剧以后,还想效法毛泽东重复演下去,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严肃神圣,客观效果只能是更加令人尴尬的历史悲剧。更何况华国锋根本不具备毛泽东的才气、智慧和能力,却要扮演第二个毛泽东,怎能不“东施笑颦”呢?

华国锋的悲剧命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由于“文化大革命”严重违背了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志,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个人权威形式赋予华国锋以新的个人权威形象,这本身就是很不牢靠的了。正如一位老革命家所说:“如果让华国锋还用老办法统治下去,我们国家就要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没有毛主席那本事,我看毛泽东那一套只有毛泽东自己能用,换了任何人都要垮台。”还有一位老革命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毛主席只能有一个,如果还有第二个,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演员。”

(2)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为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越来越严重,对生产力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而华国锋本人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处处维护“文化大革命”,并且要继续按“文化大革命”的路子走下去,如上台伊始即提出“抓纲治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提出“继续批邓”,阻挠解放和使用一大批老干部,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甚至有些“文革”中的受迫害者,“四人帮”没有来得及杀害,而是在华国锋当政以后遭到杀害。华国锋



的所作所为,严重地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向与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位置。

(3)十年“文革”造成的烂摊子,问题成堆,百废待兴。现实中提出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如怎样结束旧的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怎样清理“文革”后果,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如何把“文革”中造成严重分裂的群众团结起来,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面对如此繁多的复杂而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从华国锋本人的精神状态,还是个人能力、经验、威望看,都难于承担如此重责,再加上他只依靠少数人,脱离了多数人,怎能不举步维艰、孤掌难鸣呢?

## 五、一个被打倒的人却是最好的继承者

美国一位著名作家得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认为是“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成了中国的领袖”。称“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古籍也找不出第二件”,感叹“高层政治绝无规范板眼可循”,赞扬邓小平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纷纷研究邓小平“三落三起”、“三下三上”的历史,力求寻找邓小平力量之所在。我以为邓小平的“落起”、“下上”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不只是邓个人力量的表现。在令人惊讶的“离奇变幻”背后,所蕴藏着的领袖更替与继承方面的某些规律,更值得我们着力研究。为什么一个被毛泽东打倒的人,却成为毛泽东事业最好的继承者呢?

### 1. 毛泽东重用邓小平,又嫌他“不听话”。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非常重用邓小平。1951年9月,毛泽东当着民主人士梁漱溟的面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第二年即调邓来中央,任政务院副总理,1955年4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七届七中全会

上,毛泽东推荐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说邓小平比较顾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邓小平于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7年11月,毛泽东进一步在国际场合为接班人问题造舆论,他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很有发展前途”。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讲:“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sup>①</sup>明显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

进入60年代,随着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毛泽东的分歧与矛盾不断发生。如1962年5月一次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发言要求有条件地支持“包产到户”、“责任田”的做法,引起争论,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邓小平发言:“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同年7月,邓小平在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上又一次讲:“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发言很不满意,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十几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地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某些“左”倾错误观点采取沉默或回避的态度,再一次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说:“邓小平耳聋,他总是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敬而远之,不听我的话。”后来,又在一次会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1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

央书记处,另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对此,后来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两次打倒邓小平,一次启用邓小平,都和毛泽东既认识到邓小平“人才难得”,又嫌他“不听话”有关。可以说毛泽东启用邓小平中有疑虑,打倒邓小平时又难舍难割。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邓小平即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当时,江青为邓小平罗列的四大“罪状”是:对毛泽东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派工作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然而毛泽东对邓小平则留有余地,他认为邓虽犯了严重错误,应和刘少奇加以区别。在林彪、江青一伙叫喊要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表示反对。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1972年8月,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法定接班人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曾一度选中王洪文接班。

经过一段观察,感到王洪文根本不行。此时,又把眼光落到邓小平身上,于是邓小平有了第二次复出的转机。1973年2月邓小平返京,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2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说:“现在请了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们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此后,毛泽东多次讲到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1975年1月,由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

然而刚刚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又很快第三次被打倒了。这是因为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后,并没有考虑个人得失,而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倾向。正如邓小平后来自己所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sup>①</sup>

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是起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泽东。邓小平复出以后,并没有把感情停留在对毛泽东个人感恩戴德上,也没有因为受难而增加个人得失考虑,而是从无产阶级党性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做敢为。他讨厌“有些人听风就是雨”,常常说“我这个人像维吾尔的姑娘,辫子多”,不怕别人抓辫子,不怕再一次被打倒,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毛泽东讲“文革”中全国形势大好,到处一片莺歌燕舞,邓小平却实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事求是地说出，“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毛泽东讲“革命委员会好”，邓小平却能从实际出发，指出许多班子存在“软、懒、散”的问题；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下，许多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1975年3月5日在全国各省市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态度坚决地表示，“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一次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说不翻案，靠不住呀！”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4月，发生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一伙欲置邓小平于死地，毛泽东并没有听信“四人帮”一伙的恶语，而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 2. 伟人意志与历史需求的较量。

毛泽东晚年以无尚的权威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一次把邓小平打下去，确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全党新的领袖。并亲自写了三条指示作为华国锋执政的锦囊妙计和上方宝剑：“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然而华国锋没有能立得住，还是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最好的接班人。历史学家们在探索这一段历史时，或许可以从中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奥秘，并得出多种不同的结论。我认为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结论应该是：在这样一场历史的伟人意志与历史的需求的较量中，历史的需求胜利了，历史胜利了。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就其内容说，是赋予华国锋一个历史任务，维护和发展毛泽东正在从事的“文化大革命”事业，

即：“照过去方针办。”就其具体交接班看，毛泽东此时对大多数干部缺乏信任了，只有华国锋办事“我放心”，所以采取了个人接个人班的形式。这样，华国锋在接受毛泽东个人重托和巨大信任的同时，也继承和接受了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命运。正如美国学者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所说：“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遗产既是华国锋的政治合法性的惟一依据，也是导致他不幸的政治命运的媒介。他既不能放弃这份遗产来巩固政治权力，也不能依赖这份遗产来使自己在政治上生存下去。”

邓小平与华国锋不同，他虽然没有历史伟人的任命状，甚至为伟人意志所否定，但他的行为却符合历史的需要和要求，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心声，使他成为 20 世纪打不倒的“安泰”。

1974 年复出至 1976 年再一次被打倒，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在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请看如下大事记：

——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实现“四个现代化”。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 月间，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他提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随后，各条战线、各地区，开始了整顿工作。

——6 月，指出：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进一步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7 月，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报告》说：“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

——8月，领导制定《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简称“工业二十条”。提出：“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

——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

——9月，邓小平肯定了胡耀邦领导制定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的提法：“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10月，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提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有很深的感受，在那个年代，听到邓小平的这些话，看到混乱局面在几个月内初步变为井井有条，内心是何等喜悦，何等的激动啊。后来，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拥护，许多人迫不得已，会上照本宣科“批邓”，会下则对邓仍然大加赞扬。香港记者陆鉴在《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有如下记载：“1976年，人们在大街上看批邓的大字报，毫不隐讳自己的真实感情：‘哼！要是这次不批邓，还不知道邓小平是好人哩！’”人们看了电影《甲午风云》，纷纷称邓小平为“邓大人”。笔者记得天安门事件以后，曾听人讲，“四人帮”在北京某大街上贴了一条大标语，“邓小平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一夜之内“人”字被改为“猪”字，于是整个标语成为“邓小平上台千百万猪头落地”。人民正是以这样机智而又巧妙的方式，表达了内心的企盼：邓小平如果上台，千家万户将要杀猪宰羊以示庆贺。

邓小平能够如此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对待“文革”问题，固然

和他的思想水平、政治责任心、个人性格有着直接关系,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本人及家属在“文革”初期遭受迫害、饱尝苦难,又由于他在受难中与社会底层有着较深的接触,了解群众的脉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写《在江西的日子里》记述了这一情况,“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文革’的狂流冲得飘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也都已下乡接受‘改造’”,“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心酸,使人激奋,也从思考中得到力量”。

我在本书定稿时,又看到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其中讲到邓小平想给残疾的邓朴方找点事情做,问一个老工人有没有坏了的收音机可以让朴方修理。老工人坦率地告诉邓:“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听到此话,父亲不再言语,不是因为没有帮助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所感到的,是痛心。”

这样,邓小平不仅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成为广大人民愿望的表达者、代言人。以至他虽然被打倒了,却反而更加得到人民的同情,更加受到人民的拥戴和支持。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很自然地成为纠正“文革”错误,拨乱反正,实现美好理想的众望所归的人物。有位外国人曾问中国官员,你们为什么如此尊重邓小平这位上上下下那么多次的人?那位官员回答:“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原因!”<sup>①</sup>

谈到邓小平的东山再起,我们也不能把他和毛泽东完全对立起来。毛泽东晚年虽然两次打倒过邓小平,并且最终否定了这个

---

<sup>①</sup> 参见索尔兹伯里:《天下风云一报人》,见袁南生编著:《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71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7月版。



接班人,然而毛泽东在更长的时间里,曾十分赏识邓小平,重用邓小平,这也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事业的真正的继承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此,有一位外国学者的分析,我以为是十分客观的。他说:“有多种原因使邓小平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得到保证。关键的因素是:他拥有‘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领导核心圈子中主要幸存者这一身份。作为经历奇特的人物,使他既被毛泽东两次清洗,又得益于他曾经是这位主席晚年的‘亲密战友’之一。最热情支持邓小平的,是那些同样挨过毛泽东整的人;而更根本的支持则来自那些认定邓小平是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长期合作者的更加众多的人。”<sup>①</sup>

### 3. 否定与继承的辩证法。

为什么被毛泽东否定的邓小平,却成为毛泽东事业的最好的继承者呢?要搞懂这个问题,首先得回顾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发生的,关于“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争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久,华国锋即提出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我们永远不能改变;凡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们永远都要照办。第二年2月,以文字的形式公布于众:“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正是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提出“抓纲治国”,继续批判“党内走资派”,批判“唯生产力论”,颂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并表示今后还要多次搞“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愿意解放一大批老干部,阻挠邓小平复出,拖延平反冤、假、错案,甚至还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历史已经表明,毛泽东“放心”的接班人,所要维护的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旗帜,恰恰是毛泽东晚年

<sup>①</sup> 【美】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转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161页,湖南出版社1994年7月版。

的错误意志；坚持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事业，而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毛泽东打倒邓小平，就是因为他“不听话”，没有按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意志办事。后来，邓小平在和“两个凡是”争论中，又把他的这一态度系统地表述为一种理论认识：

(1)“‘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sup>①</sup>

(2)“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sup>②</sup>而不是个别词句，更不是“两个凡是”。

(3)世界总是在发展的，总要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sup>③</sup>？“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④</sup>

(4)“‘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sup>⑤</sup>，“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sup>⑥</sup>。

(5)反对随风倒，“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② 同上书，第38页，第39页。

③ 同上书，第128页。

④ 同上书，第143页。

⑤ 同上书，第190页。

⑥ 同上书，第114页。

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sup>①</sup>。

读过邓小平的上述言论,我们就会进一步懂得,为什么在毛泽东重用邓小平时,他能够坚持原则,不随声附和,不看风使舵,而是敢于坚持己见,甘冒被打倒的风险;在毛泽东把他打倒时,邓小平又能够不为毛泽东的一时一地的言行所左右,而能坚定不移地坚持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进一步发展为邓小平理论。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本人,成了毛泽东领导的事业最好的继承者,这就是否定与继承的辩证法。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 第二章 深邃的思考与遗憾的结论

### 一、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

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人的思想;惧的是这场戏有朝一日会在中国重演。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表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1958年年初,毛泽东明确提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不正确的”,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这样,在毛泽东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出了赫鲁晓夫。”

此后,毛泽东多次反复讲过中国如何防止出赫鲁晓夫问题。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又出了赫鲁晓夫。1963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和金日成谈话中提到: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那么再过10年、20年也会出赫鲁晓夫。1964年2月,金日成再次来华,毛泽东同他谈话中说:彭德怀是赫鲁晓夫的人……如果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所以要提高警惕。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提出: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

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他要求大家:“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1966年,中央发出“5·16”通知不久,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时忧心忡忡地谈及:“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64年6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并没有把

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判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一文，又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如下观点：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选拔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二、毛泽东接班人思想评析

1. 毛泽东以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观察,提出共产党执政以后存在着蜕化变质的危险性,这一看法对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然而他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时,却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并且采取打倒“赫鲁晓夫”的办法,结果适得其反。

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必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进一步指出,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就是要“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恩格斯、列宁仅仅是告诫人们,无产阶级执政以后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有了若干年的执政党的实践经验以后,以他的观察和思考,从更深层次上提出这一问题。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曾谈到共产党执政以后,要以李自成进京迅速腐败的教训为诫,他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1951年12月2日,毛泽东根据“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震惊全国的重大贪污腐败案件,指出:再不注意抓这一工作,“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他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sup>①</sup> 1954年2月10日,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陈云从执政党的高度提出腐化问题,他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sup>②</sup>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根据他对苏联和我们党的观察,提出共产党执政以后,存在着“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危险性。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sup>③</sup> 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阐述:“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也不一定啰)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② 《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进入60年代,由于“左”倾思想的发展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的独断专行作风日益严重,毛泽东对形势的观察与分析严重偏离实际,他把“可能性”、“危险性”看成了现实性。认为党内已经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从地方到中央“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有1/3的政权已经变质。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采取夺权的形式,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统统打倒。历史已经证明,这一估计和做法是完全错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场大灾难。然而,我们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的同时,不应该把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在执政以后存在着蜕变危险性的看法,也一起否定掉。

执政,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苦难与战争是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考验。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军进城以后,由于经受不住权力与物质享受的诱惑而溃败。中国共产党与农民起义军不同,它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完全可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然而,权力与物质享受所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执政者拥有很大的权力,处于发号施令地位,容易滋长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执政者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容易骄傲自满,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滋生特权思想;执政者有比一般人特殊的优越生活条件,容易滋生贪图享受,停步不前,某些人为满足更大的欲壑,甚至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们党大力地反复地抓反腐倡廉,惩治违纪犯法者,这方面的问题尚且不断发生,并有发展蔓延之势,如果失去警惕,不管不抓,将会是什么情景呢?

2. 毛泽东以宏大的历史眼光,提出注意培养一代青年成为接班人,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这一看法对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可是他在如何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的想法和做法,如强调在阶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忽视文化知识学习,甚至一度关闭大学,则失之偏颇。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多少代人为之奋斗才能实现的,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关系到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为了防止出现八旗子弟、贵族阶层,毛泽东很注意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1952年6月14日,他在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再一次表示:“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斯诺提出:“许多人极想知道,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将会怎么样。你的看法怎么样?”毛泽东在回答这一问题中,表达了他对青年问题的更深一层的宏观思考。他说,他也没法晓得,他不相信谁能够肯定地晓得。有两种可能性。可能革命朝着共产主义继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性是青年会取消革命,干坏事。自然,他并不希望反革命,但是将来的事件会由后代人解决,并且按照我们没有预见的办法来解决。从长远观点看问题,后代人应当比我们更加有知识。

毛泽东提出的在和平环境中,在生活比较富裕的条件下,如何教育青年一代的问题,不仅是当前,也是今后长期需要认真对待,并且着力研究解决的重要战略任务。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所提出的办法,碍于历史的局限,失之偏颇。主要问题是:

(1)毛泽东一方面提出接班人“要搞马列主义”,“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要讲民主”,“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等五条标准。另一方面在具体解释这五条标准时,

又把他集中为一条,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当时连修正主义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又如何能够通过反对修正主义达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呢?强调路线斗争,通过“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路线斗争,就能够实现“团结大多数人”的目的吗?突出阶级斗争,忽视生产建设,就能够“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吗?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深深地陷入自我矛盾之中。

(2)毛泽东提倡青年人要经风雨见世面,在艰苦生活中磨炼,向工农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对在和平环境和比较富裕的条件下生长的青年一代,具有很大的针对性。然而过分强调实际生活锻炼,鼓吹“阶级斗争是青年学生的一门主课”,认为“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主张停办大学文科,则是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偏见。

3.毛泽东以超凡脱俗的豁达态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即考虑自己退居二线,着手解决领袖的更替问题,并为培养接班人采取了若干积极的措施,这对后来最终完成两代领袖的更替及干部制度的改革,起了历史的铺垫作用。然而他所采取的以个人向个人交接班的形式,则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感到自己的身体、年龄、精力都逐渐差了,应当逐渐让比较年轻的同志演“主角”,自己要逐渐降为“配角”。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还讲过,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人生自古皆有死,想开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正因为这样,必须准备接班人。看到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政坛引起的震荡,他及时总结教训,提出为了国家的安全,中央要划分一线和二线,多设几道“防风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9月,中央扩大了政治局,增设副主席名额,建立新的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后来,毛泽东又主动让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并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进一步接班,在国内外多次造舆论。

毋庸讳言,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做法,也经历了曲折和反复。

他曾讲过：“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民主人士张治中先生建议他少过问具体事，毛表示：“我不放心。”<sup>①</sup>有人把这归于毛泽东强烈的“权力欲”，我以为这一看法失之片面。作为当权者，有权力欲是自然的，而毛泽东在认识和态度上的反复，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适应新的庞大而复杂的领导工作，产生的某些新的领导体制，认识上滞后和不适应。我很赞成一位外国学者的如下分析：“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式使毛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之感。”<sup>②</sup>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采取了个人向个人交接班的做法，在实践中屡经挫折，最终证明是不成功的。这是因为：

(1)他在观察和分析苏联演变的历史时，过分看重了领袖个人的决定作用，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出了赫鲁晓夫”。把一个事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命运与希望，完全寄托于一个领袖身上，这就使得毛泽东在具体选择接班人时，为自己出了一个永远回答不了的历史难题：谁能担当如此大任呢？现实中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救世主，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必然要陷入惶惑与困境中。

(2)以个人意志选择一个政党的领袖，不仅违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连起码的民主精神也没有了，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

(3)个人的观察和认识，局限性比较大，也容易产生主观性和片面性，甚至随意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抛弃，对王洪文的错误选择，以及对邓小平的忽而委以重任，忽而打倒，都是例证。

<sup>①</sup> 《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32—13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版。

<sup>②</sup> 【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23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然而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深刻见解和所采取的若干措施,以及毛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豁达态度,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还是有着积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所培养和重用过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在毛泽东因接班人问题陷入错误和困境时,挺身而出,最终顺利地完成了两代领袖的更替与交接。邓小平、叶剑英等第二代领袖人物,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本人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深邃思想和豁达态度,而且进一步吸取和总结毛泽东的历史教训,着手进行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的改革。

### 三、两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

#### 1. 苏联的演变是因为“出了赫鲁晓夫”吗？

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注意识别和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他认为,苏联由于赫鲁晓夫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为此,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虽然被“彻底否定”了,然而对苏联的演变是因为“出了赫鲁晓夫”这一说法,却未见有专门的研究。笔者拟就此谈些意见,抛砖引玉。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是重新认识“出了赫鲁晓夫”说法正确与否的关键。起初,我们党曾赞扬“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

障碍物的一个伟大、勇敢的斗争”<sup>①</sup>。随着中苏两党争论的展开，我们党逐渐改变了看法。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特别是今天在俄国大地上，苏维埃制度确实垮台了，苏维埃国家也确实瓦解了，能否由此说明当年毛泽东和我们党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呢？我认为不能。这里需要的是，对历史事件及后来的历史演变做具体的分析。笼统的肯定，会引导人们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是否当年赫鲁晓夫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今天的苏联就一定会是个朝气蓬勃、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尽管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为世人不齿，但是作为政治家的赫鲁晓夫，走红于斯大林去世以后的苏联政治舞台，其主要原因不是他会耍两面派，善于欺骗，而是历史的需要。一位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长期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回忆说：“愈来愈贫穷的、实质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落后的工业，住房的严重短缺，人民低下的生活水平，千百万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国家和外部世界隔绝——一切都要求新的政策，要求彻底的转变。这时赫鲁晓夫来了——正是这样！”<sup>②</sup>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但他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当政时的个人崇拜，并着手进行某些社会的改革，应当得到历史的肯定。“赫鲁晓夫在着手清理斯大林迷信时代的积淤，整顿各部委，遣散冗员庸吏，把农民从斯大林集体农庄

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②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著：《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第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

的劳役和野蛮的贡税中解放出来。农村居民第一次拿到了护照和有保障的劳动工资。人民则以德报德：他们一鼓作气，使以百万公顷计的处女地和弃耕地得到开垦、播种，获得了盎然生机。”<sup>①</sup>但是，赫鲁晓夫并不是一个好的改革家，而是一个“鲁莽的庄稼汉”。他虽然在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党的建设上提出过一些大胆的设计，做过一些重大调整，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再加上考虑不周，急于求成，瞎指挥，给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带来重大损失，党内外积怨甚多，不得不于1964年10月14日被迫下台。

这里，我们不是企图解决对赫鲁晓夫及其改革的全面评价问题，而是想说明，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笼统地称之为“反对苏维埃制度”，是“叛徒”；把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改革，笼统地视为“走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以至把赫鲁晓夫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典型代表，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认识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观性。

即使几十年以后苏联真的演变成资本主义（或称什么主义）了，苏维埃制度真的垮台了，也不能笼统地看做“赫鲁晓夫一类走资派”“走”的结果，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应当对这段历史做具体的分析。50年代至60年代长期在苏联工作的老外交家柴成文，曾就苏联悲剧的深层原因谈了如下看法：

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它建国初期逐步形成的。由于它长期处于战争、外界的孤立封锁和战后东西方对抗的环境，更主要是由于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以为模式先进，不思进取，不仅自己不改革还把别人的改革视为异端。而越推迟改革，积累的弊端就越多，改革起来难度就越大。

---

<sup>①</sup> 《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译》，第164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7月版。

苏联领导人从赫鲁晓夫起都曾提出过一些改革的设想，但均因不切实际而无所作为或半途而废。

苏联所以形成各种弊端的根源是政治、经济体制的过分集中。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的根本优越性是人民当家做主。但长期的过分集中却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了法制建设，也使人民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反而实际上形成了官僚主义、个人专断、家长制、领导制度终身制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现象和腐败作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除了在位短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外，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的。当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时，那么人民当家做主便成了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最根本的优越性，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废除了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长期的高度集中，一切照指令性计划办事，而又强调计划就是法律，这就不可避免地压抑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使经济生活僵化<sup>①</sup>。

50年代以来一直在苏共中央工作的奥尼科夫，从党的建设角度探讨了苏共为何轻易被赶出历史舞台。他认为应归咎于斯大林以来的建党模式：

①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党的主人应是全体党员，而斯大林却把政治局和党的中央机关看做是党的主人。②列宁在世时党的生活是完全公开的，而斯大林却以“绝密”作为其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③斯大林把党的中央机关变成其模式的

---

① 《苏联 1985—1991 年的演变》，第 207—208 页，新华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最重要的堡垒”<sup>①</sup>。

奥尼科夫认为,长期缺乏党内民主生活,扼杀了党的干部和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使他们习惯于事事等待上级指示,接不到指示就无所适从。这样,一遇风浪或个别领导人出问题,全党就会不知所措,其生命力显得十分脆弱。

还有一些苏联学者,从长期缺乏民主生活及个人崇拜对广大群众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探讨了在领导人出现错误和外来影响的冲击下,苏联社会顷刻解体的思想原因:

群众运动的经验证明,信仰理想,跟着永不犯错误的、英明的、全能的领袖走,比认识这种理想的科学内容和动脑筋思考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的性质要容易得多。信仰社会主义与信仰斯大林被当做一回事,并且后者代替了前者。

对神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盲目的信仰,使得思想软弱无力,使思想成为信仰的奴仆,使人失去了健康地、批判地判断信仰对象的可能性<sup>②</sup>。

苏联演变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教训,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及赫鲁晓夫一类的领导人,而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病没有得到及时的克服和实行正确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机构上处于僵化状态,整个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缺乏应有的活力。这样,遇到风浪和冲击,自然会弱不禁风。个别领导人不好或出问题,在什么时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重要的问题在于,

① 《苏联 1985—1991 年的演变》,第 150—151 页,新华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② 《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译》,第 108—109 页,求实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

靠谁来识别和纠正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怎样才能识别和纠正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不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全党的综合建设，识别和揪出“赫鲁晓夫”只能是一句空话，或者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越搞越乱，越搞越糟，越搞越危险。

## 2. 以“你办事，我放心”选人，违反辩证法。

以“照过去方针办”为标准，选择“你办事，我放心”的人做为接班人，是一种守业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一种创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凡缔造国家者，创造家业者，没有一个是“照过去方针办”的。而他们要求自己的子女、下一代或接班人，往往又都是“照过去方针办”。看许多皇帝的遗诏，无数家长的家训，通篇都是“诫”和“范”。“诫”，即“不许”，不许干这，不许干那；“范”，即规范，范围，只许干什么，只许怎么干。如明太祖朱元璋曾制定有名的《皇明祖训》，把一切皇帝、藩王和臣下所应遵守的，不应该做的事，都详细列举。并规定后代有人要更改祖训的，以奸臣论罪，杀无赦<sup>①</sup>。《皇明祖训》包含了朱元璋一生从政治国的经验，值得后代好好学习和借鉴。然而把这些经验当成百代不变的法规，则不仅大大限制了后代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对历史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所说：“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sup>②</sup>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创业者，辩证法大师。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对待世界，对待历史，对待人生，发表过许多十分达观而精彩的看法。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由战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毛泽东认识上受到了一些局限，他熟悉阶级

① 参见明史太祖本纪。

② 吴晗：《朱元璋传》，第30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

斗争,熟悉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生产的经济形式,不大懂现代化大工业,不大懂商品经济,虽然也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是在实践中连连受挫,如大跃进的失败,三年困难,发动“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大阻力,几次频繁换接班人……再加上一步一步进入老年,年龄、身体、精力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很难再和青年人一样去展宏图,施抱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生、老、病、死的问题。上述主客观原因,对晚年毛泽东不能不带来深刻的影响,使他的认识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他总是过多地忧虑身后会不会出赫鲁晓夫,自己开创的事业能不能垮掉,有时甚至无奈地感叹: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知道。“按过去方针办”正是这种认识和心境的表现,即考虑如何守业多,至于怎样进一步创业,则不是他这样一位步入暮年、重病缠身的老人所应该考虑的了。

以“放心”或“不放心”来选择接班人,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发现和成长,容易鼓励墨守成规,或为阿谀奉承者钻空子。革命事业总是要不断发展前进的,发展不仅需要对前一代人的继承,也需要对前一代人的部分否定。没有继承,无从发展。没有否定,无法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后一代的有为者,永远不会是前一代最中意、最放心的人;前一代最中意、最放心者,又往往是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谦谦君子,或者善于迎合“紧跟”的别有用心之徒。毛泽东本人在选择接班人方面的实践,就是很好的说明。

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放心”中意的接班人,华国锋接班伊始即打出“两个凡是”的旗号,一切“按原有方针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继续维护个人崇拜。坚持“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按原有方针办”实际上是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历史证明,华国锋并不是毛泽东事业好的继承者,他的言行反而一度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邓小平和华国锋不同,虽然毛泽东对他

不放心,甚至担心,但他却是毛泽东事业的真正继承者。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懂得辩证法,他认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至于“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也曾被毛泽东视为中意者,并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其历史教训更是令人铭心难忘。

## 第三章 他山之石

### 一、封建社会搞“传宗接代”， 却挡不住“改朝换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1. “太子，天下根本”。

封建社会的国家为一姓一氏所私有，即“家天下”。皇帝是最高的家长，也是国家惟一的主人。皇帝虽为天子，总也有个生老病死，秦始皇很想吃点长生不老药，永远当皇帝，只能是一种妄想。于是“立嗣”，即继承和接班人问题，成为保证江山永不改姓的最重大的事情，古人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sup>①</sup>又云：“太子，天下根本，本一动摇，天下震动。”<sup>②</sup>

历代开创时期的皇帝都十分重视接班人的培养和教育。唐太宗李世民曾创“贞观盛世”，40岁以后着重考虑如何守业的问题。他专门组织群臣讨论“创业难，还是守业难”，并且总结说：“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后来李世民又发展了这一认识，他告诫群臣：“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大臣魏徵认为皇帝有“战胜易，守胜难”的思想认识，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唐太宗晚年，撰写《帝范》十二篇，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

---

① 《后汉书·李固传》。

② 《汉书·叔孙通传》。

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内容,赐给太子李治,亲自传授修身治国之道。反复嘱咐李治:“汝无我之攻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sup>①</sup> 唐太宗不仅重视培养一个太子,而且采取措施,“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sup>②</sup>,以利于李氏王朝的长久统治。

明太祖朱元璋从执政经验中也领悟到:“从古开基创业的君主,经历艰难,通达人情,明白世故,办事自然妥当。守成的君主,生长于富贵,锦衣肉食,如非平时学习练达,办事怎能不出毛病?”因此,他很注意子女教育。为了孩子们将来能治理国家,学习中首先要求“正心”,心一正万事都办得了,也就是后人说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意思。其次要求:“实学”,用不着像一般文士那样,光是记诵辞章,没什么用,要学“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穡之事”。此外,朱元璋还亲自带班,要接班人每天跟着他一起上朝,和群臣见面,恭听朱元璋处理各种政事,看朱元璋批阅各部门的请示报告,学习从政本领,增长政治经验。晚年,为了儿子能顺利接班,放心当家,甚至一批一批杀老臣,以去掉障碍。这些做法,连他的儿子也看不过去了,劝说朱元璋:“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故意找一条棘杖叫儿子拿,儿子面有难色。朱乘势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内部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

① 《资治通鉴》第198卷,唐贞观二十二年。

② 《中国通史》第3册,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版。

## 2. 在刀光血迹中演变的接班形式。

为了巩固一姓江山,延续帝业,封建皇帝们还在接班形式上做过许多摸索。通常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即皇帝大老婆的长子作为皇帝的法定接班人。如果大老婆没儿子,则“无嫡立长”,其他老婆生的儿子,哪个大立哪个为太子。所贯彻的两条原则是:“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在实行中,皇位继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舍嫡立庶”、“舍长立幼”的事情屡屡发生,唐太宗李世民曾四改立嗣,整个唐代20位君主,按常规制度继承的只有德、顺二宗,废太子者有6位,追谥太子者有11位。夏、辽、金、元各代皇帝都为少数民族,在皇位继承上又出现多种形式,如“兄终弟及”、“祖以传孙”、“父子相继”等。元代还曾采取老皇帝去世以后,召开贵族宗亲大会推举新皇帝的办法。明代神宗皇帝,皇后无子,妃生长子皇帝不喜欢,就另立一爱妃之子为接班人。到了清代,入关前曾实行“汗由诸贝勒推举产生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努尔哈赤曾就接班人问题有过一个讲话,表达了以下四点精神:①老国君生前不指定接班人,死后由满族亲贵会议推举;②接班人要以是否有德和能否纳谏为标准;③已确定的接班人如不胜任或有重大过失,可换人另立;④被换掉的人如不服从,可以采取强制手段<sup>①</sup>。清朝入关以后进一步确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原则。

在争夺继位权中,各皇子、王亲间曾发生过数不清的混乱、争斗和杀戮。为了防止这些问题,顺利进行皇权交接,历代统治者也曾制定预立太子制度。隋唐两代还实行过“东宫建制”,即仿照朝廷的机构,专门为皇太子建置一个微型“朝廷”,以便于培养从政能力,树立皇太子的政治势力。这种做法也带来一些新的麻烦,被确立为接班人的皇子,从小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

<sup>①</sup> 原文见《满文老档·太祖》第38卷。转载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第364页。

之上。容易骄横跋扈,为所欲为。有的长大成人,羽翼丰满,权势猛增,形成“第二中央”,和老皇帝频频发生矛盾,甚至兄弟、父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如清康熙皇帝共有子 24 人(另有 11 人夭折),多数长大后精明能干。而他的第二个儿子允礽,刚满周岁就被立为皇太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可一世。专擅威权,纤聚党徒,逞凶作恶,暴虐淫乱,侵犯和威胁老皇帝的权力,有抢班夺权之嫌。康熙终于在允礽 34 岁时,把他废掉。当着文武百臣的面,痛哭流涕地说:“让朕未卜今日被毒死,明日遇害,昼夜坐卧不安。似此之人,怎么能够继承祖宗的弘业!”还有更惊心动魄的事例,如唐王朝的开创者李渊,生有四子,确立长子李建成为接班人,从而引发了一场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李建成为自己能顺利接班,多次设计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则先发制人,发动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老皇帝李渊让位,自己当了皇帝。

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废止了公开预立太子办法,开创秘密建立皇储的新制度。他这样做,一方面是总结历史上的教训,一方面也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雍正的父亲康熙皇帝曾两废太子,其他几个儿子为谋求皇储位子,明争暗斗十几年。最后由善于韬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的胤禛继位,即雍正皇帝。继位后,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将几个兄弟或囚禁,或害死。雍正当了皇帝也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他说:“现在皇考将社稷托付于朕,怎能懈怠不为长计?当日父皇因二阿哥(允礽)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殫述;今朕诸子还在幼年,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怎么能够举行?但是,既然皇父将大事托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雍正在这种矛盾为难的情况下,创立了秘密立储的办法。由皇帝在皇子中挑一个认为德才兼备的人,不论嫡庶长幼,立为皇储并将其名字御书两份,加以密封。一份放到乾清宫内至高处“正大光明”



匾后,一份藏于宫内机密处(一说皇帝自带身边)。待皇帝死后,打开诏书,公布指定皇储继位。这个办法,既预定了接班人,又使人们不知道是谁。有利于激发诸皇子努力上进,也缓解了皇太子与皇帝、皇子与皇子之间的争斗,以及由此产生的日趋严重的宫廷内部、朝臣间的拉帮立派、结党营私,成为封建社会一种比较好的立储制度。

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解决皇位继承和接班人问题上,创造和总结了许多好的经验。如关于创业难、守业更难的思想;重视子女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都优越条件下的子女教育问题;掌权者注意及早选择和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以利于较好地解决两代人在事业上的更替;逐渐形成一套具体的交接制度,尽量减少更替、交接过程中引起的混乱与动荡,等等。这些经验,对巩固和延续封建王朝的统治,甚至创造某些时期的振兴,都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 3. “传宗接代”为何挡不住“改朝换代”?

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和接班人的思想及制度,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不能不带着严重的历史缺陷:

(1)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把选择什么样的接班人当皇帝,看成王朝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这一看法,就具体人、具体事而言是正确的,能干的人可以把事情干好,无能的人会把事情搞糟,这就是通常说的“事在人为”。然而从总体战略角度考虑一个国家、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则不是哪一个领导人或一批领导人,是否能干所决定的。古代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在谈论历朝兴亡史时,常常引用“时运”、“法度”、“纪纲”和“人”等概念。如唐人李百药曾写《封建论》上书唐太宗李世民:“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帝位的长短,必定在于天时,政务兴盛或者衰败,与人事有关)唐代诗人罗隐有诗句:“时来天地皆

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后唐李专美云:“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资治通鉴》)他们对国之兴亡,从三个层次上做了分析。第一,“时运”,所做的事业是应运而生,还是违时而作,即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根本原因。第二,“法度”与“纲纪”,即是否有好的制度和路线。第三,人的作用不能违背天时,而制度与路线贯彻得好不好,则关键在于人。离开“时运”与“法度”、“纪纲”,孤立地谈“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显然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2)其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永保江山不易主。历代王朝都很强调“守业”,祖宗留下的宗旨、规矩,一字不能更改。即使是比较开明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坦率地和儿子说:我的个人行为有些并不值得你学习。但他所制定的规矩,则必须“传诸子孙,永为后法”。老皇帝所喜欢的接班人多为“正统”、保守型,而改革型、创业型的后人,不仅不受欢迎,反而被认为大逆不道。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历代皇帝属保守型多,创业型、改革型则凤毛麟角。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和孙子汉景帝刘启,应当算比较能干的人物。他们为了巩固统治,在汉初经济衰微的情况下,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政策,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耕地扩大,人口增加,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一时期,被历史学家颂称为“文景之治”。即使是文帝和景帝,也不属于创业型人物。毛泽东提到他们时评论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sup>①</sup>历史上能干的皇帝尚且如此,绝大多数平庸者可想而知。我想,这也是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的人为因素吧。

(3)其继承形式是在终身制的基础上,个人向个人交接班。近

---

<sup>①</sup>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上卷,第431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代学者闻一多曾说：“封建社会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一个家庭，父亲永远是父亲。一个国家，皇帝永远是皇帝，地位不可动摇，只有死了算，这就是“终身制”。终身制在继承上带来的明显弊病是，接班人老的老，小的小，不利于事业的更替与发展。如周文王执政 50 多年，97 岁去世，其子周武王继位时已 80 多岁高龄。如此年纪，即使再有雄心壮志，又能干多少事情呢？而清代的玄烨 8 岁做皇帝（康熙），载淳 6 岁接班（同治），溥仪 3 岁被扶上金銮宝座（宣统）。这些人又怎么能够立即行使职权，领导一个国家呢？

个人向个人交接班，总是要找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最深、最可靠的人。谁和自己的利害关系最深？谁最可靠？汉武帝刘邦说过：“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sup>①</sup>也就是说，这种交接班方式的最佳选择，只能是以血缘关系相联系的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传下去。国家的最高权力长久地由一氏一姓把持，成为社会的最大不公。因此，历代的许多造反者、起义者，都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皇位，要求权力再分配。陈胜、吴广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巾起义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朱元璋认为“天运循环”，“明王出世”，该轮到我为皇帝了。清末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更具有理论色彩的提出：“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

## 二、资本主义创造了与封建主义完全不同的首脑更替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sup>①</sup> 《汉书·高帝纪》。

商品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封建君王的宝座,在资产者们强烈要求自由贸易、平等交易的呼声中,经过长期的反复斗争,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逐渐战胜了君主专制理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西方各国纷纷进入社会发展史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反映在首脑更替与继承问题上,资本主义也创造了一套与封建主义完全不同的体制:

### 1. 以选举制代替世袭制。

封建君王的权力是上帝给的,因此至高无上,不受一切限制,自然他想叫谁接班就叫谁接班,其他人无权干涉。资产阶级推翻了“君权神授”理论,确立了“人权”理论,主张领导人的权力是由全体公民给予的,并由此产生选举制度。选民根据法律规定,每隔一定时间,以选举的形式重新挑选当政者。由多数党执政或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人当选公职。

和中国的历史不同,古希腊的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度下就有了选举活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等级会议中的平民会议,也有自由民推选的代表参加。著名的法国 1789 年大革命打击和摧毁了封建制度,1791 年制定的宪法虽然还保留了世袭的君主制,但规定国家的主权在于全体公民,国王必须接受宪法的约束。1792 年 9 月,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第二年 1 月在“国民万岁”的欢呼声中,国王路易十四被处于死刑。1893 年重新制定的宪法规定最高立法机构是立法会议,由年满 21 岁的男子普选产生;最高行政机构是执行会议,由立法会议在各郡候选人中任命;人民直接选任代表;人民委托选举人选举官员;人民议定法律;凡满 21 岁的法国公民都有选举权,等等。法国 1793 年宪法,成为近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

还应看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也为现代选举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兴起的英国宪章运动,曾吸引上百万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争取自身权力

的斗争。如恩格斯所说：“工人的激进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共同的口号。”1837年6月，伦敦工人协会拟定一个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六点要求：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给薪俸；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公布时，命名为《人民宪章》，此后，为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选举制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与完善，虽然与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普遍的、平等的选举”还相距甚远，但这一制度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它否定了封建专制，确立了民主制度；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建立了领袖轮换制。这对结束专制和防止个人专权，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定期的选举活动，对执政党和执政者是有效的约束和监督。选举制度的实行，也有利于选民克服封建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广泛的民主意识。在当代，选举制度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

## 2. 以分权与制衡原则代替君主专制。

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阐述了分权思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撰写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中，创立比较完整、科学的分权与制衡理论。他把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三个部分，由议会、政府和法院分别行使这三种权力。强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保持平衡。他认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和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法官既是立法者，又掌握压迫者的力量，就可以“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孟德斯鸠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防止掌有权力者滥用权力的有效办法即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三权分立辅之以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从而达到权力均

衡。

分权与制衡原则是在与君主专制经历了长期的反复斗争,才逐渐实现的。以英国为例,16世纪前半期,詹姆士一世国王对已经形成的国王与国会之间的稳定关系提出挑战,认为只有国王创造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国王;议会的权力来自国王,不能限制国王。到查理一世,干脆不再召开国会,出现长达11年的无国会时期。后来,国会利用国王的困难再次崛起,要求国王只能从国会信任的人中任命大臣和高级官员,惹得国王亲自率卫队到议会大厅抓反对派首领。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导致1642年8月内战的爆发。战争以资产阶级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1649年1月,查理一世受到国会组织的特别法庭审判,并被以暴君、杀人犯等罪名判处死刑。后来几十年中又经过反复的斗争,1688年国会中所有派别联合起来,共同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将重新搞旧体制的国王詹姆士二世赶走,制定有名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规定国王不得干涉国会事务,无权废止国会批准的法律,不经国会批准不得征募和维持常备军;国会议员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议员经自由选举产生等。其基本精神是,国王的权威必须服从国会的权威。从而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对旧式依附王权的议会制度的改造,建立了新的议会机构<sup>①</sup>。

### 3. 以公务员(文官)制度取代一朝天子一朝臣。

封建社会的大臣官员都是皇帝恩赐的,大臣官员只对皇帝负责,并为皇帝服务,是皇帝的奴仆。皇帝改变了,原来的大臣官员自然跟着倒台,围绕新的皇帝又会形成一批新的奴仆,这一现象被称为“一朝天子一朝臣”。资产阶级的公务员(文官)制度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皇帝与大臣的主仆关系,而形成相对独立的、长期

<sup>①</sup> 写作这部分参阅了唐晓、王为、王春英著:《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董建萍著:《西方政治制度史简编》等著作。

稳定的干部体系。它的新特点是：公务员的任用不再凭政府首脑个人的意志，而是通过公开考试，根据德、才条件录用；有一套考核、奖惩、待遇、培训、晋升、调动、解职、退休、保障，以及分类管理等系统的规章制度和体制；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随着内阁的变迁，执政党和执政个人的更替，而引起政府行政人员的经常大换班。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各国政府实行统治的重要支柱，常任高级公务员被称为“从不下台的幕后主管，永不更迭的统治者”。

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不仅是和封建官僚制度斗争的产物，也是在总结吸取资产阶级执政初期“政党分赃制”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初期，都曾把内阁、政府看成自己的“战利品”。哪个政党上台，随即实行政府工作人员大换班。执政党对自己的人马论功行赏，公开合法地进行肥缺分赃，导致营私舞弊、买官求职盛行，腐败之风迅速蔓延。政府公职人员的频繁更换，就个人而言，经常是一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熟悉业务的新手在工作；就整体而言，始终无法形成熟练的、有序的运作系统。这样，势必严重地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1854年，英国政府委托两位爵士提出“关于建立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此后又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不断地修定各种具体规定，逐步形成一套公务员制度。包括：公开考试与择优录用；严格考核与论功行赏；无过失不被免职；保障公务员的权利；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工资与退休制度；等等。

资产阶级的文官制度比封建官僚制度是个巨大的进步，然而却远远未达到其所要求的“公正”、“廉洁”、“高效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官场上的贪污、受贿、索贿，以权谋私，政治舞弊等腐败行为，层出不穷。如日本70年代的“洛克希德公司贿赂案”，美国80年代的“五角大楼贪污受贿案”，意大利90年代的“米兰特大行贿受贿案”。这些丑闻的出现，远远不只是运作中的具体问题，而是暴露了资产阶级文官制度本身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正如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莱斯特·瑟罗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提供如此之多的效益和技术，但资本主义制度缺少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

#### 4. 以“你死我活”的竞选取代封建王朝更迭中的兵戎相见。

封建社会中，往往是一个王朝腐败到了极点，社会矛盾来个总爆发，在激烈的武装冲突或连年战争中，实现改朝换代。由新的王朝采取某些改善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从而结束整个社会的动荡。而资产阶级国家的每一届政府的更替，则是通过有严格法律程序的竞选活动来完成的。各种政治势力成立庞大的竞选班子，频频开展竞选活动，广泛地与选民接触，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揭露和抨击对方的问题。通过公开竞争，针锋相对，互相攻击，互相揭短，暴露和认识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并让社会的积怨有了一个“出气筒”，从而使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尽量呈现非暴力、非激化形式。记得一位东方人曾向美国政治家提出：你们这样揭丑，对整个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他回答：我们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我想这一回答是有一定道理的，通过看似“你死我活”的竞选活动，从总体上维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政府的更迭和权力的再分配。

#### 5. “彬彬君子之风”刮来的污秽。

西方社会的竞选形式，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和平”、“完美”、“彬彬君子之风和充满人情味”，而有着明显的弊病。

其一，每隔几年搞一次竞选活动，时间长达1年，整个社会为此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如美国1972年竞选总统活动所投入的经费达4亿美元，1980年超过8亿美元。到1988年，美国一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耗资高达5亿—6亿美元。1996年的竞选活动，“民主、共和两党更是展开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金钱大战’”，“整个竞选花费估计有20亿美元之巨，创大选史上最高记



录”<sup>①</sup>。为了扩大影响,推销自己,许多竞选人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就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如《美国政府》一书所说:“一个好的竞选广告可以塑造出候选人希望的形象。候选人可能会被人像香皂或除臭剂一样销售。”1957年肯尼迪在竞选活动中,为制造广告效应,竟然花了7.5万美元买一匹名马,又花7.5万美元在《时代》杂志封面上刊登自己的照片。1996年竞选中,“克林顿总统也投入200万美元,选择了20多个城市播放三个不同的电视广告片”。而所有竞选经费,很少是由个人出,绝大多数为各界的“政治捐款”。捐款中的“硬钱”(指直接给候选人的钱)有法律限制,个人最高不得超过2000美元,工会、公司和各种集团不得超过5000美元。而“软钱”(指给各政党的钱)则根本没有限制。“从1995年1月到1996年9月30日,两党筹集的‘软钱’就达4.7亿美元,其中共和党2.74亿美元,民主党1.95亿美元。”<sup>②</sup>如此巨大的花费越来越引起美国公众的不满,因为它最终要由每个纳税人来承担,以至美国有近一半的合法选民放弃投票权,以示抗议。

其二,竞选活动中丑闻层出不穷。一位西方的先哲讲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西方各国的竞选活动,既是资产阶级民主生活的充分体现,也伴随着各色各样的阴谋活动和无奇不有的政治丑闻。如大党利用有利地位操纵选举,以金钱收买选票,对竞争对手造谣中伤,以下流手段骚扰竞争者的妻子,用色情为诱饵为对手制造陷阱,等等。更有严重者如肯尼迪,1960年竞选活动

---

① 《环球文萃》1996年11月10日载文:《20亿美元大选告终,克林顿连任美国总统》(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张亮)。

② 《环球文萃》1996年11月10日载文:《20亿美元大选告终,克林顿连任美国总统》(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张亮)。

中,其亲信竟然与黑手党徒勾结,为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拉选票。1968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松的手下雇用人打入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的竞选班子里充当密探。1972年的总统竞选被称为“现代历史上最肮脏的一次竞选”。尼克松手下为窃取对手的竞选计划,派5个人潜入民主党总部大楼安装窃听器,当场被捉,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水门事件”。“这些高层官员的曝光,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氢弹爆炸’般的震动。千百万美国公众在电视屏幕上目睹了一场他们的‘公仆’的卑鄙表演。这与黑手党的伎俩可以媲美。”

其三,竞选是有钱人的“政治游戏”。早年,参加选举的人有严格的财产限制,18世纪法国的一个政府首脑留下一句名言:“先生们,赶快发财吧!到那时你们就会成为选民!”近些年来,对选民的限制大大放宽了,然而想当候选人,则没钱是万万不行的,必须首先交纳一定数量的选举保证金。如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候选人须交1000法郎,参议员候选人须交2000法郎,法国总统候选人须交10000法郎。日本众议员候选人须交1000美元,参议员须交2000美元。至于在竞选活动中所要花的钱更是惊人,意大利一名众议员竞选费用为1.76亿里拉,美国一个州的议员选举费用高达20万美元,竞选美国总统所花费用更是天文数字,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金钱是进入白宫的钥匙”,“金钱是竞选人的政治牛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选举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sup>①</sup>

### 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 演变的历史教训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版。

自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12月5日苏联垮台,世界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74年,经历了8任领袖:列宁(1917年11月至1924年1月)—斯大林(1924年1月至1953年3月)—马林科夫(1953年3月5日至14日)—赫鲁晓夫(1953年9月至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至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至1984年2月)—契尔年科(1984年2月至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至1991年8月)。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斯大林,在位近30年。最短的为马林科夫,仅仅10天。有5人去世于领袖岗位上,3人被迫下台。

回顾苏联8任领袖的演变,从塔尖上纵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足迹,不禁浮想联翩。

### 1. 列宁有关继承人问题的想法与做法。

列宁从1921年开始重病缠身,几度因病不得不停止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着手考虑领导人的交接问题。中央本来有个书记处,由三名书记组成,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其中有一名责任书记,没有总书记。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以后,列宁建议设立总书记,并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不久,他又感到斯大林不合适,再加上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因为农业问题有分歧,矛盾日益激化,有可能导致党分裂的危险。列宁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4日,给苏共中央写了一批信件(口授,由别人代笔),系统地表达了他对未来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想法。现将其中三封主要信件摘录如下:

#### 列宁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变革……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会人数增至几十人甚至一百人。

我想,假如事情的发展对我们并非十分有利(我们是不能这样指望的),假如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应在一定条件下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具有立法性质……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认为,为了提高中央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 列宁的“遗嘱”

稳定性是指保障在近一段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是个人品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我以为,避免分裂的方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五十至一百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行政方面。

现在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斯大林太粗暴了。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不可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

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 列宁关于吸收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以改革国家机构的信

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旧制度承袭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条件下,要改造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构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代革命的条件……但是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是为了改善机构。

我是这样设想: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重建我们的机构。起初应该起这种作用的工农检查院,结果干不了,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们的助手。

上述文件表明,列宁在考虑领导人交接时,把个人的选择与领导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如何克服旧的体制的影响,如何更能加强集体领导,如何更好地发挥工农大众的监督作用。以利于尽量地减少个别领导人品质方面的问题、失误或纯个人原因对全党的危害,从总体上提高“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

由于列宁很快去世了,他没有来得及实际贯彻这些想法。而列宁以后的各任领袖,又都没有把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选拔培养接班人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重要领袖之一莫洛托夫指出:“列宁是在感觉到自己有病之后才这么决定的。他是把

斯大林看成是自己的接班人？我认为，可以这样考虑。”<sup>①</sup>谈到斯大林时，莫洛托夫说：“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没有把任何一个人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sup>②</sup>长期在苏共中央担任要职的布尔拉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与莫洛托夫大体相同的看法：“问题还在于，我们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关心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我们不用去说斯大林了，他就曾公开地对自己的所谓战友们说过：‘我死了以后，你们没有了我就会完蛋，就会死去！’……公正地说，连列宁也没有关心接班人。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他对每个留下来的高级领导人都作了评价，但多为批评性意见。连他也没有看出在他百年之后可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来（这说明，他也没有培养这种人）。”<sup>③</sup>

## 2. 斯大林想把“不可靠的人”统统搞掉，结果却提拔和重用了最不可靠的赫鲁晓夫。

斯大林之后领导国家的正好是赫鲁晓夫，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出现呢？为了把自己所有的敌人——真正的和假想的，右倾的和“左”倾的——都“清除”出党，好像斯大林已经做了一切。50年代，传着他的一句格言：“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结果，活下来的好像都是最忠诚、最可靠的人。斯大林怎么就没有看出赫鲁晓夫是对自己的崇拜的掘墓人呢？

这是《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一书开头提出的问题，也是长期

① 《莫洛托夫访谈录》，第21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② 同上书，第415页。

③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第2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

以来使不少人感到困惑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有的说斯大林晚年老眼昏花看错了人；有的说赫鲁晓夫太狡猾了，是条变色龙；更有甚者，认为斯大林犯了右倾错误，肃反不彻底。所有这些说法从方法论上看，都是仅仅把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当做两个人的事，而没有看到这是两代领袖间的一种历史现象。

人所共知，斯大林当政期间搞了许多错误的党内斗争和过“左”的肃反活动。如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1937年至1938年间，有98人，70%曾遭逮捕，或被枪决。参加十七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后来有一半以上即1108人，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这样多党的重要骨干，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党政工作者，遭到清洗，从组织上大大伤了党的元气；政治上严重的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助长了个人专权；思想上极大的挫伤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削弱了党的凝聚力。

斯大林的错误做法，只能维持暂时的统一，不可能造成政治上的长期稳定。只能维持表面的一致，不可能真正统一全党的思想。一种错误的政治倾向，总是要同时造就自己的否定因素，总是潜伏着动荡的危机。因此，斯大林去世以后，即使没有赫鲁晓夫，也会有别的晓夫出来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倾向。但态度和做法，可能与赫鲁晓夫有区别。赫鲁晓夫的问题在于：不是只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而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否定斯大林的家长制、个人专权的同时，赫鲁晓夫本人继续搞家长制和一切个人说了算；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并没有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有些方面搞得更加糟糕。连许多西方观察家也认为：“赫鲁晓夫给斯大林擦皮靴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去穿那双靴子代替他了。”

为什么会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糟糕的“否定因素”呢？

首先是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俄国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列宁，也包括斯大林，他们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革

命的理论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和深刻的独立探索,而成为领袖人物的,兼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赫鲁晓夫则不同,他是在第一代革命家的提携下,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革命队伍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取得政权,赫鲁晓夫跟着走上领导岗位。革命的胜利,使他缺乏一种学习和钻研理论的迫切感,满足于自己的“阶级本能”。直到成为苏共第一书记以后,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会见时,尚且炫耀自己是“工人出身”,借以贬低周恩来,遭到周的反击。外国传记作家们说“没有新政权就没有赫鲁晓夫的一切。新政权使得他得以摆脱煤矿工人平庸的生活”,“理论使他感到厌倦”,“把他与那些辩证唯物主义大师相比,他简直就是个文盲”<sup>①</sup>。而苏联人则说赫鲁晓夫是“一个道地的庄稼汉!”。像这样的人一旦当权做领袖,很容易“跟着感觉走”,忽然这样,忽然那样,时而全部肯定,时而全部否定,没有任何原则和准头,成为革命导师们所批判的“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长期搞家长制统治,个人专断,一切“只能照办,不许讨论”,听不得半点意见。特别是到了晚年,办事和处理人际关系更加片面和多疑。许多和他共事多年,水平很高,正直而又敢于提意见的领导干部,一批一批遭到冷落和迫害。如从1921年就成为中央书记的莫洛托夫,几十年来忠心耿耿辅佐斯大林。到了40年代也受到斯大林的无端怀疑,夫人被捕,本人遭贬。莫洛托夫讲:斯大林“从1912年起就认识我,然后共事了几十年,共同推行了一些最棘手的决议。我在各方面基本上都很积极,从未消极过,而他却产生了怀疑,鬼知道为什么”!即使如此,斯大林死后遭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时,莫洛托夫仍然挺身而出反对这一错误的做法,并表示:“尽管他再多活几年我也许保不住性命,但我过去和现在都一

---

<sup>①</sup> 皮埃尔·阿考斯、皮埃尔·朗契尼克著:《病夫治国》,第260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7月版。



直认为他是一个伟人。”<sup>①</sup>

斯大林的个人专政,喜欢听好话,容不得不同意见,也使一些阿谀奉迎者、品质不好的人钻了空子,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屡屡得到提拔和重用的。1929年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赫鲁晓夫,被送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正好与斯大林的夫人娜杰日达一个班,赫鲁晓夫因此和斯大林相识,并成为斯大林家的座上客。这一偶然性改变了赫鲁晓夫的命运,正如一本有关他的传记所说:“假如不是碰到一个好机遇的话,他也许一辈子都是个中层领导人。”赫鲁晓夫本人也坦白地承认:和斯大林夫人相识,“决定了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我把这叫奖券,我抽到了一张中奖的奖券。正因为这,我活了下来,而与我一起在党组织中工作过的我的同龄人、我的同窗、我的好友却成了‘人民的敌人’,掉了脑袋”<sup>②</sup>。其实,并不只此,由于赫鲁晓夫最“听话”,是“百分之百的斯大林分子”,而平步青云。1935年,刚刚40岁即成为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38年1月,进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

一位苏联领导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谈到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两者的关系时说:“他是斯大林的结构教育出来的人。”我认为此言很有见地,非常深刻,值得回味。

**3. 领袖更替缺乏应有的制度,导致上层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比亚勒在其《斯大林的继承人》一书中,有如下一段:“对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来说,预先不规定任职的期限;不规定最高领导人的条件,结果,从其权力和义务、权力和影响方面来看,所有的最高领导人都是一样或相似的。离职的最高领导人移交权力的方式没有

<sup>①</sup> 《莫洛托夫访谈录》,第56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sup>②</sup>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第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

任何规定……这给苏联的全部政治生活注入了不可预见的和不确定因素。在紧急情况下,这一因素就更是不可预见和不确定了。”列宁对他去世以后的高层政治生活虽有所预测,但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十分忧虑和担心;斯大林绝不会想到,他身后“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更是不会预料到,自己以“宫廷政变”方式推翻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到头来自己又以同样方式被谢列平、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推翻。从勃列日涅夫开始的20多年,虽然没有大的政治风波了,但又发展了另外一种危险性:接班人老化,年迈多病,日益失去活力。

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开始时,注意纠正赫鲁晓夫的失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都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方针和政策,使苏联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有较大的发展。但从总的方面看,勃列日涅夫“是一个传统式的人物,非常保守,他最担心的就是急剧的动作、突然的转变、大的变化”。那时流传着勃列日涅夫一句话:“改革,改革……谁需要这,谁懂得这呢?工作干得好一些,这就是全部问题。”<sup>①</sup>到了执政后期,由于年老体弱,更是变得毫无活力。请看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位党政高级官员在《震撼世界的十年》一书中的如下描写:

事情越来越明显:勃列日涅夫已不再能领导党和国家了。政治局会议上,他坐在那里,目光呆滞,看起来对他周围的一切,出席会议的人的身份,以及他们要讨论的问题都一无所知。他照着助手为他准备好的,用特殊打字机打出的特大号字体的稿子宣读。经常糊涂得把同一句话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可怜兮兮地向周围望一眼,就好像承认自己的虚弱。为

---

<sup>①</sup>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第21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

了缩短达成结论所需要的时间,契尔年科会帮助他吧会议结束;大家都会迅速地表示同意,然后在一种惊愕的气氛中,离开会议室<sup>①</sup>。

等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接班时,情况更为严重。安氏 1982 年 11 月继任总书记时已 68 岁,且身患糖尿病、心肌梗塞、肾功能衰竭等多种重病,虽有雄心却无法实施,上任一年零三个月即去世。契氏 1984 年 2 月继任,时年 72 岁,上任伊始即需被人抬到会议室参加会议,会议一般只能开 30—40 分钟便宣告结束。契氏在位一年零一个月,便告别人世。由于领导人政策方面有严重失误,再加上身体原因,无力开展工作,全党到处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经济恶化,政治涣散。“早在 1982 年 11 月,苏共中央的局势就已经非常紧张了。国家的发展令人惊慌,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政治局的决定根本没有被执行,人民已经失去了信心,盼望着发生重大变革。”<sup>②</su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被新上任的领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向最终垮台。

---

① 瓦列里·博尔金著:《震撼世界的十年》,第 26 页,昆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② 同上书,第 25 页。

## 第四章 邓小平的新思路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 不战而胜》一书中,对邓小平解决领袖交替问题的贡献作过如下评价:

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一个共产党领袖体面和自愿让位,让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是极不寻常的。这些评论家没有认识到,这对于任何政府,包括民主政府,都是不寻常的。戴高乐不肯让位给他的明显的接班人乔治·蓬皮杜;丘吉尔不让艾登;阿登纳粗暴地拒绝他的能干的财政部长鲁德维路·艾哈德……

邓……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部属是个威胁。相反,邓认为一位领袖逝世后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才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依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愈来愈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记忆。在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能正视自己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尼克松和“许多西方观察家”从个人实践角度,指出了邓小平对待接班人问题上的伟大之处。其实,邓小平的更加伟大之处还

在于,他总结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参考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得失,在解决事业继承和领袖交替问题上提出的新思路。

## 一、把命运与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很危险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讲道: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能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到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时说:

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所谓“不健康”，是说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希望和未来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理论上不科学。这种看法，夸大了个人的历史作用，“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sup>①</sup>。在对待领袖问题上，健康与不健康的界限怎么划？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区分：

其一，领袖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他的智慧和能力就要受到人自身种种条件的限制（如个人品格、素养、经历、知识状况、实践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不可能事事正确，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其二，领袖是人民的代表，不是人民的家长。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家长不管正确还是错误，永远是家长，子女要无条件的服从。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则不同，领袖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人民办事时，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尊敬。领袖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办事违背人民意志时，就会陷入错误之中。坚持错误不改正，就会被人民淘汰。

其三，领袖是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一个成员，不是高踞组织之上的特殊人物。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教训是惨痛的。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把命运和希望都寄托在一二个领袖人物身上，忽视政党和国家的整体建设，忽视人民群众，一遇风吹草动，领袖如无土之花，无兵之将，其结局可想而知。更何况领袖也是普通的人，再能干，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包打天下。身体再好，也有个生老病死，领袖不在了，党和国家怎么办？再聪明，也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80年7月30日）。

有马失前蹄之时,领袖犯错误,领错了路,党和国家又怎么办?《国际歌》中有一段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不是贬低领袖,搞无政府主义,而是深刻地表达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靠哪一个人包打天下就能完成的,基本的依靠是集体,是人民群众。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因此,邓小平不赞成过分突出领袖个人,他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他不赞成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不赞成个人向个人交接班,“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主张实行集体向集体交接班。邓小平多次讲道,“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他在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袖集体谈话时反复强调:“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同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 二、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

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此,邓小平再次复出以后,以极大的精力抓了领导制度的改革。

首先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苏联和中国在领导制度方面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高度集权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袖个人。不从制度上进行改革,谁上台都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为此,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扩大领导人数并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手加强集体领导和监察制衡。1980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人的情况,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从而形成由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这样做,从战略上考虑,可以起到分权和制约作用,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至一下子影响全局。同时,也有利于接班人的培养和锻炼。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党规,进一步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领导干部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不准搞特权等。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又出台了若干措施。如在《党章》(草案)中明确规定不搞领导职务终身制;发布《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个人的像;实行党政分权;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等等。到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又提出:“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监



督和制约。”

在解决分权和制约问题上,邓小平认为,“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但不赞成照搬西方国家的一套办法。他说:我们的改革,“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不能搞三权鼎力那一套”。

“分权制衡”作为一种理论,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也是人类对权力现象及其运作规律的一种较为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列宁曾指出:“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制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制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sup>①</sup>,接着列宁又说:“如果没有代权制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像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sup>②</sup>因此,分权制衡机制,我们是应当借鉴和运用的。而“三权鼎力”、“两院制”、“多党竞选”一套具体做法,则是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适应本阶级政治利益需要,而形成的具体做法。我们当然不能不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把它生搬硬套过来。更何况“三权鼎力”一套做法,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已经暴露出诸多的弊病了呢。

其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逐步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到80年代初,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健在的尚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已经离退休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还留在岗位上。许多人进入老年,仍然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各级领导班子的老化状况,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年老体弱多病者占据各级领导岗位,年轻力壮者上不来。这一问题引起中央的忧虑,下面的广大群众也感到不满。当时曾有不少顺口溜广为流传,如“二十七八学习文化,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五十七八钓鱼种花,六十七八大干四化”。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sup>②</sup> 同上书,第203页。

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的,80年代初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兰契奇曾写文章反映这一情况:“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年纪越大,越英明。还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是绝不下台的,而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直到不久前,退出政治地位并不因为年龄关系,而是政治上犯了错误,或者不同意现行政策,中国目前尚无法律效力的退休法。最后还存在一种普遍的固定看法:有权就好办事,因此通常很少有人自愿下台。”这一时期,邓小平多次呼吁解决干部老化和终身制的问题。1979年11月2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说:“实行退休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再一次尖锐地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

邓小平还十分注意研究历史的和国外的经验教训。1987年11月,非洲国家突尼斯发生政变,年迈的终身总统布尔吉巴被解除职务。邓小平“从布尔吉巴的遭遇中总结出一条教训:‘老人政治’搞不得”!他还感慨道:“布尔吉巴是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长期在突尼斯威望很高。他比我大一岁,今年84岁,但是他一直不安排好身后事,结果让人安排了他的后事……我已经83岁了,不知哪一天就会倒下,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就是不倒下,总有一天会像布尔吉巴那样胡里胡涂,结果犯了错误或者被人清理掉。因此,我的半退是一种过渡方法,力求减少过问具体工作。”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省部级干部“正职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职一般不超过六十岁。担任司局长一级干部,一般不超过六十岁”。《决定》还根据当时中央领导的实际情况和政治需要,指出:“在党

和国家领导人中,需要保留少量超过离休退休年龄界限的老革命家。”

从80年代开始,邓小平力排众议,带头退出一些领导职务。他说:“是我首先提出在党内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建立退休制度。我自己不带头做,其不是言而无信吗?终身制还废除得了吗?退休制度还能建立起来吗?”邓小平的行动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1988年香港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评论说:“他带头坚持退下中共最高层岗位,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一个好榜样,并且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三、提出“四化”标准,培养 成千上万的接班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全党从阶级斗争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正式提出:“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针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干部严重老化和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状况,邓小平特别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大多数干部正值壮年,进入6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结束以后,一大批被错误打倒的干部重新掌权,年龄老化问题显得十分突出。邓小平主张从思想和制度两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思想方面要克服“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制度方面,首先是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还需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如干部录用、管理、考核、提升、奖

惩、淘汰等。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重视年轻干部,其着眼点比传统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往提及接班人问题和培养年轻干部,注重继承传统,着眼于“守业”多。而邓小平则更多地着眼于改革和发展,他要求新建立的年轻的领导班子,应该“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而不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他在“我的政治交待”中,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1985年10月23日,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在采访邓小平时,问及邓对新的领导人的变动是否满意和政策的连续性问题。邓小平答“我们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他以辩证法的眼光看待政策的连续性和继承问题,对政策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如果政策不对,有什么必要连续呢?如果政策对……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对于继承者,主要不是从个人角度考虑是否“满意”,而是强调“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

和干部年轻化相比,干部知识化是个更为艰难的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和全民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一时难以有很大改变,再加上“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一直存在着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舆论,社会影响颇大。二是知识分子异己论,统统被列入“资产阶级”,属“团结、教育、改造”对象,形象的说法是“老九”。60年代初“反修”时,知识分子又和修正主义连在一起,记得当时分析苏联领导集团之所以变修,原因之一是领导成员中有90%以上是大学毕业生云云。

经济落后再加上政策和舆论导向错误,使得中国进入80年代,十亿人口中,还有二亿三千五百多万文盲;大学生总数6020530人,占全国人口的0.6%,几乎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每一万名从事农业的人口,仅有大学水平技术员3名,而国际平均数为50名<sup>①</sup>。这个全国的基本情况,相当程度地制约了我国干部队伍金字塔中各个层次的人员文化素质。党政各级领导班子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0%,尤其缺乏懂得经济管理专业知识的干部。面对四个现代化重任,改变干部队伍的构成,和改变年龄结构一样,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以后即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于1980年1月提出,“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邓小平不仅从舆论导向和政策上开始扭转过去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从理论上给予拨乱反正。

知识到底能不能产生价值?通俗地说:知识到底有没有用,值钱不值钱?这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知识价值的认识,不仅关系到知识本身,而且关系到具有较多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应当怎样看待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对此给予了正确的回答:第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科学

---

<sup>①</sup> 上述情况引自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第二,知识产生价值,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自然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就中国的知识分子状况而言,“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提出和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仅对正确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正确培养和提拔各级领导岗位的接班人,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在解决事业继承与领袖交替问题上,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延续,打破保守僵化模式,倡导改革开放,着重解决社会整体的活力问题,而不是仅仅从政治和道德的观点去选择和培养一个或几个接班人;以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制度与人、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纠正过分依靠人治和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的错误倾向,强调只有不断地完善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证领袖正常的、正确的行使权力;以豁达的人生态度对待两代人的关系,上一代人从创造辉煌到退出舞台,下一代人由成长到接班,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强调以睿智的思考处理两代人的交接,尽量减少个人感情色彩的负面作用。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其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将是不可估量的。

## 第五篇 “领袖即公仆”的崭新雏形

### ——析周恩来现象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特殊的领袖人物。他从1927年到1976年长达半个世纪中,在政治风云频频变幻,领袖多次更迭的条件下,一直跻身于党的最高领导层,参预制定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决策,领导过多方面的工作,成为任何一个领袖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历尽风雨、长开不谢的政治之花;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才智过人,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过重大贡献,在最高领导层时间最长的领袖人物,却始终未当第一把手——他,就是周恩来。

这一政坛现象的出现,不仅涉及周恩来本人的才华、品格、素养等问题,而且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状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研究它,对人们进一步认识革命与人生、政治与个性、时代与领袖、人民与“公仆”的关系,将会从中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 第一章 政坛常青树

纵观历史上的许多领袖人物,执政短者如舞台上的匆匆过客,虽有耀眼的光辉,却转瞬即逝。执政长者,叱咤风云,功勋卓著,不少人到了晚年,可惜成为悲剧人物。周恩来不同,他从1924年旅欧回国不久即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到1976年去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领导生涯中,虽然也走过麦城,但作为政治家,历经无数风雨,愈炼弥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达到他一生光辉的顶点。许多政治巨星的陨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周恩来的去世,却呼唤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请看当年天安门广场的诗句“死后更知君伟大,遗愿似火策人行”,“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

### 一、29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于1924年9月由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经过不到三年时间,29岁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这三年时间周恩来的职务升迁情况是:

1924年10月,任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革命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同年11月,被我党推荐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该校校长为蒋介石,党代表为廖仲恺。

1925年1月,改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成



为我党的第一位军事部长后,专心致力于军事工作。9月,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下辖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四军之一部,蒋介石为总指挥。11月,出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下辖潮、梅等25个县级地方政权。

1926年12月,调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陈独秀为总书记兼主任),实际负责全党的组织工作,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3月,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一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和特别军委书记。5月,被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又被中央委员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不久,又改任中央军事部长。5月29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李维汉),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

周恩来以出色的工作证明他是称职的。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即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才华。他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根据苏联红军经验,制定并实行了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并且积极组建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周恩来还从理论角度比较系统地提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建军问题。他认为孙中山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几十年,在军队问题上的教训是:“多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而来……此种军队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周恩来提出:①革命军队是“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是“党军”,“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②“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使兵士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③“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这些思想代表了我党早期对革命军队性质、任务、建设,以及军事工作方针的正确认识,对后来我党独立建立无产阶级军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起了奠基作用。

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努力工作,既坚持团结,又能坚

持原则,不但得到我党的好评,而且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称赞。黄埔军校工作人员反映,周恩来“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sup>①</sup>。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说:周恩来与廖仲恺“二人一起合作共事,亲密相处,真诚无间”<sup>②</sup>。老国民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黄埔军校代理总队长和蒋介石副官处处长的张治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我认为周是很好合作的人”,“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sup>③</sup>。

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周恩来主张坚决和蒋介石斗争,并对党的领袖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4月16日上海特务委员会上说:“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指出陈独秀与汪精卫的联合宣言“毫无积极味道”,要求“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sup>④</sup>。随后,周恩来起草并由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六人签名致中共中央电,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周恩来毅然接受党的委派,担起发动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的历史重担,领导三万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周恩来为什么能在短短三年时间,步步晋升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呢?这固然和他本人的出众才能与工作成绩有着直接关系,还应该看到,周恩来的晋升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即人们常说的“机遇”或“时事造英雄”。

① 王逸常:《周恩来与军校政治部》,《黄埔军校史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② 何香凝:《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廖仲恺》,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6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5月版。

③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1页,第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8月版。

④ 周恩来在特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4年,革命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革命规模看,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波及全国十几个省,参加者达1200万人。农民运动遍布16个省区,农民协会会员有100万人以上。从斗争形式看,幼小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和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结成革命联盟,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起统一战线。新的斗争形式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尽快地掌握革命斗争艺术,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极其复杂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几年来虽然也有很大发展,但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和革命事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1926年7月党中央指出:“全国工作人才,仅依目前的需要,至少应有区的工作人才三十五人,地委或部委工作人才百六十人,特支工作人才百六十人,共三百五十五人,而现在担任党的工作者,勉强只有百二十人上下,由此可见人力与实际需要相差之远,应竭力养成工作人才以为救济。”<sup>①</sup>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旅欧留法的勤工俭学生纷纷回国投入第一次大革命运动,为革命增加了一大批新鲜血液。据法华教育会1921年名册,留法学生为1600人。到1924年,已发展有200名党员。这批留学生经过3—4年的勤工俭学学习和实际锻炼,热情高,能吃苦,有干劲。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和法国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同时对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也有相当的了解,懂得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而这些,恰恰是国内同志所欠缺的。因此,他们的回国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许多人回国不久即委以重任,成为党的重要骨干。到1927年5月党的“五大”时,中央委员29人中留法、德勤工俭学生占8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1人中占5人,他们是: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陈延年。此外,还有一大批干部活跃在各个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组织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

战线上,后来逐渐成为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如:朱德、李富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向警予、蔡畅、郭隆贞、孙炳文、熊雄、李大章、邢西萍、傅钟、何长工、欧阳钦、李卓然等。

周恩来是旅法、德勤工俭学中的佼佼者,他于1921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以后,周恩来任执行委员会书记。他作为领袖人物,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组织在周恩来回国时写了如下评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看书看报”,“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第一次大革命运动为周恩来发挥才能,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使得他能够在29岁时即跻身于中共最高领导层。

## 二、领袖频繁更替时期不可替代的人物

从1928年7月党的“六大”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的说是向忠发和王明相继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时期。然而具体分析这一时期的领袖班子变化情况,就会发现六年多时间,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核心成员曾八易其人,变换频繁,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1)1928年7月至1930年6月,周恩来、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主要骨干有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苏兆征、蔡和森。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和革命事业均有很大发展。

(2)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主持工作,党史上称为“立三路线统治时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此时中央主要骨干有向忠发、李立三、徐锡根、顾顺章、袁炳辉。其中,向忠发、徐锡根、顾顺章、袁炳辉均为工人干部。8月成立的“中央总行委”主席团扩大为七人,虽然包括周恩来和瞿秋白,但周、瞿此时都在苏联,没有

参与中央实际领导工作。

(3)1930年9月三中全会至1931年1月四中全会前,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主要骨干有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项英、张国焘、关向应。这一时期,在瞿、周领导下结束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

(4)1931年1月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取得中共中央领导权。由此至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王明领导中央工作,主要领导成员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向忠发。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史称“王明路线统治时期”。

(5)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到1931年秋王明出国前,中央负责人为王明,主要领导成员有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刘少奇、张闻天。

(6)1931年秋王明去苏联,由此到1933年1月,博古在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主要领导成员有博古、卢福坦、张闻天、李竹声、康生、陈云。

(7)1933年1月至1934年1月,为中共中央局时期。上海的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由博古主持工作,主要领导成员有周恩来、项英、任弼时、张闻天、毛泽东(实际遭排挤)、刘少奇、陈云、顾作霖、朱德、王稼祥、邓发等。

(8)1934年1月五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一时期总书记为博古,主要领导成员有李德、周恩来、张闻天、项英、王稼祥等。

上述情况表明,不管领导班子怎么变化,周恩来始终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甚至有时候一方面言辞激烈地批判他,一方面多数人还是选他。如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直接插手,批判“立三路线”和瞿秋白、周恩来的“调和主义”,借机让王明等人上台。会上,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罗章龙等立即附和,认为:“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同

志(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这一意见遭到多数人的反驳,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说:“改造政治局,是一个最高的领导,我们不要看他讲话漂亮,定要参加实际工作中有经验同志来领导……周恩来同志在调和路线上有很大错误,但是他在我们党里人才上,是很大多数知道他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个人很清楚他的,在军事上,在党的组织上,是否还有第二人呢?”米夫看到周恩来为人人心所向,也表示:“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让他滚蛋。”大会最后对“周恩来应退出政治局”的提案单独交付表决,18人不同意,6人同意。提案被否决,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像周恩来这样被共产国际扣上“调和主义”帽子加以批判,罗章龙等人又诬蔑周为“不堪教育与学习”的人,为什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照样选举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在王明、罗章龙等争权夺利、到处拉选票的情况下,多数人却把选票投向了周恩来?

首先,当时的革命事业需要周恩来这样的人。

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后,党的领袖们对革命战争这个关系事业存亡的最为重大的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陈独秀反对搞武装割据和游击战争。瞿秋白积极倡导武装斗争,赞成游击战争,但他本人不懂军事,缺乏这方面的实践。李立三则主张集中一切军事力量和敌人一拼死活。王明对革命战争一窍不通,毫无兴趣,热衷于搞党内夺权,排斥异己。毛泽东虽然提出正确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但受到种种压制,不能在革命战争的全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以一心为公、无私无畏的精神,始终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和指挥红军的革命战争,用于白区条件下的对敌斗争。以他的精明能干,解决了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为顺利开展革命战争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起

到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这一时期的周恩来,不仅仅是充分发挥了组织指挥才能,而且在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和革命战争理论上,做过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做出很大的贡献。如在1929年3月《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和1929年9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等文献中,周恩来纵观中国社会矛盾重重的政治全局,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特点,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在开展游击战争中,“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术,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中央九月来信》等文献,对当时在红四军工作的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及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做了很大的贡献。毛泽东曾表示:《古田会议决议》就是“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红四军的经验制定的。应当说,周恩来的这些理论见解,成为后来逐渐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其次,十年内战时期党的组织状况需要周恩来这样的人。

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层汇聚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干部。有建党前的老干部,有勤工俭学法、德留学生干部,有早年赴苏俄学习的干部,有王明等一批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青年干部,还有一批从武装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干部。这些干部斗争经历不同,成长背景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思想和修养也有很大差异。再加上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政治见解和宗派主义的影响,党内和领袖集体内部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周恩来以他的无私、能干、宽容,不仅在领袖频繁交替的各个时期成为重要的领导成员,而且他和各种类型的领导干部都能相处,并保持较好的关系。在那特殊的年代,周恩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党内错误倾向的缓冲剂,成为维护党内团结

的黏合剂。他曾讲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他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sup>①</sup>

周恩来的行动是对他这一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的最好解说。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曾因周恩来与他有某些不同意见，而对周采取粗暴的态度并准备将周调离中央领导岗位。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没有对李立三“投桃报李”，落井下石，而是以一颗赤诚的同志之心，耐心地说服和帮助。他不是排斥李立三，叫他靠边站，而是同他一道讨论和改正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在李立三诚恳检查自己的错误之后，周恩来、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仍然提名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得知共产国际要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周恩来为他写信，请求共产国际留李在国内继续工作。后来李立三被共产国际单方面开除党籍，中共中央并未接受，党的“七大”上，仍选举李立三为中共中央委员。

### 三、从领导者到助手

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是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领导者。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名义上的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成为实际决策者并且逐渐成为真正的领导人。从此，周恩来一直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助手。面对这一变化，周恩来以革命利益为重，毫不计

<sup>①</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9—3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较个人升降得失,衷心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出色地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一切任务。

1. 他以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人的特殊身份支持毛泽东,维护党的团结。

遵义会议上能够否定博古的“左”倾错误领导,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极不容易的。一方面虽然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惨重失败,证明了“左”倾领导错了,但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拒不承认错误;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主张虽然是正确的,但在王明、博古统治时期一直处于受批判地位,被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上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先后被撤掉中央苏区党和军队总负责人的职务,只好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检讨五次反围剿军事领导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今后的行动。这一坦荡而正确的做法,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到会议情况时曾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若干年以后,会议参加者聂荣臻也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不久,中央红军和由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支部队在团结上发生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张国焘和中央在战略方针上发生了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坚决贯彻毛泽东“北上”正确主张,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赤化川陕甘”口号,“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同时,周恩来从大局出发,为了更好地团结张国焘,主动提出辞去红军总政委一职,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还对红一方面军派往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同志说:“两大红军主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情。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分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做好两军的团结。”

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出兵作战问题上发生过分歧。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出1/3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发展。周恩来则认为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不反对开赴察绥,这样政治影响好。王明回国以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并声称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包括周恩来在发言中附和了这一主张。周恩来批评中央,在统一战线中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碍统一战线。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后来统统被算作第二次王明右倾投降路线。

今天应该怎样看“抗日高于一切”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呢?从理论上说,“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二者并非水火不容。在日本人侵危及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应该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阶级利益、党派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这也是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共识。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趋同”中洞察到“矛盾”,在乐观中洞察到艰难,在众口一词高呼“抗日高于一切”的时候,他冷静地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见解比其他人深入一层,高出一筹。这一点,身在重庆数年之久的周恩来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他于1943年8月一回到延安立即表示:“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sup>①</sup>他“心悦诚服”地认定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作为一直在党内有着很高威望的领导人,周恩来的讲话和表态,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sup>①</sup>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第6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 2. 抗战时期独当一面,统战创辉煌。

从1936年至1946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使武汉、重庆成为我党统一战线的试验田,外事工作的摇篮,并且通过这个窗口,使外部世界生动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周恩来即负责做西北军杨虎城和东北军张学良的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奉命赴西安与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各方谈判,最终使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也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开了个好头。从1937年2月开始,周恩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各地,同国民党进行5次谈判,历时七个月。基于他对蒋介石的观察,于1939年8月指出: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是在那里限共防共。蒋介石也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能影响他改变一切办法。因此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是:在他困难时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国共合作以后,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利用这一公开的合法身份,接触国民党和各党派、各届人士,接触外国新闻媒体和外交人士,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事活动。

周恩来在实践中为统一战线提出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准则。如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是:

一、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三、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四、在

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

1946年1月12日,周恩来总结“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提出民主协商的“四要四不要”原则:“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点是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是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周恩来不仅以正确的政策,而且以诚恳的态度和模范的行动,广泛团结了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他们从周恩来身上,不仅了解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而且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其中不少人对中共由疑惧到信任,由疏远到亲近。这里,我想讲一个近年来才透露出的鲜为人知的故事。1939年的一天,周恩来去看冯玉祥,冯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以来与蒋介石矛盾扩大,与共产党关系靠近。他问周恩来:“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无共产党员?”对于这样一个涉及组织机密很难回答的问题,周恩来坦然说:“我不是管组织工作的,这方面的情况不很了解,容查清后再答复您。”几天以后,周恩来回复:“你的随身参谋周茂藩、赵力军、张公干是共产党员。倘若您感到不便,我们可以调他们去别处工作。”冯玉祥听后反而高兴地说:“其实,我早就感觉他们像共产党,现在知道了,使用起来就更方便。更有利于他们在我处发挥共产党人应有的作用。”<sup>①</sup>后来,冯玉祥在其日记中多次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义。”周恩来的“以诚相待,广交朋友”,受到各方人士的赞扬。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抗日时期来中国的美国外交

<sup>①</sup> 《作家文摘》1995年5月5日,转载《解放军报》1995年4月22日翟耀、袁水才文章。

官谢伟斯表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的人。”另一位党的亲密朋友刘仲容则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

**3. 解放战争时期政治生涯的新特点：从战略全局上充分发挥了作用。**

提起解放战争时期的周恩来，人们常常把他称为毛泽东政策的得力执行者，好参谋长，甚至渲染成毛泽东的大警卫员和秘书。这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党的七大以后，全党空前团结，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气象。周恩来本人也摆脱了整风时期的困难处境，使他能够更加充分发挥积极主动精神。与前一个时期比较，周恩来明显地加强了战略全局的思考，并且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新特点的主要表现是：

(1)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总结全党斗争经验，提出并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这一理论刚刚提出之时，弱小的革命势力处于强大敌人的四面围剿之中，因此，其着眼点侧重于小块红色政权如何才能生存和发展的的问题。到了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爆发了，革命势力有了迅速的发展，此时才有可能考虑农村能不能包围城市及如何包围城市。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中，对抗战时期的社会条件、地理条件和时代条件做了科学的分析，首次肯定地回答了农村能够包围城市、战胜城市的问题。他说：“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今天看来，这一论断有两点不足。一是强调了军事和战场上的较量，而对军事和战场以外的较量未能涉及；二是强调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城市本

身完全是消极的被动因素,还是也有积极的主动因素?未能涉及。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面临如何才能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周恩来于1947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并把它提高到同第一战场——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还完整地提出:“蒋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指示中,又对这一思想从多方面做了展开论述。如:结合前线的军事斗争和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蒋管区发展农民武装斗争;坚持团结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各派中间力量,不断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奠定基础;敌人是不变的,敌人营垒有矛盾,是变化的,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包括从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力量,等等。

周恩来关于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把军事斗争与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发挥农村的积极性和发挥城市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对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国统区的人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以排山倒海之势,震撼着蒋家王朝。“一二·一”惨案以后,昆明有700多个团体,15万人参加公祭。为抗议“五二〇”美军暴行,有50多万学生参加罢课、游行,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更是此起彼伏。以至国民党的报纸惊呼“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反饥饿运动”已“变质为反征兵、反征粮、反内战的叛乱运动”,“严重性已达到危害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全”。

(2)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周恩来的思想已开始转向胜利后的明天”。

随着大规模解放战争的开展,如何统一使用各个解放区的财政,有力地支援战争,首先必须解决货币问题。1948年周恩来一到西柏坡,就抓这个难题。他听取汇报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要搞统一政府,取消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发行货币以后,如何审查各解放区的预算,使中央对各解放区的财政支援大体上作到公平合理,这又是一个难题。为此,周恩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做了富于创造性的大量工作。请看一位经济官员的回顾:

恩来同志和我们反复研究,计算出解放区每一农民平均能够负担80斤公粮,每个脱产人员(主要是解放军)的开支平均折合4000斤粮食,因此每100个农民大体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1948年前脱产人员的开支压得很低,每100个农民负担3个公家人)。按此计算出一个比例,根据这个比例来决定中央对各地的财政支援数量……中央决定的分配比例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保证了各野战军的军费供应<sup>①</sup>。

货币的发行,企业工资标准如何确定,也是一个关系生产发展的重大问题。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中,提出两条原则:一是“职工应有的生活水准必须保证”;二是根据“技术、管理能力的差别”来“适当规定等级,予以待遇上的区分”,否则“无法持续生产与鼓励生产”。

1948年6月21日周恩来所写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集中地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对未来的思考。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工业与商业的区别”;“工

---

<sup>①</sup> 薛暮桥:《周恩来的经济指导思想》,见《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业的科学管理还是后方机关制度”；“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工业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贫雇农路线”；“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政治条件是什么？老资格还是新资格”；“向谁学习，学习什么？”以及“金融斗争”、“税收政策”、“国家权力如何运用”，“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等等。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中所作的这些思考，富有远见，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3)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领袖不是神，应当科学地认识和宣传毛泽东。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向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学习毛泽东”。他认为：

——“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他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的成长过程，“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实践，“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说明“迷信是可以打破的”。

——“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30年来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没有“天生的圣人”，“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

周恩来还谈到，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学习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领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

在有了各色各样的“高举”、“紧跟”、“突出”的人生阅历之后，特别是有了“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惨痛教训之后，人们重温周恩来的上述言论，其意义不是完全可以不讲自明了吗？当有些书籍有意无意把周恩来渲染为毛泽东的“秘书”和“警卫员”，并指责他“愚忠”时，周恩来的上述言论，又会使我们对他的认识得到什么新的启示呢？

#### 四、他创造了两座历史丰碑：人民政府形象与人民公仆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政坛上屡起风云，许多人宦海沉浮，命运难以琢磨。而周恩来几十年中一直处于“风口浪尖”，虽然也曾几次面临危机，甚至“距右派只有50米”，却任凭风吹浪打，仍能安然度过，成为政坛上极富生命力的常青之树。不少文章著作企图解开“周恩来之谜”，其分析往往局限于政治斗争本身。而周恩来的政治生命力，恰恰存在于“政治斗争”之外。他以全部的生命和智慧，在艰难中创造了两座历史丰碑：人民政府形象和人民公仆形象。在广大人民面前，他代表了政府的形象，在世界上他代表了中国的形象。即使是“文革”中“批周公”最猖狂之时，也曾传言有“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反周国必乱。”可见周恩来力量之所在。

### 1. 民主人士由衷称赞人民政府。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即担任政府总理,前后长达26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由于他的努力,在一个经历了长期战乱、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而又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廉洁、精明而又高效的政府。这个政府(开始称政务院,后改国务院),从一开始,就是由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中国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政务院设副总理4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各占一半;政务委员15人,非共产党员占9人。据21个部统计,非共产党员任部长、副部长者有26人。新政府富有朝气的崭新面貌,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拥戴,并且极大的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民主人士黄炎培,一生拒不做官,新中国成立时已年过七旬,经过周恩来反复动员,居然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他回答别人问话时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后来,他又亲自写了如下感受:“参加政府以来,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动,其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另一位民主人士罗隆基,曾长期景仰西方民主制度并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任政务院委员,深为政务会议上不论党派,人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所感动,特别是为周恩来总理的言行所感动。“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入了化境,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 2. “天下是人民的天下。”

周恩来领导的人民政府最大的特点是,处处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把为人民办事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周恩来常说:“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作为一国总理,他心中的“人民”不只是一个6亿人口(70年代发展到8亿)的大概念,而是细致到各种类型、各种人群、各个层次,以至于生活在最底层者。关系全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大事,他责无旁贷地十分关注,而涉及最普通人的“生活小事”,他也从不放过。

50年代,听到北京市老百姓反映公共交通拥挤,上下班很不方便,一天下班以后,周恩来从中南海北门外北京图书馆站登上公共汽车,后又改乘电车,在整个北京城绕了半圈。边和乘车的市民聊天,听取意见,边亲自体验交通拥挤状况。为了行人过马路安全,中国公路上设置人行横道线和安全岛,也是周总理提出并推广的呢。1959年建造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专门指示设计人员:“不能只替参加宴会的人着想,还要考虑服务人员的方便。宴会厅的设计要听炊事员、招待员的意见。”并叮嘱送菜要用小车,减轻服务人员负担,房间里沙发不要太重,让服务人员搬动方便。后来,北京体育馆建成,周恩来去检查,他一直上到第四十排座位,坐在观众席上,试试能不能看得清楚,听得清楚。

## 3. 总理推小车,一干就是五天。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总是把自己当做普通劳动者,生活于群众之中,时刻联系群众。1957年年底至1958年年初,全国农村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周恩来和政府各部、局领导亲自参加北京市十三陵水库建设劳动。水库工地指挥刚刚说:“欢迎首长们……”周恩来立即纠正:“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说着周恩来就推小车干起来。一直干了五天,每天劳动八小时,从不迟到早退。中午和

大家一起吃干粮,啃咸菜,就白开水。晚上睡在工地。

周恩来经常外出视察工作,按规定要有一定的警卫制度,但有时搞得过分,引起他的反感。他激动地说:“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陪同外宾游园,有几个北京大学的学生要向他请愿,遭到有关部门阻拦。周恩来闻讯后说:“不要挡,让他们进来,你们谈不清楚,我去谈。既来之,则安之。如果对的话,要接受人家的意见,不对的话,我们还要做解释,究竟错在哪里,要弄清楚。”<sup>①</sup> 还有一次周恩来到农村调查,有个社员对工作有意见,尖锐地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陪同人员认为这个人是落后分子,周恩来却讲:“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sup>②</sup>

#### 4. 周恩来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周恩来领导的人民政府,突出地体现了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讲真话,办实事”,“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在这方面,周恩来本人身体力行做表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和陈云等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的紧张局面,认为经过压缩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毛泽东则主张继续扩大投资,再追加20亿基建经费。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展开争论,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

<sup>①</sup>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1月10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76),第367页。

<sup>②</sup>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5月31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76),第633页。

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为此,周恩来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判,甚至说:“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顾全大局,不再发表不同意见,并且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许多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对他的这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都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说:“总理办事极为认真。向他汇报工作,说‘大概’、‘可能’、‘差不多’这些字眼,是注定要挨批评的。他要求汇报一定要准确、实在,绝不能模棱两可。”他本人处处以身作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王光伟回忆说:“总理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他工作非常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几乎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总理纠正的。”

#### 5. “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周恩来领导的人民政府,与人民同甘共苦,清正廉洁。他本人处处做榜样:堂堂大国总理,一双皮凉鞋穿了二十多年,鞋底穿断了换个底继续穿;衣着外观干净、整洁,实际多处织补过,睡衣后身竟然有2/3打了补丁。他的驻地西花厅,“是老式平房,有些梁柱已经虫蛀腐朽,外面的油漆也大部脱落,窗户裂着大缝,一到冬天就透冷风,要用报纸糊严实。地面铺的是旧建筑用的方砖,很潮湿。工作人员考虑到周恩来夜间工作,经常通宵达旦,时间长了容易得关节炎,多次想修整一下房子,周恩来执意不肯”。三年困难时期,群众吃不到肉,周恩来也自觉不吃肉,和群众一起吃小球藻——美其名曰“人造肉”。有个单位关心总理,给他送来一筐新鲜蔬菜,工作人员付了钱,还是遭到周恩来的批评。他说:“付了钱也

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我们吃得到，人民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

周恩来经常教育国务院工作人员，“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他要求干部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提出要修建政府办公大楼。方案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批准，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sup>①</sup>五六年代的政府机关，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倡导和以身作则影响下，一直保持着廉洁作风。

#### 6. 前联合国秘书长慨叹：“和周恩来比，我几乎是野蛮人。”

周恩来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塑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崭新形象。说它新，是因为它不同于旧中国的懦弱外交，也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强权外交；不同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不同于前东欧国家的一切跟着别人指挥棒转；不同于以往的“弱国无外交”、欺小凌弱，也不同于“外交辞令”的虚假浮滑作风。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正确而巧妙地处理外交与革命、外交与意识形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政府与人民、政治与经济、战争与和平、斗争与妥协、谋略与信义的复杂关系，树立起崭新的外交风格：①独立自主，不卑不亢，有大国风度而无大国架子；②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不能只利于己，不利于人”；③求同存异，广交朋友，“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④诚实守信，说话算数，搞大动作不搞小动作；⑤尊重历史，讲究情义，既交新朋友，又不忘老朋友。

下面摘录的材料，比成本大套的文章著述，更有助于广大读者理解周恩来的外交风格。

<sup>①</sup>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第3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8月版。

**材料之一：**

加拿大的罗纳德·C·基思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一书中说，“外交实践在历史上常常被认为是欧洲的君臣外交，然而，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却出现在中国革命大动荡这一混乱环境之中。很明显，周恩来的外交是产生于中国具体的国内氛围之中的，但其本身却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国际上则公认他为完美的外交家”，“周恩来在外交上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材料之二：**

“周总理有文雅而威严的风度，既有远见卓识，又有气贯长虹的品德。曾有世界绅士之称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从北京归来谈观感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和周恩来比，我几乎是野蛮人。’”<sup>①</sup>

**材料之三：**

日本朋友清水正夫说“周总理的政治能让其他国家的人们所接受，并且能够凝聚人心”，“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善于最大限度地运用感情的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另一位日本朋友安藤彦太郎说：“周总理既能明察大局，又能洞察人情事理，这种品格直接、间接地扣动了人们的心弦，更广泛地向外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日本著名人士冈崎嘉平太说：“最初以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世界上的共产党都是一个模样的，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惊奇地发现他和有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他是那样的坦率、真诚、机智而又潇洒，我对新中国的看法一下子就变了。”

**材料之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

---

<sup>①</sup>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第1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sup>①</sup>。

#### 材料之五:

一个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敌意的政治家说:周“也许是他们中最好的共产党员”,但他是“一个更顽强的革命者,对资本主义是比那位主席本人更为危险的长期敌人”<sup>②</sup>。

### 五、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问题

多年以来,人们提起“文革”中的周恩来,总是充满了浓厚的感情。在那群魔乱舞、争权夺利的年代,他依然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忘我无私地为国为民操劳;在那鬼魅横行、灾祸流溢的年代,他成为千千万万干部的保护神,避难所;在许多人饱受折磨处于绝望状态,从他身上看到党和国家依然存在着光明和希望。特别是他在抗争与悲愤中去世,引起极大的震动,许多人泪流满面的自言自语:“总理走了,国家怎么办?”以至于在他去世二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有增无减。

伴随着对“文革”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人们提出周恩来“文革”中的角色问题,我认为很有意义。“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全党全国的大悲剧,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在这场悲剧中也不能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样一位“政坛常青树”的角度,从这样一位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人民公仆”角度,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后来人将会有着特殊的历史震撼力。

国外有一本《周恩来传》,对“文革”中的周恩来,讲了两种看

<sup>①</sup> 《我眼中的周恩来》,第350—35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sup>②</sup> 转引自【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4月版。



法。一种认为,他“像一个高超的骑手,设法牢牢地骑在马背上,最后终于控制住了那匹脱缰的马”。另一种认为,“继续装作拥护运动,一方面努力使它不要过分,减少它的破坏作用,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选择的道路。选择这条道路需要一种使人感到屈辱的两面手法”<sup>①</sup>。前一种看法,把周恩来形容为“高超的骑手”,面对汹涌而来的“文革”风暴,一切胸有成竹,以超人的态度驾驭历史前进,这实际上是神化了周恩来。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周恩来并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或历史之上,而是被深深地卷入历史的潮流之中,一直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认识“文革”中的周恩来。后一种看法过多地渲染他在“文革”中的策略现象,而忽视了整个“文革”过程,周恩来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这样,不但不能准确地认识“文革”中的周恩来,甚至可能会使他遭到歪曲。

“文革”十年,全党全国步入十分危险、十分困难的时期。一是主要领袖毛泽东,曾长期坚持正确路线,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理论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的声誉,和无尚的权威,晚年却陷入系统的“左”倾错误,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全党全国从思想到组织,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二是另一些领袖,特别是毛泽东多次给予高度评价的接班人刘少奇,被诬陷、被打倒了。三是一大批领袖人物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或被打倒,或处于受审查地位,或长期靠边站。四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混乱中形成,并且把持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五是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生产停滞,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面对党和国家的危难,周恩来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公开抵制“文革”;二是撂挑子,主动靠边站;三是随波逐流。前两种办法,周

---

<sup>①</sup> 【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25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4月版。

恩来没有选择。后一种办法,周恩来不可能选择。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即他自己所说的:“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sup>①</sup> 艰难的站在“文革”的潮流中,忍辱负重,百般周旋,力所能及地钝化“文革”的某些锋芒,中和“文革”的某些错误,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恶果与损失。

整个“文革”的潮流是周恩来所阻挡不住的,但他毕竟是为此尽了力,甚至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党的领导人陈云曾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今天的青年人无法想像他当时的处境。只有我们这些与他在一起的人才清楚他陷入了十八层地狱,最终又是他把我们带出了地狱”。另一位老干部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细想一下,那时没有周恩来的全力支撑,在那样的大动乱中,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最高权力,很可能被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丑类所夺取。如果出现那样情况,自然就会亡党亡国亡头。到那时,党将彻底变质,国家将四分五裂,军队可能各立山头,战火四起,经济破产,人民陷入痛苦深渊,这是无法避免的”。

周恩来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我想不是哪一个因素所决定的,而是“文革”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斗争环境,以及周恩来性格特点,多种因素综合的产物。

其一,6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地上,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个人有着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毛泽东从“左”倾观点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提出打倒刘少奇,并一度事实上解散了党的

---

<sup>①</sup> 此系周恩来对一位领导干部的谈话。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第1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组织；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交织在一起，林彪与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互相利用，又钩心斗角。构成一幅纵横交错、扑朔迷离、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的“文革”政治形势图。周恩来作为一位对党和国家有着高度责任心，并且十分精明的政治家，不可能看不到事物的复杂性，不可能凭感情办事，图一时痛快，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是洞察形势，着眼大局，权衡利弊，做出妥善的处理。

其二，“文革”中的周恩来所处的特殊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没有像刘少奇那样，“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他也没有像朱德、陈云等，长期“靠边站”。而是始终在工作岗位上，屡屡遭批判，却始终没有被打倒。这是因为：①周恩来长期担任总理职务，被称为国家的“总管家”，生产活动和经济运转，全靠他组织指挥。林彪、四人帮一伙只对“抓革命”有兴趣，“促生产”没有周恩来不行。②“周的强大不仅是因为他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事实上，在毛之后，他在中国是惟一全国人民老幼皆知、人人爱戴的人。‘谁也不会同意反对周，即使老人家也是这样’，据说陈伯达曾经这样说过。”③周恩来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从不刻意追求权力与地位。这不仅是党内人所共知，连国外的政治家们也给予高度评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但他却“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其三，周恩来的选择，也和他对毛泽东及“文革”的认识和态度有着密切关系。正如《周恩来传 1949—1976》所指出：“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敬重和服从。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对毛泽东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他总是比自己看得更远些，更深刻些。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一位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干部的看法则更深入浅出：现在有人提出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

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正是在这种以往与现实、理性与感性、事业与个人的矛盾痛苦中，周恩来力求理解“文化大革命”，力求跟上毛泽东。所以“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意打倒刘少奇。他对“文革”错误的抵制与纠正，也仅仅限于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

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们，提起周恩来总是充满敬意和感情，包括对他讲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也是采取理解和体谅的态度。这是因为他即使在全国上下被“政治”冲昏头脑的日子里，也时刻想着：“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们交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颇为此次活动容，感慨道：“除了周总理之外，又有谁曾在临死之前对人说过‘我这里没什么事了，请到别处帮忙’的话呢？周总理是一位真正的人，直到死他都在为别人着想。”<sup>①</sup>我想，这也正是揭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问题”的关键所在，揭示这位“政坛常青树”之谜的关键所在。

---

① 《首脑人生》，第18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

## 第二章 他为何未当“第一把手”

对于周恩来跻身决策领导层 50 年却始终未当第一把手这一领袖现象,有着多种解释。海外不少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可他急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国内学者则认为:“他确实存在着那个需要超凡魅力的革命年代难以使他成为‘舵手’的局限。”周恩来本人在延安时期也曾多次讲过:“我只是辅佐主帅的一员相材。”

对于上述各种说法,我认为应做具体分析。了解周恩来现象,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第一,适合不适合当“第一把手”;第二,有没有当第一把手的机会;第三,本人愿不愿意当第一把手。还要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加以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从领袖的总体情况看,应当说周恩来比其他中央领导人更适合当“第一把手”,有一段时间他也在事实上扮演了“第一把手”的角色。但在各种领袖人物竞争中,他“急流勇退,甘居次位”。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失去了成为“第一把手”的机会,他意识到毛泽东比自己更适合,衷心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领导,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阶级斗争风雨的基本结束和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应当说周恩来的个性特点和基本素质,更适合历史的需要。但是历史没有给予他成为“第一把手”的机会,后来在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周恩来一度成为国家和人民希望之所在,但他不愿当“第一把手”。林彪事件以后,周

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作了几个小时的“路线斗争”报告,一个明显的意图是,他向全党宣布不能当“接班人”。

本章拟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与历史时代、政治斗争的关系角度,对周恩来的性格、素养、品格作些分析。

## 一、“一代完人”的个性分析

恩格斯讲:“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sup>①</sup>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史上,层出不穷的政治家们,都不可避免地展示着这一历史的痕迹,他们毫不掩饰地鼓吹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条。如意大利 15 世纪的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是“兽性的高超艺术”,政治家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伪装者,一个伟大的假好人”。法国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代表人物拿破仑说:“在政治上是没有良心而只有头脑的。”还有人形容:“政治是个可怕的齿轮装置。”政治和政治家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冷酷、狡诈、肮脏、丑恶的代名词。

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近现代政坛上,开始涌现一批新型的政治家。他们是旧制度的叛逆者,又是植根于人类文明沃土中的社会精英;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又是人类真、善、美理想的建设者;是战场上勇敢搏杀的斗士,又是极富人情味的“绅士”;是万民敬仰的领袖人物,又是融于万民之中的普通一员。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把政治、政治斗争与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融为一体,被人们誉为“一代完人”。

英籍作家韩素音谈起周恩来时说:“在所有认识他或与他一起

---

<sup>①</sup>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91 页,人民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工作过的人中,我发现他们都对周恩来怀着深切的爱和敬佩的心情……这并不是因为他总是正确,他像其他人一样也犯错误。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代人受过”,“我的美国出版商曾问过我:‘难道你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我回答:‘我找过,而且花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譬如不为人知的恶习,贪婪……他全都没有。他从来不谋私利,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彻底献身精神的革命者’”<sup>①</sup>。不少西方人在周恩来的伟大人格面前,也不得不抛掉某些偏见,表示:“他是中国旧时的和蔼、礼貌和谦恭美德的化身,但把这些美德服务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为了在一生中间使他的国家迅速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现代化,他所说所做的某些事情却是富于战斗性的、无情的”<sup>②</sup>。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称周恩来是“把儒士的个人品德和列宁主义革命家的冷酷结合在一起”的“合金钢”。

周恩来个性的第一个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天性富于调和性。”<sup>③</sup> 后来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风格和处世态度——异中求同,寓刚于柔。

大千世界中的万物,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彼此竞争,又互相依存。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有两种方式:一是侧重于“同中求异”,发现差别与矛盾,在求变中取胜;另一种侧重于“异中求同”,善于发现共同点,在求同中生存。我很赞成一位学者对周恩来和毛泽东个性差异的如下分析:“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自幼养成的,是因为压抑(由于父亲的严格管束)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环境和需要,周恩来全然没有,他自幼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

①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序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② 【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③ 周恩来给谌小岑、李毅韬的信(1923年3月)。

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sup>①</sup> 在世界剧烈变动的年代，“同中求异”的思维模式，常常更令人神往，它能够引导人们开创新的格局。“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则为团结和扩大自己的力量，分化和吸取敌对力量所不可少，因此成为“同中求异”的重要补充。在相对和平发展的年代，如一个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或者在世界范围的“热战”和“冷战”时期以后，“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更适应历史的发展，因此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欢迎。

周恩来个性的第二个特点是求真务实精神。

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到自己的童年时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周恩来的这种讲究实际的品格，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逐步得到升华，成为最具务实精神的革命家。他多次讲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语）“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能搞多少事就搞多少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周恩来主张“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对于小的事情，他不因其小而不为，能够小中见大，举轻若重，以小促大。尼克松曾感慨地说“周恩来具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对于重要的事情，不因其重要就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而是“前瞻后顾”，“多谋善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对于困难的事情，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

对于复杂的事情，他主张“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行于所当

---

<sup>①</sup> 陈晋：《领袖与人格》，见《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第55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9月版。



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对于有争论的事情,不走极端,不强加于人,承认世界的多样性;着眼大局,求同存异;善于调和,善于中和,善于综合;“采用绕道走的方法”,使矛盾得到解决。有的学者称赞:“周恩来是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炉火纯青地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师。”

任何一种个性,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是既有所强,又有所不能及。一次,周恩来与薄一波谈话说:刘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薄一波问:你更喜欢那一种?周答:对我来说,我更欣赏举重若轻,但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到举轻若重。周恩来的话,并不是说他缺乏统帅全局的能力,而是从思维方式和办事特点角度做出的概括。既体现他从更高层次上要求自己,也包含了对自己个性的自知之明。一位西方学者谈到周恩来的这一个性特点,在中国政治历史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时说:“假如毛泽东是红色中国的理论家,周恩来就是使毛的理论添上生命力的实行家,周有时还给这些理论略加修饰,使之更加符合实际。”<sup>①</sup>我认为这一看法,比国内争论“周恩来是哲学家,还是实践家”的双方论点,更接近实际。

周恩来个性的第三个特点,把理性与感情融为一体,寓理于情,是一位极富人情味的政治家。

早在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的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后来,他到海外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在日记里写了如下感受:“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牟尼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即使是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

<sup>①</sup> 【美】朱雷·阿查尔:《岿然不动政治家》,见《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73—174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4月版。

者浴血奋战的日子里,周恩来谈到母亲的去世,仍然动情地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墓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和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他的话感动得听者们潸然泪下。

长征途中过雪山,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躺在担架上,被兵站部长杨立三等人抬着前进。这份情谊,周恩来铭记在心。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杨立三去世,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为杨立三送丧,并和担负殡仪工作的同志一起为杨立三抬棺。即使对民主革命元老,后来到台湾任国民党“立法院长”的于右任,当得知他担心留在大陆的夫人八十寿辰无人理睬,一定很冷落时,周恩来立即表示要为于夫人祝寿,“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于右任为此喜出望外,深表谢意。临终时写下感人诗句:“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凡是和周恩来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这个特点无不感受至深。一位省委书记的夫人说,“在我和周总理多次接触中,觉得他是一个幽默随和、兴趣广泛、人情味极浓的人”,“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老大哥。他没有一点领导人的‘架式’和‘气派’”。著名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絮青,谈到周恩来和老舍的交往,动情地说:“正是这些小事让我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形象。看到了一个卓越的革命者、政治家和领导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发现他惊人的魅力来自何处,体会到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活在世上,才称得上是达到了顶‘有人味’的最高境界。”连西方人也认为:“周恩来忠于自己的信仰,同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信守人情之道,并无二致。”

如何看待“人的感情”问题,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认识上存在着片面性,甚至把它统统列入“小资产阶级情调”。即使像周恩来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时也会感受到压力。这种把理性与感情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似乎革命家必须整

天板着冷冷的面孔,实际是对革命的曲解。列宁早就讲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sup>①</sup>试想,一个对人类多少万年发展史中形成的文明精神、美好感情以及优秀传统,统统格格不入的人,怎么能够为“全人类的解放”和美好明天而献身呢?

## 二、周恩来的素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提出,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其才能对历史进程发生重大影响,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具备的才能更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第二,当时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普氏的看法,指出了研究领袖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分析周恩来的素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可以从一个角度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周恩来现象”。

### 1. 周恩来青少年时期文化素养在同代人中是少见的。

周恩来生于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的苏北名城淮安,汉代名将韩信,汉赋创始人枚乘,建安七子中的陈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以及《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近代大画家吴昌硕等,皆出自此地。周恩来的祖辈曾做过“师爷”(被尊称老夫子),亲友中多士宦,到周恩来降生时虽家道衰落,但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对幼小的他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如周恩来的生母、嗣母皆出身于读书人家庭,本人也都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周恩来小时候,常到外祖父万家,“万家藏书很丰富,使他能大量地自由阅读”。多年以后,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期存在。”

12岁以后,周恩来先后在沈阳、天津等地上学。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开办不久的新式学堂。周恩来在这里学习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数、历史和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门。和旧式私塾相比,在他眼前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周恩来在这里,不仅学习了《史记》、《汉书》、《离骚》等古典名著,还阅读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示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13年2月,15岁的周恩来又随家转到天津,进南开学校读书四年。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不仅增添了许多新的课程,如物理、化学、生物、法制、西洋史地等,还有美国老师讲课,并且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在这里,周恩来还阅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上述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为周恩来打下了较为广博的知识基础,并使他具有较为开扩的视野和现代意识。既有古代传统的文化素养,又了解西方近代思潮;既懂得人文科学,又学习过自然科学。“他的化学获得最佳分数,代数和数学也名列前茅。”当时的南开《校风》曾记载:周恩来“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这在第一代领导人的青少年时代,是少见的。

## 2. 周恩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中共建党以前的共产主义者们,不少人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日本这个“转运站”实现的,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也有些人是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以后,在华夏大地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如毛泽东。由于翻译条件的限制和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较多,并以极大的热情和注意力研究阶级斗争理论。相比之下,对马克思

主义的另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说,则重视和研究不够。建党时期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几乎没有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专门著述。即使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李大钊,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剖析中国的社会现状,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也有某些不妥之处。建党时期的这一理论弱点,后来曾几度发展为理论上的偏差。如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指导作用,仅仅归结为方法论,片面强调“哲学从属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个基础,大谈“阶级斗争”,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理论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等等。

和上述领袖人物相比,周恩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晚一些,但却有着自己的特点。1917年夏秋,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周恩来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报考政治科。此时的日本,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从中暴露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周恩来来到日本以后,一方面看到了日本发展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他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看了大量的宣传社会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约翰·里德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日》,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等。这一时期,周恩来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他的日记和给别人的赠言,可以看出他的学习收获——“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周恩来于1919年4月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1月,又赴欧洲勤工俭学,直到1924年7月下旬返国,在欧洲度过了整整四个春秋。当时同在欧洲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对周恩来的情况做了如下回忆:

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信,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很有好处<sup>①</sup>。

周恩来在欧洲,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他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做了比较多的实际考察,既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方面,又了解了它的社会问题之所在。如周恩来在给两位堂伯父的信中说:“伦敦为世界最大的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为此地是赖。”又说:“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后来,他又对英国的工人运动作了认真的考察,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煤矿罢工中之谈判》、《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通信,可见其社会调查的深入、系统之一斑。由于周恩来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实际的立体的了解,为他正确地领会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也使得他在后来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做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盲目地崇拜西方的一切,也不以狭隘的态度“孤芳自

<sup>①</sup> 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见《我眼中的周恩来》,第10—1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赏”，盲目地排斥西方的一切。始终做到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sup>①</sup>，须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

二是周恩来赴欧期间，正值欧洲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纷陈已说，相互之间展开着激烈的论争。这一局面为周恩来详细了解各种学说，比较鉴别，并进行深入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他一到欧洲，即把“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既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以及《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等书籍。又广泛地涉猎了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基尔特主义及各色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其间，他也曾对俄国的暴力手段实行革命与英国的“渐进的改革”进行比较，认为各有利弊，“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sup>②</sup>。经过进一步考察、比较、研究，最终认定“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三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并未仅仅限于“阶级斗争”理论上，而是同时注意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早在1920年周恩来在国内时，《检厅目录》中就有过如下记载：

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五月卅一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六月二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① 《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第3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六月四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剩余价值学说);

六月七日,周恩来讲解马克思的学说,——经济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

“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讲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到欧洲以后,有机会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实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以及就近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为他进一步科学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更加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从周恩来这一时期发表的大量政论文章看,他很注意“从经济现状上立论”。如他谈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强调,“在共产主义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要占极重要的部分,我们本着他的见地,深知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要“懂得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两说打成一片来看”。他谈到工业发达与欠发达两类国家实行革命的情况时说,“我们当知工业发达之国共产革命虽难,革命之期实短,半开化之国则革命易而革命期长”,这一见解是极深刻并极富远见的。他谈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原因,很注意“从产业观点上”和从“阶级斗争观点上”两个方面阐述,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主张“根据以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和共产革命的可能性而来断定新经济政策”,有力地驳斥了“俄国共产主义失败论”。他谈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共产主义是包括政治经济全部的改革工作”,“共产主义者是兼信合于共产运动在中国的第一步革命工作的三民主义”,因此,“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国民革命’”,这不是“阶级妥协”,而是不先进行“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



第二步”<sup>①</sup>。在1924年6月,周恩来就能提出“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 3. 周恩来素养的局限性。

周恩来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历史过程中,也明显地存在着某些局限性。他出身于城市青年学生,对旧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有着深切的感受,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与心态,有着深刻的了解;对现代城市的生产与生活,有着广泛的知识。而对中国经济中占基础地位的农业,对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缺乏更多地接触和深刻地了解。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又很快离开中国外出留学和工作,没有来得及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认识工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系统地观察和研究。在国外的几年,他有条件系统地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或就近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俄的社会生活、工人运动状况,以及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但由于远离中国国内的革命斗争实践,又缺乏现代化的传播媒体,使得他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进行动态研究,无法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与中国工农运动的发展,在比较中进行消化和吸收。1924年回国以后,周恩来立即投入第一次大革命的火热斗争。第一次大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特点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形式,使他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不可能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地调查和系统地研究。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这为他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留下某些历史的缺憾。

这一历史的缺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表现得比较明显。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农村,以土地革命为

---

<sup>①</sup> 《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第47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中心,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开展农民游击战争。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虽然对组建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做过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并且做出伟大的贡献,但对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的认识和把握上,则比毛泽东要逊色一筹。周恩来是位极明智而又无私的人,他很快地察觉并认识了自己的弱点,在遵义会议上,以坦荡的胸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工作中的过失主动承担责任,并积极举荐和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对于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的思想活动和认识状况,国内有关周恩来的传记和研究著述,几乎都采取回避态度或语焉不详。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本外国人写的书,值得一读。

周恩来研究者、美国学者张大卫提出,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为什么拒绝把自己的潜在支持者组织起来”,而是全力支持毛泽东呢?张大卫对周恩来的思想状况做了如下分析:①“在中共内部,他不希望没有经验的国际派继续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②“长征对于避免全面失败和投降是一项重大任务。周恩来可能认为,毛泽东是领导红军和党摆脱国民党紧迫追击的最好人选”;③“鉴于迫在眉睫的实际生存问题的需要,以及城市暴动的连续失败,周恩来很容易看到,共产主义革命显然只能依靠一个可能领导长征并且为在中国农村保存革命希望提出最理想出路的一——人”;④“周恩来的退让似乎是理智和无私的,他并不以个人和派别的考虑为基础”<sup>①</sup>，“困难时刻以党的生存为重”。在当前能见到周恩来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材料极少的情况下,上述分析虽属“推测性”,但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周恩来在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着眼全局的宽阔胸怀、深邃的思想和无私的品德,是很有帮助的。

---

① 【美】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第2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4. 最理想的人不一定都能成为“第一把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革命任务的转变,新的历史条件的出现,为周恩来进一步施展才华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应当说,在当时的领袖集体中,周恩来所具备的素质、才能、思维方式、工作作风等条件,比别人更加适合历史的需要。如他的现代化意识和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组织才能;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与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他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中表现出的才能;他的民主意识以及率先垂范的民主作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认识(他主张:“阶级消灭,个人愉快”,逐步过渡,“水到渠成”<sup>①</sup>),等等。

这里涉及一个人才现象,即理论上最适合历史、阶级、政党、事业需要的人,在现实中不一定能成为“第一把手”。这是因为需要与现实有时并不那么完全吻合,历史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实现的,有时还夹杂着种种的偶然性。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看,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变过程中遇到重大的曲折;领导制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以及事实上存在的领袖终身制;全党的知识素质、觉悟状况,以及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人崇拜盛行。上述历史条件决定,周恩来只能扮演他在历史上所实际扮演的角色。不过历史终归还是实事求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包括“文革”中曾经多次来过中国的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再生凤凰》一书中记录了他在“文革”中的如下观察:“1973年,毛泽东的名望明显下降,虽然谁也没有这么说,但是从人们的情绪中,从人们的感情中,从人们的沉默和语气里,可以觉察出这种下降。”又写道:“就在这一年,

---

<sup>①</sup> 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3年9月18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949—1976》,第1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人们开始称他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从此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他那伟大不朽的形象。”作为“文革”年代的经历者，我认为这一观察符合当时相当多的干部与群众的想法和情绪。

### 三、周恩来的人生追求与传统的领袖观

周恩来在半个世纪的领导生涯中，也有过几次机会成为党的第一把手，为什么“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各式各样的回答：有的说他“无私”；有的说他“谦虚”；有的说他“道德高尚”；有的说他有“自知之明”。我认为，上述答案只讲到某些现象，立论有明显的片面性。讲不愿当领袖的人是“无私”、“谦虚”，那么愿意当领袖的人是否都“有私”、不谦虚呢？显然不符合实际。周恩来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拒绝这顶桂冠”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他的人生追求与政治取向——“人民公仆”，和传统的领袖观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

由于理论的、历史的、制度的多方面原因，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我们党在领袖观的宣传和实践上，有些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出现“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

1. 在解决领袖与政党的关系上，列宁曾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贬低和否定领袖作用的言论，分析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着重强调了领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理论上说，列宁“强调了领袖与党、阶级的一致性，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党的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站在党之上，领袖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领袖与党、与阶级既有一致的一面，也会有矛盾的一面。有时候，领袖的见解是对的，党内多数同志还没有觉悟；有时候，领袖可能违背党内多数同志的正确意志，做出某些

错误的决策”<sup>①</sup>。特别是在我们国家,长期的封建思想影响和小生产经济的普遍存在,再加上现代科学知识的普遍缺乏,人们往往把自身命运的改变寄托于某种神灵身上。因此很容易把领袖视为救世主,掀起现代造神运动。诸如“紧跟就是方向”,“紧跟就是胜利”,“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话虽出自某些党的高级干部之口,却不能不看到它确实适应了相当部分群众的觉悟状态。

2. 在解决领袖与群众、领袖集体内部关系上,“我们在高度评价领袖的作用的时候,很少科学地说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领袖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很少全面地说明领袖与党、领袖与群众的相互关系。我们越来越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说成只是个人的贡献,不讲或少讲集体的智慧;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少讲党和人民的作用;把领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并且不允许对领袖人物进行批评。在实践上,党的领导人的权力还是比较集中的,也没有形成一套对领袖监督的制度”<sup>②</sup>。领袖人物失去党和群众的批评与监督,必然会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滋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其结果,与“人民公仆”的称谓大相径庭。

3. 把领袖完全视为一个政治形象,领袖的宣传统统视为政治问题,而不是认为领袖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领袖的生活既有重大政治内容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生活的一面。久而久之,领袖人物身上被涂上一圈神圣的光环,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总有一种难以抹去的神秘感。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② 同上书,第465—466页。

周恩来在对待领袖问题上,虽然有时也出现过偏差,如在30年代前后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中,50年代末在庐山会议上,60年代的个人崇拜中,也都讲过错话,办过错事。但综观周恩来一生的追求和政治取向,则与上述的传统领袖观迥然有别。

周恩来从不把自己当做“社会主人”,更不把自己视为伟人。他的最高政治追求,是做人民满意的“公仆”。他说,“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嘛!你做得对,人民拥护你,做得不对,人民就不拥护”,“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我只是你们中的一个”。最为可贵的是,周恩来不仅这样认识,这样说,而且几十年来处处身体力行,时时这样做。这方面的大量事情,已广为人知,勿须赘述。我仅把近年来披露的一件鲜为人知的“小事”,转记如下:

60年代初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村了解情况,走进一个老农家。老农很少见世面,开头把周总理当成下乡干部,递过木凳让他坐。正巧老农的姑娘下工回来,周总理顺手把木凳转递给姑娘,并说:“你劳动了,比我累。”然后自己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和主人一个在里一个在外地聊起来。

总理:“你多大岁数了?”

老农:“65岁啦。”

“属什么?”

“鸡。”

总理:“比我大一岁……你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还挺长。”

“甚?总理也有过辫子?”

总理:“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

“嘿嘿……”两位老人都乐了起来。

周恩来问老农入没入食堂,并讲到自己和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后来感到不方便,退出了。老农说:“你不入食堂当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谁敢怎样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总理苦笑了:“老哥,不能这么说,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你是社会主义,我也是社会主义。唉,以前我不专管粮食工作,现在却要天天过问粮食情况,你们没粮吃,就不要我当你的总理了。大官也会被老百姓罢官的呀!”<sup>①</sup>

上述场面被紧跟而去的记者摄入镜头并做了文字记录。面对这段真实、感人的文字和周恩来坐在农家门槛上与老农聊天的照片,我久久陷入思考之中。它使我对周恩来“人民公仆”的人生追求与政治取向的认识,得到新的启示。我想,周恩来在“人民公仆”实践中所感受的人生价值、人生乐趣和精神满足,是那些戒备森严、前呼后拥进行“视察”的领导者们,所无法得到的。在这个问题上两相比较,周恩来怎么会愿意舍此求彼呢?当然不会。

周恩来从不喜欢自恃权力地位,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而是侧重主张“领导者要重视强化非权力性影响力”,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朋友,平等交换意见。他多次表示:我的发言不是指示,而是同大家交换意见,“对我的发言你们要做到四点:一是同意,二是反对,三是补充,四是怀疑,做到这四点才算是民主”。由于周恩来民主作风好,别人敢于和他争论问题,他也喜欢别人和他争论问题。黄宗英在一篇文章中曾记述了周恩来与赵丹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与电影哪个好的争论:

赵丹:“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

---

<sup>①</sup> 原文见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的《红镜头》一书,此处经作者缩写。

好。”

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较强，场景选择更广阔……”

赵丹：“那不过是电影这个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们两个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略停微步……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了。

国外的有识之士，对周恩来的平等待人、民主作风做过如下评论：“对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可能有点乏味，而且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地位不稳固的人为使自已更得人心而做出的努力。但周恩来并非地位不稳固，他满可以享有那种生活方式为他挣得的名望。其主要动机是深刻而严肃的：打破旧的高等人政府的模式。这是一个人破天荒第一次严肃而始终一贯地在公众生活中以一种真正的民主方式这么来努力做。”<sup>①</sup> 我以为这一评论是深刻而有见地的。周恩来满身洋溢的民主精神，使他对传统意义上的领袖职位，自然会有一种距离感。

周恩来的另一个特点：透明度高。他是我党最乐于自我批评，也是透明度最高的领导人。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遵义会议上，在延安整风中，他都诚恳而具体地做过自我批评，甚至不惜过于苛刻自己，或代人受过，只要对全党的事业和团结有利，他都心甘情愿这样做。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变为执政的党，周恩来本人也成为泱泱大国的总理。作为备受尊敬、万众瞩目

<sup>①</sup> 【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18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4月版。



的人物,他于1957年在上海接见参加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和部分劳动模范时,不仅没有摆出领导人的架式,而是就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失败问题,做了许多自我批评。1951年8月,周恩来在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许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作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他率先解剖自己,坦诚总结经验教训。当时与会的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感慨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像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一位周恩来研究者则认为:“周恩来襟怀坦白,在公众面前证明自己知错能改,在于他有胆识有气魄,而丝毫没有个人权势欲,不考虑个人荣辱得失,这也许是周恩来之成为周恩来的关键之一。”<sup>①</sup>

---

<sup>①</sup> 向熙扬:《周恩来的主体自我意识与实践》,见《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第545页,中央党史出版社1990年9月版。

## 第三章 周恩来身后闪光联想

许多历史伟人去世以后,留下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永垂青史。而他们的音容笑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渐渐模糊起来。周恩来则不同,他的去世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升华为更加高大的形象,继续活在亿万人们的心中。即使二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人们提起他,眼里总还是闪着泪花。著名革命老诗人光未然说:“经过了多少年年月月,我们年年月月怀念周恩来。怀念我们的良师益友啊,我们人人心里有个周恩来。”由于他去世在特殊的“文革”年代,连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都未能获得。人们为了从感情上弥补这一缺憾,为周恩来加上许多耀眼的桂冠,如“一代完人”、“万世师表”、“共产主义的圣人”……

每每感受周恩来身后闪光现象,总是引发我无尽的联想。像一部百读不厌的经典,总能从中领受到新的感悟。

### 一、他完美体现了政治信仰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曾几度形成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引进西方人文思想,特别是引进马克思主义,立下不朽功勋。然而当时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弊端,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正确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色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两种文化“结合”论,侧重于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角度阐述,而未能对两种文化内容方面进行异同比较。因此后来为推行彻底的思想革命,毛泽东放弃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并且把反传统的倾向推向极端。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毁灭一切文化为特征,不仅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否定世界上一切传统文化,造成历史大悲剧。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打开了,中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差距,明显地暴露在人们面前。社会上又形成一股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热潮,甚至有些人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是“粪堆文化”、“垃圾文化”……上述历史表明,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解决的重要课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袖,周恩来虽然在理论上也未能解决这一课题,但他从个人实践角度,却完美地体现了一种政治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正是他去世多年,仍有众多的人们为之倾倒,并把他作为人生楷模的重要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周恩来,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呢?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在周恩来看来,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外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中华之崛起”,参加共产党搞革命是为中华民族之解放,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脱离中国这个母体和根基,共产党人,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中国的实际工作,所谓“世界革命”就会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共同富裕”则是美妙的幻想。因此,周恩来当然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周恩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和抛掉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是使之进一步升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亮点,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历史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者之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民本主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自我牺牲品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以身作则精神,“过犹不及”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周恩来身上,提高到“大公无私”(不是为一人、一家、一国,而是为全人类的解放)的境界,从而更放异彩。使得一些并不赞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者,对于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由得大加赞扬。如抗日战争时期到过中国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广泛接触国民党统治集团之后见到周恩来,颇有感慨地说:“周恩来……是我们在中国所见到过的唯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又说:“正如我们所见的,这个国家最杰出的人恰好是一个共产党人。”<sup>①</sup>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社会矛盾激化、新旧对抗突出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除旧迎新的现实斗争,另一方面又具有冷静的眼光,对敌对阶级和敌对政治集团,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且能够和其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坦诚交往,由对手变为挚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及时提出“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设想;在“你死我活”、“红白对立”的简单化思维模式充斥全党的情况下,许多人出于高尚的义愤或个人得失考虑,争相宣布和“旧世界彻底绝裂”,许多人迫不得已千方百计回避和掩饰自己和“旧世界”的关系时,周恩来却在各种场合坦然地承认自己与旧社会、旧家庭、旧文化的关系,并且承认对自己的成长进步,有过贡献和好的

<sup>①</sup> 《海明威在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引自《文摘报》1991年8月15日。

影响一面。

对于周恩来的态度与做法,革命队伍内部有些人,在一个时期内也不够理解,某些外国人更是感到迷惑,他们说:周恩来“是中国旧时的和蔼、礼貌和谦恭美德的化身,但把这些目的地服务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暴力和破坏作为其纲领中的必要部分,这是这位文雅总理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迷惑不解之处”。其实道理很明白,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旧时代的精神文明中发展而来的,它和旧时代的思想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sup>①</sup>他又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sup>②</sup>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sup>③</sup>,共产党搞革命,是为了建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搞阶级斗争并不是要消灭敌对阶级的所有成员,而是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即周恩来所说的“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周恩来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右倾”、“缺斤短两”或“绅士意识”,而恰恰是坚持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之所以能这样做:

一是他出身于破落的大户家庭,由上到下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有较为深刻的接触。同时,他又到过西欧各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阶级、阶层的实际情况,也有着广泛的了解。这就为他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社会各阶级、阶层,避免简单化,提供了一个生活基础。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

②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

③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二是他敢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他的无私有着直接关系。一位外国作家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大公无私精神在龙年(指1976年)有所衰退。相形之下,周恩来(对一位政治家来说)的纯洁动机就更加突出。周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书香门第,他参加革命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从来没有靠政治吃饭,与职业政客不一样。他是为政治而活着,像有坚定信念的人那样。”<sup>①</sup> 这段话说得好,周恩来“从来没有靠政治吃饭”,“他是为政治活着”。他投身革命,不是想从中捞到点什么,而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种完全的无私地献身精神。因此,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别人怎么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实事求是。

三是得利于他的“过犹不及”、“不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内有不少人容易犯头脑发热的毛病,好走极端,而周恩来不是这样。有位外国朋友说: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中国学者认为:没有狂想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是唯物主义。没有极端主义,对复杂的事物坚持分析的态度,这正是辩证法。

## 二、他真心实践着“领袖即公仆”的人类美好理想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但丁,就曾以其诗人般的热忱提出:“虽然从施政方面说,公民的代表和国王都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从最终目的方面来说,他们却是人民的公仆。”后来,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曾说:“在我任职期间,我就是把自己视为公仆。如果他们在此期间,进而将我们称为他们的奴隶,

---

<sup>①</sup> 方钜成、姜桂依编:《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84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4月版。

我亦并无异议。”可惜,这些话除了有明显的自我标榜成分外,其“公民”、“人民”主要是指一部分有产者,而并不包括全体社会成员。16—17世纪的空想主义者莫尔,在其《乌托邦》社会里,“总督和老百姓不同的地方并不是身着官袍,头上加冕,而是他手上有一束谷穗”。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巴黎公社提出:公社的工作人员是“最热忱的公仆”,是“永远不以主子自居的”人。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从理论上也从社会制度上,为把人类的这一美好理想变为现实,开辟了光明大道。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人民服务”成为自上至下一切干部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一扫旧政坛污秽之气,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最响亮的口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新的问题:一是制度体制方面的缺陷,如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委任制,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缺乏监督机制,法制不健全等;二是主观方面的变化,如在胜利面前骄傲情绪滋长,在和平环境中,攀比之风、贪图享受之风盛行,执政党的地位容易造成领导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助长官僚主义之风。这样,使不少干部日渐远离“人民公仆”的称号。有的甚至蜕变为只顾自己谋取权力地位,不管人民死活的“社会主人”。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奉献出全部智慧和生命。然而在当政以后,在处理个人与党、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并未能以“人民公仆”自居,更为欣赏的是做“全国人民的伟大导师”。

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则不同。他身为大国领导人,真心真意、全心全意地实践着“领袖即公仆”的人类美好理想,成为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他永远站在人民群众之中,并且在思想上、生活上有着极高的透明度。他官高而不显,权重而无私,生前鞠躬尽瘁,身后一无所有。无存款,无后人,连骨灰也不留。这也是周恩来身后闪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吧。曾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在周恩来去世一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生动地记录了这位人民公

仆的感人实践和人民群众对他的深情怀念：

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活动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的生活俭朴，作风平易近人，永远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无论在红军时代，在6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的日子里，或是在其他任何时期，他的伙食都非常简单。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他的衣服往往是穿破了还打上补丁。工作的时候，他一般都和下级包括级别最低的同志，一起在食堂里吃饭，有时他和司机一起吃饭，在旅途中和飞机上的服务人员共同进餐。他和这些同志们谈话，既对他们进行教育，又征求他们的看法。因此，周恩来赢得了周围一切人的爱戴。尤其是青年人，每当他们忆及和周总理的接触时，无不热泪盈眶。

周总理每时每刻都关心着人民的生活，随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一九六六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周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赶到现场去指挥救灾工作，鼓励人们战胜灾害。他在那里见到一位老人，因家破人亡痛哭不已。周总理便对他说：“你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吧！”就这样他给了受灾人民极大的勇气。凡是听到周总理讲话的人都感动万分。

迨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周恩来的人民公仆形象，正如一位西方人士所说：“他象征了中国革命的一切好的方面。”无论从认识上还是实践方面看，都远远高于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的行为。

第一，在人民性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员与公民的关系，



是雇佣与被雇佣、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其服务范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体是少数上层资产阶级。周恩来则不同,他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并且洋溢着父子情、手足情、同志情。他的服务对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从上层人士到劳苦的老农家,都留下他的足迹。

第二,在民主性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平等并不如他们宣传的那样完美,而且处处显示着金钱的痕迹,社交场合着重身份地位。总理和部长们大约不会和司机、服务人员共进午餐,他们和公民的对话也带有很大的公务性。而周恩来一方面从资产阶级民主中吸取营养,曾表示美国的民主有三个方面值得学习,即华盛顿时期的独立精神,林肯时期的民享、民有、民治,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他又把民主精神升华到新的境界,做到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思想感情上水乳交融。

第三,在廉洁性方面,能像周恩来这样,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能如此自觉地与最广大的群众同甘共苦,两袖清风,一生清贫者,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以至感动了联合国秘书长。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时,联合国总部史无前例地为之降半旗。有些国家提出异议,据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动情地表示,联合国下半旗的原因有二:“①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②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

### 三、周恩来“是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

由于历史的需要和个性特点,使周恩来没有成为伟大的理论

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问周: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答: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纵观这一历史时期,周恩来虽然没有能提出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在全党摸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闪光的重要思想。在曲折多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毛泽东晚年陷入系统的“左”倾错误,并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遭受一场浩劫中,周恩来的闪光思想和艰难的实践,给予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新的勇气和希望。正如一本反映周恩来“文革”十年的书籍所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崇高形象的代表”,“是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sup>①</sup>。这一点,连西方观察家们也早已有所察觉。1971年10月林彪叛逃以后,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即说:“周恩来时代到来了,这是中国的黄金时期。”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再生凤凰》中,专门写了一章:“周恩来时代。”1983年出版的《周恩来与邓小平》也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听到的有关周恩来的事迹,包含着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反对。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代表着中国政治的未来。”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大批“唯生产力论”,把生产视为“压革命”,关心群众生活是“腐蚀人们灵魂的经济主义”,导致经济走上崩溃边缘。在人们缺吃少穿,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七情六欲几近泯灭的时刻,周恩来于1975年1月13日在党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

---

<sup>①</sup> 张佐良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第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尽管这一目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无法实现的,但“四个现代化”口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波澜之巨,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所无法体味的。

周恩来去世以后,“四个现代化”立即成为动员亿万人民起来自发悼念周恩来,并和“四人帮”殊死搏斗的最有力的口号。作者有幸于1976年4月5日瞻仰过天安门广场叠积如山的花圈和如海的诗歌,许许多多的挽联与诗词都提到“四个现代化”,可见其深入人心。如赞扬周恩来“生有英雄惊妖魄,死遗宏伟‘四化图’”,“您代表着八亿人民革命的心声”,“两步设想的宏伟蓝图定像烂漫的山花在神州大地开放”。许多人向周恩来宣誓:“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誓作总理后来人,实现您提出的两步设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战斗到底!”更有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直接向“四人帮”宣战者,如“他们叫喊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使中国永远停止在一穷二白的境地。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是假,终日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是真”,高呼:“继承总理小平志,人心所向不能屈”,“‘四化’实现民庆日,斩妖祭总理”。

周恩来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提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全党对这一问题的普遍认识,则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与80年代以后才逐步解决的。理论家胡乔木曾讲过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思路上的差别:《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着重谈知识分子问题,没有谈科学技术问题,他侧重于怎样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多种关系,热气腾腾地把国家建设搞上去。周恩来在总的方面自然是按毛泽东的主张去发挥的,但他比较注意到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科学建设飞速发展的巨大挑战,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技术是关键。他还讲到过搞建设不能光靠人多,也不能过分追求超越实际可能的高速度。

他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还特别强调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从两人的思路上细看,是有差别,或者说是同中有异的<sup>①</sup>。上述分析,使我们不仅从中看出周恩来与毛泽东认识上的差别,也可以从中认识周恩来与后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的联系。

周恩来对如何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也有很好的见解。他认为,扩大民主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在这方面,还可以借鉴西方议会的某些经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

在实践民主过程中,总要碰到不同意见,总会发生争论、辩论,以至唱“对台戏”的问题,怎样对待和处理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能否真正实行民主的关键。周恩来主张,“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的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sup>②</sup>。他还主张,“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这就是“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

① 《说不尽的毛泽东》上,第54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sup>①</sup>。

周恩来的上述思想,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百姓的希望,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是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之间,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1998年7月6日初稿  
2000年6月19日定稿  
于北京

---

<sup>①</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 后 记

我写《走出个人崇拜》，首先自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走出个人崇拜的过程，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对领袖怀着感恩之情，后来长期接受的教育，进一步强化了“紧跟领袖就是胜利”。个人崇拜的狂潮兴起时，我也曾是衷心的拥护者。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惊得我几天之内脑子里一片空白，心目中领袖的神圣光环也一下子模糊了许多。现实促使我进行了人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次反思：信仰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离开科学的信仰必然堕入迷信。并且下决心研究领袖问题。

由于我的研究思路，着眼于人生视角和群体视角。不同于传统的歌颂式、批判式或功过划分式，为此招来不少误解，遇到不少麻烦。在重病缠身而又处境艰难中，我曾为书稿写下一段自勉：“它不仅沉淀着我大半生的心血，而且凝聚着一大批和我差不多的人‘忧国忧民’之思。面对挫折，我心地坦然，自信我的书，对我们的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事业，多多少少会有点好处，迟早会为更多的人所认同。”

现在，已经写出的两部书稿终于先后出版了，我感谢中央文献出版社和河南人民出版社。也感谢《炎黄春秋》杂志社，是他们在这两部书出版前率先发表部分章节。尤其要感谢杜导正、宋文茂、姚建平、赵焱、海继才、袁敏诸同志。

如果命运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将继续写下去。

冯建辉

2000年12月16日

##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